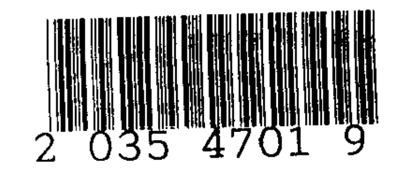
布拉格之春

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纪实

泽 曼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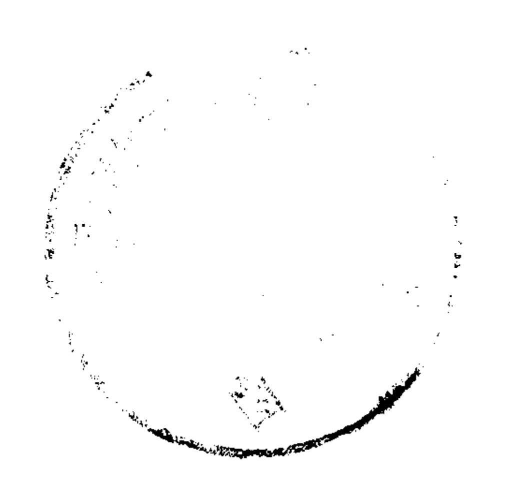


布拉格之春

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纪实

泽　曼著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的话

本书译自以下两部作品：一是英国企鹅丛书公司1969年出版的特辑《布拉格之春——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纪实》；一是1968年苏修侵捷后不久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刊载的长篇报道——《捷克的胜利与悲剧》，因为没有找到原文，这里是根据日本《世界周报》(1969年第一期)的日译文(题名《捷克事件的内幕》)转译的。

《布拉格之春》的作者兹比涅克·安东尼·博胡斯拉夫·泽曼，1928年出生于布拉格，1948年离捷去英国等地，在英国牛津大学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曾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社工作过，后在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讲授现代史，写过有关德国、俄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著作多种，如《哈布斯堡帝国的瓦解，1914--1918年》(1961年出版)等。

《布拉格之春》是写从1967年春到1968年8月20日苏修出兵侵捷前夕的捷克斯洛伐克。作者首先根据他在1968年4月初访问布拉格期间的见闻和活动，描述了当时"自由化"气氛，处处抒发自己的赞赏之情。从第二章起则反映了诺沃提尼修正主义集团追随苏修复辟资本主义，使国内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经济陷入重重困难，引起广大人民强烈的不满和反抗。同时，捷修集团内部的斗争因而也愈演愈烈，经过了激烈的明争暗斗以后，主张进一步"自由化"的杜布切克派，不顾勃列日涅夫的干预，终于在1968年初取代了亲苏修的诺沃提尼派，逐步地

掌握了党政军大权。作者认为从1967年早春开始的这场捷修领导集团内部斗争主要涉及的是所谓经济改革、言论自由和斯洛伐克问题，因此全书对这三个问题作了较多的反映，并提供了一些历史资料。

杜布切克集团上台后不久，就提出要进一步"恢复过去政治犯的名誉"，并由捷修中央全会通过了"四月行动纲领"，以加速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个纲领在经济上提出了"生产结构必须多样化"，"可以有小私有企业"等，在政治上说要实行"言论自由"，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以及改变党的职能，准备新宪法，等等。尤为重要的是杜布切克集团力图同西方直接挂钩，摆脱苏修的严密控制，就在那个纲领中提出了要有一个"更加积极的欧洲政策，目标是要同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发展互利关系"。同时，杜布切克为了排除他投靠西方的障碍，继续清洗效忠苏修的诺沃提尼派掌权人物。这样，苏修和捷修之间的矛盾就迅速激化，直接导致了苏修最后出兵侵捷的事件。

《捷克的胜利与悲剧》一文，报道苏修侵捷事件的经过，脱稿于事件发生后两个月左右。作者是两个记者戈登·布鲁克—谢泼德和戴维·弗罗伊德。

作者首先叙述从1968年5月起，勃列日涅夫集团处心积虑地采用政治欺骗和军事威胁的种种手段来对付杜布切克集团。在政治上，他们一再施加压力要杜布切克集团参加多边和双边会谈，力图通过政治谈判来迫使后者就范；同时勾结捷修内部完全投靠苏修的所谓"健全势力"，准备从内部颠覆杜布切克政权。在军事上，苏修利用华沙条约组织，以演习为名，调兵遣将，准备必要时用武力搞掉杜布切克集团。7月底，苏、捷在切尔纳举行四天会谈，苏修采取了种种卑劣手段，又打又拉，经过一番讨价

还价以后，双方达成了暂时的妥协。接着，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多边会谈中，苏、捷以及东欧四个修正主义集团，共同肯定了切尔纳会谈的结果。可是，刚过了半个月，苏修就无耻地打着"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招牌，伙同几个华沙条约国，悍然出动几十万军队，从空中和地面发动了闪电式的入侵。在捷修的不抵抗之下，苏修等国"联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与此同时，杜布切克等人也被绑架。然后，苏修又迫使捷修领导集团在莫斯科进行"谈判"。勃列日涅夫公然威胁说，如不接受他的条件，就要把捷克和斯洛伐克作为两个加盟共和国并入苏联。捷修头目就在刺刀之下出卖了人民利益，接受了投降条款。据作者称，他们掌握了可靠的情报来源，甚至包括了亲身参加苏捷"会谈"的捷方官员所提供的材料，因而有可能比较具体地描述苏修侵捷事件的有关内幕，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和捷修出卖民族利益的丑恶行径。

五年前的苏修侵捷事件是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内部危机的一次大爆发，也是新沙皇穷凶极恶的侵略本性的大暴露。本书的翻译出版，就是给读者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这一事件的背景和经过提供一些参考材料。可是，由于原著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他们的纪述不可能正确地反映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对捷修领导集团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情况。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些作者的立场是极端反共的，他们处处恶毒攻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极尽污蔑之能事。他们把少数右派分子支持杜布切克复辟资本主义以及他们的"自由化"叫嚷，说成是捷克斯洛伐克广大人民的要求。他们对于杜布切克集团对内加速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力图同西方"直接挂钩"的政策，表示了高度的赞赏和深切的同情。因此，泽曼特意把书名叫做"布

拉格之春”，而弗罗伊德等则在文章的结尾预言“那个春天早晚又会重新到来”，说这是历史的“无情的逻辑”。可是，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资产阶级老爷们是永远也不可能懂得历史的无情的逻辑的。“**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捷克斯洛伐克，继严冬之后而来的，决不会是一个资产阶级拍手叫好的“布拉格之春”，而只能是属于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灿烂的共产主义的春天！

1973年9月

序

放在你们面前的这本书，是分析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改革运动的原因和经过的。我不称它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暴行”或“迷梦的终结”，它也不提供那一类性质的材料。我动笔于1968年4月从布拉格回来之后，完成于7月。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之后，我在最后一章里加了几页，其余各章则仍然照旧不变。

捷克人曾经卷进过一次类似的纠纷。十五世纪时，扬·胡斯及其追随者曾攻击中世纪晚期的教会，整个民族被拖进了一场冲突，同一个强有力的、但已经腐败的制度较量。他们比欧洲的普遍宗教改革运动先走了一个世纪。

当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吵闹，基本上是如何管理国家的问题。他们认为“我们生下来可不是为了轻易地受人统治的”。在他们之前的其他共产党人，如铁托总统和毛主席，曾坚持他们的国家不受莫斯科控制的权利。但是“多中心论”并不是捷克人真正企求的目标。他们一看到共产党人之间彼此斗争的残酷性就不寒而栗。他们曾经对严密的官僚主义控制和物质的与精神的价值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过尖锐的意见。他们曾经表明，绝对权力不仅败事有余，而且同绝对负责从来是背道而驰的。

他们开始拆除党和国家的沉重的官僚机器。

1956 年的匈牙利革命是一个热烈和动感情的事件，得到的反应也近似。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则更多地着重于理智的运用。甚至在极大的压力之下，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尽可能地克制着自己的情感。他们谈判、辩论和嘲笑。他们还没有失去希望。

俄国人及其盟国自然有足够的力量，去拖延、或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如果他们要踏上这条道路的话，他们将会发现即便要获得象约翰·洛克所认为的那种对政府必不可少的“默许”，那也是不可能的。他们将会遇到一个冷漠的、被征服的民族的愠怒的沉默。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将成为小麦的消费者而产钢的效率却不高，他们之间只好偶而用西方斯拉夫民族古怪的方言来交谈。

目　录

第一章 重返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是在1948年被斯大林的东欧帝国最后吞掉的一个国家。在这个独裁者于1953年逝世之后，斯大林主义在那里比任何其他地方保留得更久。同年东德发生骚乱。1956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向党的“二十大”发表关于斯大林政权所犯错误的历史性演说。波兰发生了暴动，匈牙利发生了革命。俄国坦克在布达佩斯打垮了革命者；在华沙，哥穆尔卡作为党的新领导人登了台。在这段时间里，布拉格的政府一直保持稳定，没有动摇。世界上最大的一座斯大林塑像仍然俯瞰着这个首都；捷克人赢得了倔强无情的稳定性的声誉。过去三四年里，他们的政府那种严肃的面孔，在外部世界看来，开始有些改变。几本带有真实性痕迹的小说出现了；几部用直截了当的、非政治性语言讲话的影片在西方观众面前上演了；一车车捷克人来到维也纳观看冰球比赛。同时，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总是出现一些很糟的情况。

1968年1月，整个门面开始崩溃。一个不知名的斯洛伐克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代替了任职已有十四年多的安托宁·诺沃提尼，当上了党的第一书记。诺沃提尼留任共和国总统，但为时不长。一个高级将

领[①]逃往美国，官方的解释（说他卷入了大规模的三叶草籽投机活动）竟使人心大快了一阵子。政治舞台上的情景，看起来好象正在操纵着木偶的那个人，一下子让所有的牵线都脱了手。辞职、自杀、公开讯问一个一个迅速地接踵而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另一次会议，已安排在四月初举行。驻在匈牙利和东德的苏联军队再一次行动起来，据说在严格遵守不发无线电讯号[②]的纪律，他们的坦克混杂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间的游客车辆中。

布拉格是否正在发生一场革命？年初的几个月里，西方各国首都收到的消息表明情况可能就是如此。三月末，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变化，看来要比战后在东欧共产党各国曾经发生过的任何变化都更为深刻。捷克人对本国的事情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好象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没有使用暴力。我停下了当时正在维也纳进行的工作，决定亲自走一趟，以便弄清真相。我离开故乡布拉格已有二十年了。

维也纳的弗兰茨·约瑟夫车站，原是为便利哈布斯堡帝国西部各省之间的交通而建设的，现在看起来未免显得狭小而不受人注意了。一清早，破旧的列车从远郊带来了持有月票的乘客。而文多波拿快车却同前者形成鲜明的对照。那列快车停在远处的月台上，乘客少、式样新、马力大，它的空气调节设备正在发出柔和的嗡嗡声。

① 指同诺沃提尼关系密切的国防部党委书记谢伊纳少将。参阅本文第六章。——译者注

② 防止泄露行踪秘密。——译者注

1968年4月2日早上8点过后不久，我搭上了这趟快车。8点10分快车准时驶离维也纳，两小时后进入捷克境内。一路上经过的都是我所熟悉的乡村情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南波希米亚深湛的鱼塘，是僧侣们为饲养节日和斋戒日用的鲤鱼而围筑的；然后是塔博尔——十五世纪宗教战争中的要塞城镇。在起伏的、富饶的中波希米亚土地上，车速已经逐渐放慢。那里有几百个军人正在修整轨道；沿铁路线两旁的杂草已被烧掉，有的地方在冒烟，或者还在燃烧。一路上我们看到的车头，大多数都是用蒸气来发动的。将要到达布拉格时，我们进入了风景如画的乡村：成群的小山，山顶上矗立着白色的小教堂；小小的池塘和狭窄的、树木茂密的山谷；萨扎瓦河边鱼鳞栉比的圆木小屋，也就是城里人夏天度周末的地方。终于在晌午时分进入布拉格郊区，长长的隧道——我童年时代的许多假日就是在那里开始度过的，然后是装有通常那种大块玻璃和铁拱门的中央车站月台。

附近没有行李搬运工，在车站外边仅仅有一辆出租汽车：一辆又老又旧的俄国"伏尔加"。出租汽车司机说，他将把我直接送到中央招待所，而不带着我一家一家旅馆找去，他解释说因为那样将会越来越失望，说不定最后还会住到远郊去。他问我是不是一个北极探险者。看来他好象不久前给一位在靠近北极的某地呆过好几年的人开过车，他说这个人的"捷克话讲得和你一样生硬"。

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里，我找到了布拉格最后一

个房间，里面有三张床。这家旅馆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是跑码头的推销员倒霉时住的。它从来没有真正受人欢迎的机会。由于火车头整夜不停地在旅馆旁边缓慢而谨慎地转入岔道，睡在房里如同睡在月台上一模一样。转天，我搬进了西北郊一家大型、舒适的旅馆。这座难看透顶的建筑物，原是为了招待华沙条约国的军方来客而造的。对此要负责的前国防部长如今就住在附近，象征他已经失去了的权力的这个难看的物证，每天都映入他的眼帘。

我对布拉格的初次印象是可怕的。在火车站外面过去有一个可爱的公园，如今已被搞掉，小孩子们在一小块坚硬的黄土地上踢足球。国家博物馆附近，正在造一幢和四周环境很不协调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每当工作日下午三四点钟光景，地势比市中心略高的瓦茨拉夫广场上挤满了人群。广场四周的树木已经见不到了，广场两边的大部分人行道已被木板拦住，行人只得使用通向邻近街道的房屋拱廊。人们忙忙碌碌，面色严峻，偶然也可看到武装的军人成双行慢慢地走着。整个情景都被一层尘土所笼罩着。

我想起了几天前读过的休·特雷弗-罗珀写的一篇文章《论菲尔比》（《文汇》1968年3月号）里面的一句话，这句话描绘了二十年的共产党统治怎样将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战前象瑞士一样的地方，变成了中欧的贫民窟。默默的长蛇阵正在等购晚报，我买了一份带回旅馆去看。

傍晚，我上城堡① 去，天黑时才到。有两个卫兵，胸前挂着手提机关枪，一动不动地在门口站岗。第一座院子灯光暗淡，冷落无人；在“国王马加斯”门的拱道下面，光线较亮并有某些人在活动的样子——鱼形的黑色“塔特拉”轿车接连不断地来到又开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正在这座门上面的西班牙厅里举行，通向大厅的宽阔大理石楼梯上摆着两行鲜花，并照例铺着红梯毯。对于这座楼梯和楼梯尽头平台上的玻璃门的情景，我原是非常熟悉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现在它却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总有什么说不出来的别扭似的。

在我到布拉格后的最初几天里，一再出现这样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记忆中的印象同眼前那幅同过去相似而又不完全相同的图景合在一起而产生的。不久我发现，只要对自己的记忆作一番艰苦的努力，这种具有不安性质的感觉还是可以消除的。不错，三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看到过这座楼梯，铺着红梯毯，摆着鲜花，当时总是挤满着人群。1937 年夏，在那扇长玻璃门后的大厅里，人们正在瞻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首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② 的最后遗容。今天晚上，八点钟还不到，楼梯上就已经空了。不时地，有一

---

① 城堡指布拉格有围墙的故宫，原为历代波希米亚国王住所，现为总统府，位于山上，俯瞰全市，其建筑物包括西班牙厅等，大都建成于十六、七世纪。——译者注

② 托马斯·马萨里克（1850—1937），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其子扬·马萨里克（1886—1948），也是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外交家。详本书有关章节。——译者注

名党的中央委员慢慢地走下来，钻进一辆黑色的“塔特拉”轿车，然后开走了。

第二座院子是静悄悄的，文艺复兴式的喷泉已经关掉，圣十字架教堂入夜后上了锁；在大教堂俯视下的第三座院子里，停放着官员们的车子。有几个司机在轻声地讲着话，另外几个则伏在驾驶盘上打瞌睡。我折转身来，开始下山，往马拉斯特兰那走去。在盘旋而下的陡峭的大街半途中，有一个学生，正孤零零地站在地下室酒吧大门上面的阳台上，冷嘲热讽地学着别人样子在演说（“我也承认过去有过许多可怕的错误……”）。

慢慢地，我对布拉格这个城市恢复了清晰的印象，虽然花了好几天的时间，这才消除它在最初几小时里给我的不良印象。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布拉格事实上远没有伦敦的变化大。除了郊区有一些高层公寓的街坊外，布拉格的空中轮廓依然如故。布拉格的一切标记都还在：从著名的城堡景色到山上的曲径、哈哈镜，以及描绘三十年战争期间查尔斯桥一战的巨幅全景画，仿佛一片模糊的浓烟仍在从这个战场的画面上升起。虽然工业可能已使乡村面目全非，但旧城的容貌基本上没有变化。

所有的标记都在，咖啡馆、餐室、地下室酒吧也都在，有些还用着二十年前的老侍者。对这个地方越来越熟悉后，对人也就越来越熟悉了。他们经历了多年的斯大林主义及其在捷克的奇妙的延续。他们目击过以政治名义出现的、公开的小丑表演；他们曾经成了不恰当宣传的目标；他们的生活曾经受到国内的不安全、恐惧，以及即将

来临的更大的恐怖的威胁的破坏。但是他们摆脱了所有这些，显然并未受到什么损伤。

我初访瓦茨拉夫广场时所得的印象逐渐消失了。这可能是由弥漫的尘土和匆忙的、稠密的、只顾自己的人群造成的。驻在东德和匈牙利的俄国军队在移动的消息，开始从西方传到布拉格。在最下层人民中的交头接耳的传说，并没有为这个国家增添欢乐；这个传说暗示整个危机是老的共产党领袖们策动的，便于发现有哪些人会说些什么，这样，他们的反对者就会自我暴露出来而被一网打尽。我在喝啤酒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报复将是无比厉害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同布拉格人民一道，恢复了自信，情绪逐渐好转。我对这个城市及其人民变得熟悉起来，正当我在担心我们可能永远失去了联系的时刻，我对他们通常的、文雅的大众语言也就熟悉了。苏联军队显然已经结束演习，正在开始撤回驻地去。共产党的新领导人是能够赢得人民的信任的，并以提供无数的真实消息来引起他们的注意。

我在布拉格逗留期间，为了买到当天各种报纸，每天必须早起。共产党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和工会机关报《劳动报》，通常在八点钟以前可在旅馆外的报摊上购到，但是青年联盟的机关报《青年阵线报》，就得跑到市中心去买，而且头几天还常常空手而回。不久，我发现民族剧院附近的报摊上可以买到《青年阵线报》。购买日报的困难，几乎成为一个人每天的常规；这些日报到手之后，我

就在民族剧院对面转角上的一家服务周到的斯拉威尔咖啡馆里，利用它们做我的晨间工作。到晌午以后是无法在那里工作的。这家咖啡馆的“L”形长房间里挤满了人群，鸡尾酒会的喧闹声不断传来。兴奋是它的基调。

1968年3月初以前，报纸经销人每天要把成捆的报纸退回给报馆。随着改革进程加快速度，人们对政治的兴趣提高了，报纸的销路也增加了。勇气和率直的报酬是高的。作家协会周刊《文学报》在1967年10月停刊前，每期印行十六万份。这个发行量很大，这份报纸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它在检查制度面前一点儿也没有惧色，并且不时对社会现状作出迅速的报道。当它于1968年3月1日以新的刊名《文学日报》重新出版时，就必需要印二十六万份了。在布拉格，除了市中心以外哪儿都买不到《文学日报》。

男人们每天闲聊的两个中心——足球和女人——几乎完全被政治挤掉了。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说：“没有人再在我的工会支部里谈论足球了”，他接着说本人已经几乎不再看报纸背面的体育版，但在政治把他吸引住以前，这可是他唯一用得着的部分。

我爱同布拉格的出租汽车司机聊天，很多时间就是消磨在车子里。这并不是说他们容易被掌握。改革对于八百个出租汽车司机来说意味着两件事情。首先，他们希望废除这样的车租规定，即不论载客与否，仍须按每公里计算，向雇主“市交通运输公司”交付车租。这种制度意味着，如果他们运道不好，开了一趟远郊的车，那么白

天挣来的钱到晚上就得扔掉了。其次，他们希望摆脱公司经理的控制。这种车租制度是由经理来执行的。因为他是按照所管车子的行驶里程来领取奖金的。这个人显然是前政府总理的亲戚，司机们对他处理他们有时拒绝载客的方式极为不满。给我开过车的司机中，就有一个司机在他的脖颈上留着八吋长的伤疤。有一天晚上，两个吉卜赛人叫车子到远离市区的一个地方去，结果这个司机却遭到了他们的袭击和抢劫。吉卜赛人被捕后即被判刑五年，这并没有使司机得到宽慰："为了五百克朗，他们差一点要把我的头血淋淋砍下来。"他本来只是害怕他们向上面报告，这才让他们搭车的。因为拒绝搭客是会当场遭到解雇的。所以布拉格出租汽车司机的自由，意味着拒绝载客的自由。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有好几次，一连几个钟点，到处看不到一辆出租汽车，因为司机们正在开会。他们摆脱了经理的控制。有几个司机还把马萨里克总统的照片贴在仪器板上。

在棕树主日① 那天，我如同往日一样早起，买了报纸，驱车到城东堆货场和火车站背后的维特科夫山上去。这座小山顶上有一座不讨人喜欢的纪念性建筑物，它是为了纪念国家独立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造起来的。在一大片粉墙上，嵌着又长又狭的窗户，象是无意中搞成的裂缝一样，外面还有一座巨大的骑者的塑像面向着城市。现在它成了已故共产党领导人的陵墓。通过一座宽阔的阶梯进入一个大厅。大厅的那一头，有一幅黑色帐幔；中

① 即复活节前的礼拜天。——译者注

间约有十多个褐色大理石棺。其中只有三个已盛殓：一个是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1948 年他接替贝奈斯的总统职位，在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后不久死去的；另一个是他的继承者安托宁·萨波托斯基，死于 1957 年，其父是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最后一个是瓦茨拉夫·柯别茨基，他是宣传和新闻部长，死于 1961 年，是某著名木偶戏剧院主人的儿子。沿着墙壁是次要的共产党领导人物的白色大理石棺；同样，大多数是空着的。尤利乌斯·伏契克① ——一个新闻记者，战后颇有影响的、二三流的崇拜对象，葬于大厅的一角。楼梯下面有一个较小的大厅，里面有四个空着的黑石棺。还为作家在墙内保留了许多壁龛，并为党的工作人员保留了较小的壁龛。至今只有几个已存放骨灰。

内部的建筑缺陷，无目的地浪费空间和高低不平的地面，严格按照死者等级划分葬地，大部分没有入葬的墓地上这些不遵奉旧礼的整个单调气氛，却给人一种郁郁不快的感觉。这些都反映在参观留言簿上。一些美国共产党人，出于某些不明的原因，用法文写下了他们所受感动的程度。来自西柏林的游客竟对柏林墙提出了意见。留言簿上用多种文字写下的各式各样感想，无非说人们孜孜以求的一切总不能如同日月那样久长。只有俄国人表达的感情才是正确的。

我驱车下山，经过堆货场的空地和铁轨，穿过市中心

① 尤利乌斯·伏契克，现代捷克斯洛伐克记者、作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法西斯杀害，著有《绞刑架上的报告》。——译者注

和大河，直上城堡和大教堂。一大群人挤满了宽广的哥特式礼拜堂的正厅；多年来第一次点了香。大教堂进口处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几迭纸。一个老妇人手捧着待客的食物，站在旁边迎客。人们正在一份要求宗教信仰自由和在学校里恢复上宗教课的请愿书上签名。

在那些日子里，还没有严肃的气氛，远处也没有传来革命风暴的吼声。城堡门口手持冲锋枪的卫兵，还戴着太阳眼镜。古巴文化馆窗口上“我们不出售雪茄”的通告，提醒过路人此刻已到了拼命想抽上一口好烟的那个“好兵帅克”[1] 的故乡。前总统诺沃提尼政权的过分冷酷，已给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和他的不太冷酷的、但更为坚强的前任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一样，在数以百计的官方照片上，诺沃提尼闭拢的嘴上紧紧叼着一只烟斗，他精明地但是毫无笑容地统治着这个国家。这对捷克人来说未免太难了。他们对一个没有个性的人物还得忍受个人崇拜。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在公开场合出现时，倒没有诺沃提尼那样生硬。他可以装得象一个快活的老好人，这对一个政客来说是很占便宜的。

在我下车伊始时，布拉格正好流传着一个故事，它概括了公众对击败一个不可一世的恶魔所表示的惊奇。

> “狮子同志遇见一只兔子，对他说：‘兔子同志，明天早上，你要来向我报到，因为我要把你当早餐吃。’兔子说：‘我准定来，你可放心，狮子同志。’

---

① 帅克是十九世纪捷克讽刺作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在长篇小说《好兵帅克》中所塑造的主人公。——译者注

接着狮子遇到一头斑马，说：‘斑马同志，明天我要把你当午饭。’回答是：‘我将乐于听从您的吩咐。’后来，狮子见到一个小耗子。‘小耗子同志，明天晚上我想把你做开胃的酸辣菜。到时你要前来报到。’

小耗子眼睛直盯着狮子说：‘你这个贪婪的老东西，你自己去塞饱你的肚皮吧！现在我要干我的事去了。’狮子说：‘如果是这样，请接受我的歉意，当然我会把你从我的菜单上勾掉。’”

近来戏剧里充斥着粗鲁的和超现实主义的幽默。在作家协会隔壁，有一家名叫紫罗兰的文艺夜总会，那里一个由职业演员组成的小组正在演唱《布拉格人民之歌》。这个歌集最初由一个诗社于十九世纪出版的，它细致而不感情用事地描绘了清洁女工、妓女、女售货员们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以及她们同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家军官（绝大部分是酗酒的）之间的关系。马洛斯特兰斯卡茶座，设在广场一角拱道上面，有两个大房间，里面摆着小桌子和安乐椅，而不是几排呆板的、不舒服的座位（只有超过六呎高的人才能欣赏这种舒适透顶的摆设），有一个很精采的业余剧团正在给他们的年轻观众演出两个短剧。第一个短剧叫《雅拉·辛姆尔曼的剧作》，是一出精心编造的嘲弄文艺流派的戏。在一个座谈会上，形形色色的专家（首先发现辛姆尔曼的人也在内），肃然起敬地谈论着他们的这个艺术大师、剧作家、哲学家、发明家和博学之士。辛姆尔曼生在维也纳，虽用德文写作，然而老是以捷克人自居。他到波希米亚来度晚年，因为用他的

话来说："这里是一个人最后安息的好地方"。他死后不久被发现，辛姆尔曼热就发展起来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偶然制造出来的大学生式的笑话，在整个学期中快活地广泛传播开去了。辛姆尔曼热在幕间休息时实际上也仍在进行。酒吧旁边有一个小型展览会陈列着辛姆尔曼遗物，其中有这个大师的生了锈的咖啡磨子。每件遗物上都有清楚的标记。

瓦茨拉夫广场外的话剧俱乐部大量上演肖恩·奥卡西①、艾伯特·卡谬②、爱德华·阿尔比③创作的现代剧目，声誉很高。姑就拉吉斯拉夫·斯莫塞克这两出很卖座的短剧《迷惘》和《Z·伯克博士的奇妙的下午》而论，享有盛誉是理所当然的。人的弱点及其暴行，是斯莫塞克最爱写的主题。他对年轻的看门人在迷惘中毫无道理的暴行，年迈的伯克博士为保卫他的陋室而采取的疯狂暴行，都作了很细腻的刻划。瓦茨拉夫·哈韦尔的新剧原定在俾路斯特腊德剧院举行首演，不巧被取消了；我只好改看电影《严密监视下的列车》，这部电影是在获得美国奥斯卡金像奖后，才由布拉格市中心一家电影院再度上映。

在我逗留布拉格期间，最吃惊的事情就是人们如饥似渴地希望获得更多的新闻。日报供应紧张证明了这一点；深更半夜，学生们在市中心生意兴隆地出售公众讨论意见的全抄本。旅馆前厅里，电视机的屏幕上时时出现

① 奥卡西(1880—)，爱尔兰剧作家。——译者注
② 卡谬(1913—)，法国剧作家。——译者注
③ 阿尔比(1857—1930)，美国剧场经理和剧作家。——译者注

造反的镜头，职员、出租汽车司机（他们干脆把车子停在外面不管）和会讲捷克话的旅客都来观看。公开质问党员、政府和军队的成员，也牵连着几个作家，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消遣。我参加过一次这样的会议，那是在布拉格以西大约二十哩的一个很棘手的工业城镇克拉德诺举行的。

和我同去的有一个作家和一个前任党的主席团委员（他是在五十年代初期被清洗的）。当我们抵达工人俱乐部时，我们的司机说："你们不论对他们讲什么，都要简短和亲切。"他是一个好脾气的小伙子，当我们停留了四小时之后，他仍然笑脸相迎。这个俱乐部的大厅，特为这次会议装饰了一番，就象过节一样，大厅的尽头设立了讲台，整个大厅挤满了人群。我们很难走近讲台。本来准备六百多个钢铁工人到会，可现在至少已到了八百人。他们大多数来自科涅夫铸造厂，他们怨恨布拉格的计划工作人员是有充分理由的。

科涅夫铸造厂建立于一百多年前，可是直到今天，他们最常用的工具还是铁锹。那里设备还是本世纪初从容不迫的日子里的产品；去年这个铸造厂亏损一亿七千万克朗。工人们受害是因为他们在一个设备陈旧的工厂干活，他们得不到本应享受的好处——假日、奖金。最近，政府决定将这个不经济的"科涅夫"报废，在克拉德诺城外的德林另建一个新的现代化工厂。这项投资是否真正必要的问题，在 4 月 11 日的会议前不久已经提出。

大概由于很多方面都表示不满，党才派遣了一个由

高级人员组成的小组来到克拉德诺。坐在主席右面的是帕特拉中将，他曾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兵团在东线作过战，其后，和他的司令员、现在是新总统的斯沃博达将军一样，在五十年代初期很不走运。隔壁是汉泽尔卡先生，好几本非常有名的游记书的作者；最右边的是切斯特米尔·齐萨日①先生，前教育部长，诺沃提尼总统曾派他去罗马尼亚当大使，以后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主席左边是克劳斯先生，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年轻的工会领袖。在第二张桌子上，是另外一组发言人；我坐在齐萨日后面。

在走到讲台去的路上，人们给我一枚镶有这家工厂商标的纪念章；在大厅另一头的黄色帷幕上，别着这种纪念章的复制品，可比它要大得多。这是一个侧面的少女头像，她的头顶上面有一颗白色的星，衬托着蓝色的背景；它使我明白了最近发表的短篇小说里写到克拉德诺的一句话："了不起的美人，星星在给她卷头发……"，而在此之前，我是不理解的。

会议井然有序地在进行。写着"请对讨论作出贡献"标题的纸片分发给听众，他们便把问题写在上面，向某一个发言人提出。会议的组织者不时拿来一迭迭纸片，在讲台上分发。在写着给"英国新闻记者"字样的纸片开始送到我面前的桌子以前，我一直以为我在那里不过是一个观察员。所提的问题范围非常广泛。钢铁工人希望知道他们和他们的铸造厂将发生什么变化；部长的薪水有多少；捷克的铀到哪里去了；最近离捷去以色列的作家慕

① 齐萨日在1968—1969年期间任捷克民族议会主席。——译者注

拿斯科是何许人①；1938年捷克人该不该和希特勒作战而不接受慕尼黑协定。向我提出的问题，涉及到英美两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最近事态发展的态度。

一些工人离开了会场去做下午班，另外一些工人来到，接替了他们的位子。发言人既可以饮用大量供应的清咖啡和矿泉水(我对此很高兴，因为前天晚上同一个朋友谈了一个通宵)，也收到了听众提出来的大量问题。我看只有一两个发言人照老样子单调而低沉地讲话，他们把词句故意弄得含糊不清，根本不接触思想。但上讲台的大多数政治家都是敞开思想的——其中有一位提供了苏捷关于铀的协定的细节，另一位谈到了一个部长的薪水——汉泽尔卡先生和齐萨日先生表现得很好，面对着提出来的一大堆问题，他们回答迅速并且兴致勃勃。

我预定七时回城，但好不容易弄到七时二十分才脱身回去。会议还在进行。离开的时候，他们请我吃一些夹心面包，赠给我一个工人自做的熟铁烛台；这样一来，我就得在来宾簿上留言签名。会议情况后来在白天的电视上映播了。

那天晚上，我上床很早，因为头天晚上我和一个老同学谈了一个通宵后，已在瓦茨拉夫广场的一家香肠店里用了早餐。他是我在布拉格遇到的我青年时代的唯一的一个朋友。许多我们都认识的熟人二十年来的情况，就是他，还有我的一个老同学的母亲，给我概括地介绍的。我应该坦率地说，他们(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出身)现在干

① 参看本文第三、四章。——译者注

的工作正是我所希望的。他们当了医生、律师、大学教师和出版者。我的大多数朋友（战后都是布拉格大学的学生）都完成了他们的学业。他们的退学率没有超过这个国家的一般水平，即百分之十六。他们的父母可能已经失去了生意、金钱和房子；有几个人的死就是由于这种打击。毫无疑问，在老一代中有些人和这个社会是势不两立的，他们备受打击，生活上所遭的损害是无法弥补的。简单地列举他们在世时的几件大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他们生于本世纪初，亲自看到了 1918 年哈布斯堡帝国的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成立；1929 年的经济衰退；1939 年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摧残和 1945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重建；1948 年共产党的接管政权。

他们的子女，即现在的中年一代，要屈从于 1948 年后的政治局势。我认为他们干得很不错。在我所知道的人中，有一两个为了自己的前途可能加入了共产党，当时他们的朋友（不论政治信仰如何）都是不赞成的。除了他们之外，我也没有看到人们由于丧失财产和前途而产生很大的怨恨。我所知道的几个青年——他们是例外——他们本来打算继承父业的，因而没有上大学，总的说来他们的遭遇是恶劣的。其中有一个，看来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比我的随便哪一个朋友所受的折磨都要大，他靠各种非熟练劳动过日子：开出租汽车——迄今是他最好的工作——和当矿工。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如今也已如愿以偿了。从前他住在父母近郊的大房子时对我说过，他希望在市中心有一套小公寓房子。而现在他已

经有了。

专业的、技术的和文艺方面的知识界得以保留下来及其成长发展，是了解捷克斯洛伐克当前事态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中年一代的男男女女，不管是否党员，密切地注意着过去二十年来本国政治和经济制度上的缺点。他们可能亲身受到过这些缺点的影响，但是他们并不怨恨，他们并不怀有偏狭的、念念不忘过去的激情。他们试图作出必要的改进已有好些时候了。这些计划遇到了强烈的反对。危机已在一年多以前开始，到现在(1968年5月)还远没有结束。

第二章　诺沃提尼体制

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和共产党第一书记安托宁·诺沃提尼是一位有献身精神的人。他对党的忠诚从来没有人怀疑过。

1904年12月10日，诺沃提尼生于布拉格附近的小村庄莱特尼亚尼，是一个砖匠的儿子。他受了九年的基本教育以后，就跟一个锁匠学艺。他一直是个严肃的孩子，从不打架。他沉默寡言，看来可不象他的那个兄弟和两个姊妹。1920年共产党建立后不久，他就入了党。1930年，他二十五岁，已在这个组织中担任了要职——布拉格工人区卡尔林区委员会的主席。1935年当选为布拉格党委员会的委员，1937年3月为书记。战争爆发之后，诺沃提尼在莱特尼亚尼的兵工厂工作（他的兄弟最近还在那里工作），同时是处于非法地位的共产党组织的一个成员。1941年9月他被盖世太保① 抓去，在茅特豪森集中营度过了战争年代的大部分时间。

1945年春回到布拉格以后，诺沃提尼作为布拉格区党组织的第一书记，开始加强他在党的领导阶层中的地位。这是关键地区的一个重要职位。当时诺沃提尼四十一岁，他自己和党的前途都是光明的。共产党在捷克斯

① 盖世太保，德国纳粹政府的秘密警察。——译者注

洛伐克博得了许多政治声誉，成为最大的政治组织。党的主席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从 1946 年起是总理）不时地指出，存在着一条特殊的“捷克斯洛伐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尽管这样，1948 年 2 月，共产党在这个国家里成功地获得了绝对权力。（关于采取这个步骤的可能原因的讨论情况参看第八章。）共产党不但把它的组织和成员在政权中取得的地位巩固起来，并开始利用其声望进入国家机构的各部门。掌握越来越大的权力，是出于要绝对控制的欲望。毕竟，特殊的捷克斯洛伐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没有的。党的领导人决定按照苏联模式行事。

二月胜利之后，党的中央委员会立即决定发动一个大规模发展党员的运动。党员人数准备从一百四十万零九千六百六十一名发展到二百万名。1948 年 8 月末，党员人数却上升到了二百六十六万四千八百三十八名。诺沃提尼在自己的区内大力推进发展党员的运动。在布拉格，党是向所有人敞着门的。答应入党常常是出于恐惧，或是为了向上爬。例如，有一个党的官员带着入党申请书来到布拉格某市政企业的会计处，六十五个职员中仅有十一个人不接受申请书。这个党，特别是在它的重要的首都地区组织里，塞满了一大批现代俚语所谓的“红萝卜”，即红皮白心的党员。

在 1948 年党员队伍强行膨胀之后，党内生活中接踵而来的重大事件就是清洗（第八章对这些情况和以前的政治犯恢复名誉问题联系起来作探讨）。1949 年末，第一

批共产党员丢了官并被投入监狱。党被置于斯大林的影响之下：党的某些领导人欢迎这种新发展，他们把前程寄托在它的推进上。第一批安全“专家”从莫斯科到来：1950 年 5 月宣布建立国家安全部。安托宁·诺沃提尼当时还不是党的领袖，但在第一次大逮捕浪潮之后，就成了一名领导人。1951 年 9 月，他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六名书记之一；1951 年 11 月 27 日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被捕，12 月 6 日被开除出党的主席团。同一天，诺沃提尼接任了斯兰斯基在主席团中的职位。他把自己交给来布拉格监督清洗的斯大林和贝利亚的专家们安排。1967 年当他为自己的政治生命而斗争时，诺沃提尼一定希望党的官方历史（《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史》，布拉格，1961 年版）没有写下面这段话就好了。这段话是：“他的丰富革命经验对党的领导作出了重大贡献。布拉格区党组织——共和国最大的党组织——是那些同斯兰斯基反党活动作斗争最成功的组织之一。”

1953 年 3 月，共和国总统、党的主席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率领捷克斯洛伐克官方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回到布拉格三天之后，哥特瓦尔德就死了。安托宁·诺沃提尼是“治丧委员会”委员，又是这个已故领袖的扶柩者之一。主持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工作数月之后，诺沃提尼竟一跃而为第一书记，爬上了党内最高地位。这是一个取消党的主席和总书记两个不同旧职位之后而设立的新职位。

虽然，他的权力已经由党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诺沃提

尼还是以哥特瓦尔德为榜样，在国家政权中为自己设置了平行的职位。他于1953年任副总理，1957年当上了总统。这一年，诺沃提尼对自己的伟大取得了终极的证明：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天山山脉的一座山已命名为诺沃提尼山。诺沃提尼体制主要的特色之一，就是党渗透到国家机构中去，国家工作人员也渗透到党的机构中来，从而相互影响，扩大错误。

数以千计的公开言论和照片，是诺沃提尼深受苏联领袖们影响的证据。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诺沃提尼还在仿效这个已故独裁者，在人民中树立自己的形象。这对诺沃提尼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是一个纤细的、轻量级人物，刚能拿起斯大林的一只烟斗。他要采取斯大林的许多更具戏剧性的公开露面方式显然不行，譬如说，穿着白色的元帅服抵达柏林瓦砾堆中的滕班尔霍夫机场。因此捷克人必须忍受一种可怕的、一点儿也不伟大的个人崇拜。当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为自己树立了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时，诺沃提尼为了要使人感到他平易近人，虽然作了几个逗人发笑的尝试，但是他更习惯于模仿斯大林的作风。苏联及其领袖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前所未有的最好的“教师”，这句话对诺沃提尼倒不是一句空话。在他的行动中不时地如此缺乏独立性，必然使俄国人也为之吃惊。

诺沃提尼是不令人喜欢的、不孚众望的，可是他的权势却越来越大。他虽然出身于工人阶级，但不是一个工人领袖，如同他的前任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那样。虽

然他年轻时就参加了党的创建，但他并不是一个革命者。他缺乏革命实践和同工人在政治上直接联系的经验。在本世纪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中，诺沃提尼的经历是跳过了整整一个必经阶段的：他虽然做了官，可从来不是革命者。他进入党的领导阶层，是由于他忠心耿耿地做行政工作和一直跟着党的路线走：那是符合唯唯诺诺做官条件的。他有呆板的品质，而那时这些品质是很吃香的。大家钻在一大堆行政工作里，无暇过问政治问题。

上一代的政治家们象迪斯雷利①、列宁、奥托·鲍尔②或托马斯·马萨里克等，除了行使政治权力外，他们还仔细考虑到它的性质、它的效用以及它的限度，而这种应该注意的事在诺沃提尼及其朋友的思想中是没有地位的。他们充其量不过把自己当作单纯行使权力的人。对他们说来，一切政治问题都可以化为技术处理的问题。他们的语言是属于绘图室或工厂里的。当党的领导人要动员党员、再由党员去推动非党员行动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动员过程看成是巨大的设计蓝图上由杠杆和传送带调节的螺栓与螺母在运转一样。

诺沃提尼是一个党的机关工作者、一个组织工作者；他实现了对党组织的绝对控制。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的政治生涯却靠边或中断了，因为他们所作的政治抉择远离了党的路线，或者因为他们坚持不了令人厌烦的日常行政工作。诺沃提尼没有这些不利因素。他的高明程度足

---

① 迪斯雷利(1804—1881)，英国政治家、小说家。——译者注

② 鲍尔(1881—1938)，奥地利政治家。——译者注

以掌握这个组织的结构和运转。

从诺沃提尼登上党的最高领导地位那一天起，他从不放松他每时每刻对党的工作的控制。他同党的许多最高部门保持着不断的联系。诺沃提尼深知党的机构内情，并有操纵它的技巧，这一点甚至他的敌人们也不能否认。

诺沃提尼注意把忠于他个人的人安插在自己身边。他控制所有的重要任命以及党和国家的"干部政策"。他采取恩威兼施的办法，使自己的地位无懈可击。党的纪律神圣不可侵犯，达到了军纪的标准。任何不同意见都是不能容忍的：如果有那么一些勇敢的或愚蠢的人提出不同意见，那就实际上等于自己要求辞职，至少是有损于自己将来晋升的前途。给不同意见贴的标签信手可拈：修正主义、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极端主义。如果这些标签用完了，那么就代之以"反党的反对派"或"反社会主义"之类的罪名。党员们知道几个党员想在私下里碰碰头，就得冒被说成甚至被指控为搞"派别活动"的危险。有一次，诺沃提尼曾说他的一个同志的讲话"方向不对"。这个含糊的、指责的字眼在党的各级组织里传了开来，竟把一个人的政治声望全毁了。(见奥塔·希克文，原载《文化报》，1968年3月29日。)

诺沃提尼大约用了四年时间，来巩固他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这时，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穿着将军的制服躺在维特科夫陵墓的无盖灵柩里，被一股强烈的粉红色的灯光所照亮。但是布拉格城里没有高明的防腐师，

因此这个展览没有持续很久。好几年来雄伟的斯大林塑像一直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布拉格。1956年，赫鲁晓夫对“二十大”作了报告之后，这座塑像就被拆去；政府拒不接受某西德公司购买这一大堆废铁的建议，捷克人对这种浪费感到震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诺沃提尼和他的斯大林主义的体制，在斯大林塑像消失的时候却变得根深蒂固了。

诺沃提尼体制运转良好，几乎有十年之久。这样，他就同时有可能和必要绕过中央委员会行事。在他的党内，大一点的协商机构是没有地位的。新的中央委员要花相当时间，才能搞清楚中央委员会的职能。由于他们是诺沃提尼委派的，当他们发现中央委员会只是一个表示同意的装点门面的机构时，他们通常是不在意的。权力集中在主席团，主席团的十个委员全都是诺沃提尼一手提拔的。

权力如此集中，实际上是有一些弊病的。诺沃提尼把一批和自己相似的人安置在身边——他们都是通过党的机构升上来的。他们同诺沃提尼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权力较小，并且又是依附着他的。他难得征求和获得专家的意见：即便当他征求和获得专家的意见时，这些意见也是并不高明的。主席团从不将它的广泛的权力中的任何部分委托给其他人行使，因此，诺沃提尼和他的同伴们面临着大量工作，而其中很多是琐碎的和不重要的。内阁部长和工业系统的高级官员习惯于照章办事，并依赖诺沃提尼和主席团为他们作出决定。这种依赖性给诺沃

提尼和他的主席团造成极大的负担，并损害了较低各级人员的个人主动性。

有一次，主席团的一个委员同诺沃提尼发生了尖锐的冲突。鲁道夫·巴拉克，1954年到1962年为内政部长，1956年曾任调查1950—1954年间政治审讯的一个党的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个委员会于1957年向党的领导提出了调查报告。两年以后，巴拉克在一场重病之后开始和诺沃提尼争吵。(«文化报»，1968年4月5日。)他攻击诺沃提尼的权力地位，主张把诺沃提尼的党政职权各自分开。由于他的计划在主席团里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巴拉克显然就偷偷地给赫鲁晓夫写信。他把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困难同清除个人崇拜的缓慢和没有决心联系在一起，他还暗示主席团的一些委员曾参加过政治审讯的准备和组织工作。赫鲁晓夫把巴拉克的信转给了诺沃提尼。(«证据»第28号增刊，1966年春。)主席团内的这次斗争，即以巴拉克的被捕告终。1962年，他以盗用公款的罪名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同时，由于他对政治审讯问题作了错误和无用的报告，而在党内受到谴责。

巴拉克两次被击败了。他已在同诺沃提尼面对面的斗争中挫败，于是就当了替罪羊。他是第一书记用人的手段的牺牲品。一个不得人心的公开措施，一个试探性的气球，党内一件反应很灵敏的事情。每一次诺沃提尼都没有丢脸。他是走运的。自愿出来承担责任的人，倒是始终不缺的。

然而如果巴拉克坚持认为捷克斯洛伐克非斯大林化的进程太慢，这倒是相当正确的。在这个独裁者死后，诺沃提尼仍在促使斯大林影响的扩大。斯大林塑像只不过是唯一消逝了的过去时代的遗迹。但是赫鲁晓夫和俄国领导人，对这种做法却没有理由反对的。

1956 年，诺沃提尼在莫斯科听了赫鲁晓夫的著名演说。他回到布拉格之后，根据这个演说摘要印成小册子，只发给党的高级官员过目。但是，在波兰的骚乱和匈牙利的革命之后，布拉格的平静一定是使莫斯科特别感到快慰的。在布达佩斯的坦克背后，援助必须跟上。欧洲的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成了俄国的经济负担，大概还是战后第一次。俄国人为什么喜欢有一个象诺沃提尼这样的人来管理布拉格是有其充分理由的。绝对忠于莫斯科的诺沃提尼，深知如何管教他的国人切莫发生越轨行动。甚至他所采用的方法，也对莫斯科有利。为了消除斯大林主义某些顽固不化的最坏的部分，赫鲁晓夫已给各地当权的共产党人（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在内）指明了道路。

诺沃提尼是真正崇拜赫鲁晓夫的，因此对他 1964 年 10 月的垮台颇为伤感。赫鲁晓夫的垮台发生在他俩同去斯洛伐克某地温泉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假期之后。诺沃提尼一得到赫鲁晓夫垮台的消息，就向苏联的新领导人发了一份电报。电报说，捷克人对于赫鲁晓夫的不幸感到难过。这是诺沃提尼一生事业中几个策略上的错误之一。

长期以来,诺沃提尼政权的面貌,在外界看来是稳固的、自我满足的。总统曾有几次会见过西方记者,他的谈话是愚钝与狡黠参半。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单调的、不吸引游客的地方,仿佛已同苏联外交和经济体系完全统一起来。从来没有人越出过这条界线。诺沃提尼体制的缺点和弱点,只是在他开始为自己的政治生命而斗争的时候才暴露出来的。

1967 年早春,这场斗争已经认真地开始了。涉及的主要问题,是有关经济、言论自由和斯洛伐克的问题。主席团委员伊里·亨德利赫,是这一年为诺沃提尼对付困难局面的主要人物。他们曾在茅特豪森集中营一道度过战争年代,1951 年 9 月又同时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书记。诺沃提尼正准备着用他牺牲巴拉克的同样方式来牺牲亨德利赫。

在 1967 年 2 月 8 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亨德利赫一面赞成走得很远的经济改革方案,一面却主张对艺术维持原有的限制政策。这是一篇拙劣的演说,段落之间互相矛盾,通篇内容破绽百出。亨德利赫反映了诺沃提尼的观点,认为新的经济措施能够与旧的文化政策携手并进。中央严格控制经济、政治恐怖和严格控制与统一管理所有舆论工具,本来就是斯大林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亨德利赫讲得好象一个组成部分可以完全去除,而丝毫不影响到别的组成部分。1967 年 5 月中央委员会再次考虑这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劳动力使用上的浪费,大量未完成的基本建设工程,生产跟不上对外贸易需

要，都受到了批评。1967年度的基本建设投资被削减了十亿克朗（此时的官价汇率为二十克朗兑一英镑），并采取了紧缩信贷的政策。经济情况是灾难性的，诺沃提尼不得不征求外界的意见。

但是，他只是在绝对必需时，才对压力让步。1967年5月18日，中央委员会会议闭会后几天，国民议会里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一个来自比尔森的年轻共产党议员、砖工雅罗斯拉夫·普鲁津涅茨，代表二十一个议员对几部捷克斯洛伐克新影片提出了抗议。抗议涉及薇拉·希提罗娃的《雏菊》、扬·涅麦茨的《宴会与客人》，还有其他一些影片。普鲁津涅茨向部长们质问道：

> “这些艺术家毒害诚实的劳动人民精神的勾当还要搞多久？他们把我们的社会主义进步踩入污泥的勾当还要搞多久？他们这种损害工农神经的勾当还要搞多久？总之，你们究竟想要引进哪一套民主？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同志，你们既然相信我们的边防军是在完成抵御外敌的战斗任务，那么，为什么要把大宗款项去拨给我们的内部敌人呢？农业部长同志，我们是在让他们糟蹋和破坏我们的劳动成果呀！”（《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布拉格，1968年，第136页）

要让制片人和所有捷克的知识分子明白：他们在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方面走得太远了。这篇向国民议会发表的演说，充满着令人不快和咄咄逼人的调子。普鲁津涅茨先生对知识分子所作的不寻常的、威胁性的攻击，只不过是诺沃提尼管理经济方针的延长。

根据官方的理论，这个国家是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官方用语是“脑力劳动者”）的联盟为基础的。但是几年来，诺沃提尼体制的目标是建立和维护一个有严密组织的社会——中世纪行会的现代变种。（参看卡雷尔·科希克从1968年4月11日开始在《文学日报》写的一系列文章。）事实上，这三个阶级正在日益隔绝起来。工厂由工人掌握着，土地是农民的，而图书馆则由知识分子包了下来。同知识分子隔绝的工人，在政治上已不再发挥任何作用。农民已从政治生活中消失。这个国家已经走在“变成讲捷克语的小麦消费者和钢铁生产者”的道路上。官僚成了领导阶级，在这官方承认的三个阶级中间充当唯一的纽带。只有它掌握必要的全面情况，并能运转这个体制。早在1956年3月，当他达到登峰造极之际，诺沃提尼对中央委员会说，“在司法和安全保卫方面的工人”已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工具”。工人阶级被剥夺了它的历史使命：上层官僚已无需作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表演了。

因此，1967年5月普鲁津涅茨对国民议会提出质询的目的，是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散播不信任，并使他们依旧分开。随后，诺沃提尼被迫亲自来到工厂，警告工人要提防一种恶劣的“会使工人重新受奴役的知识分子专政”。

当诺沃提尼时代的新的分裂在全国产生时，旧的分裂正在弥合之中。1948年之后，在共产党员与非党群众之间存在着差别。非党群众占大多数。（例如，1949年这

个党有二百三十一万一千零六十六名党员，而据1950年的人口统计材料，捷克斯洛伐克的总人口为一千二百四十六万四千三百八十四人。）非党群众认为党员们是一个团结的、掌握情况的集体，能够参与重要的决策。党员不准同非党群众讨论党的事务（这终于意味着包括一切政治问题）。但是非党群众对于党员的这种看法，不久就过时了。在党内，一般党员承认他们的领导人是全知的、全能的。而反过来，党的领导人把他们的同志的成熟程度看得很低，认为他们不能参与决策。这样，党员与非党群众之间的差别不见了。只是掌权者即"行使权力的专家"和群众之间的差别仍然存在。他们彼此都以无表情的、不相识的面孔相待。掌权者有绝对的权力，但不负绝对的责任。

但是，自从1967年春季以来的每一个月，诺沃提尼体制无不在经受严峻的考验。1967年6月10日，布拉格追随苏联之后，和以色列断绝了关系。1955年以来，捷克斯洛伐克已完全卷进了中东。就在那一年，捷克人签署了向埃及提供武器的第一个协定。接着是同叙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军火交易；互派军事代表团；埃及的飞行员在捷克斯洛伐克受训。

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在莫斯科召开紧急会议——诺沃提尼和总理列纳尔特出席——之后一天，1967年的6月10日立即展开了外交活动。6月11日，诺沃提尼作了中东危机开始以来的第三次演说，指责以色列侵略。外交部也紧紧跟上。1967年5月25日，外交部指控以色

列勾结“与石油垄断企业有直接联系的帝国主义集团”，在中东制造紧张局势；6月6日，外交部声明说，以色列早一天发动了战争，因此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构成了侵略。

官方政策的不得人心，还不仅限于寓居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社会。对在五十年代早期那些可怕的日子里，关于帝国主义的带有反犹太主义调子的惯用词句，人们记忆犹新，当时对斯兰斯基等人的审判正在准备过程中。那时这个国家正处于一种被包围的状态：相互猜疑和分裂的人民，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已被割断了。听了1967年夏天的官方宣传，许多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可能会感到：过去十五年来事情变化得很少。接着，阿拉伯军队迅速的绝对的失败，更不能使人民进一步去支持他们政府的中东政策了。

第三章　作家协会的状况

6月27日至6月29日，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布拉格举行。除了教育部长、文化和新闻部长以及照例还有一个党的代表团(由伊里·亨德利赫率领)一起参加之外，约有四百名作家出席了大会。大会在交通部大会议厅里举行，诺沃提尼始终没有来。这次代表大会几乎完全是捷克人的事。斯洛伐克的作家们自行作战，他们不要来自布拉格的任何帮助。

捷克人不曾有过几个专门为消遣而写作的作家。在他们的传统里，政治与文学已经携手并进，所有他们的主要文学家一直是在跨越写作与政治之间这条界线。早在十九世纪，他们的语言、甚至连他们的民族性就已成了问题。捷克语几乎完全是乡下话，是农民的语言，简单而粗俗。新兴的中产阶级——移居城市的农民的后代，面临着一种简单的选择。或者同他们的德国环境溶成一体，或者使他们的捷克个性保持不变。他们选择了后者。在树立他们的民族意识和建立他们的语言方面，捷克作家起了主导作用。1917年5月，作家们的宣言已给哈布斯堡帝国签署了死亡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某些出名的作家是共产党的党员或同情者，并且是共产党的日报《红色权利报》

的撰稿人。伊凡·奥勃拉赫特[1]，马丽亚·马耶罗娃，约瑟夫·霍拉在这家报纸工作；伊里·沃尔克尔[2]，海伦娜·马里罗娃，维捷斯拉夫·奈兹瓦尔，符拉基米尔·范丘拉[3]为该报撰稿。斯美塔那[4]和马萨里克的传记作者（只涉及他们的早年时期，描写细腻）兹德尼克·尼耶德利[5]是这家党报的音乐评论员，战后他在政府里担任高级职务。他经常与《红色权利报》的编辑争吵。当他认为他们在文艺政策上过于感情用事时，便对他们说，“一个过于感情用事的革命者是惹人讨厌的”。

“共产主义的语言是冷酷的”，卡雷尔·恰彼克[6]在1924年的一篇论文《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中写道，“这不是感情问题……只有下流人和蛊惑人心的人才是不讲感情的。如果不是出于感情的原因，你就不会将一杯水递给另一个人。”恰彼克最不喜欢共产主义的，是它的“特有的阴沉”。他站在穷人一边（“摇动这个世界，然后去看看埋在瓦砾堆下面的是些什么人”），但是他认为：

“尽管党的纲领里有着不少谎言，无产阶级的文化还是没有产生：今天我们没有民间文化或宗教文化，是中间的、

---

① 奥勃拉赫特(1882—1952)，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编辑。——译者注

② 沃尔克尔(1900—1924)，捷克诗人。——译者注

③ 范丘拉(1891—1942)，捷克医生、作家。——译者注

④ 斯美塔那(1824—1884)，捷克钢琴演奏家、指挥、作曲家。——译者注

⑤ 尼耶德利(1878— ？)，捷克斯洛伐克学者、科学院院长。——译者注

⑥ 卡雷尔·恰彼克(1890—1938)，捷克新闻工作者、剧作家。——译者注

所谓知识分子阶级保存着文化价值的遗产。如果无产阶级要在这个传统中占有其地位，譬如它这样说：好吧，我将把现存世界连同它的一切价值都接收过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握握手并且试试看。但是如果共产主义向前推进并将所谓资产阶级文化当作不需要的废物抛弃，那么就再见吧……”

恰彼克谴责共产党人剥削穷人，在光荣革命的黎明到来之前，对他们的剥削是不会减轻的。

“对于同文明世界的其余地区被隔绝了的无产者，我特别感到遗憾，他们除了革命会带来喜悦的希望之外，没有得到任何其他东西。共产主义已在他们和世界之间树立了一道障壁。你们，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举着色彩明朗的盾牌，站在他们这些新来者和为他们准备好的一切之间。”

其后，卡雷尔·恰彼克反对希特勒的独裁。他死于1939年①，即在德国人可能向他下毒手之前。他的哥哥，画家兼作家约瑟夫·恰彼克②则死在一个集中营里，许多出色的共产党员作家和知识分子也遭受同样的命运。

1948年，新的共产党政府对作家们的期望很高。认为他们政治上的忠诚是不成问题的，而且认为他们有帮助党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的意愿也是不成问题的。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新的统治者在1939年以前是党的工作人员，在战争年代里，他们不是在莫斯科就是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度过的。他们过高地估计和误解了写

---

① 根据韦伯斯特：《名人传记大辞典》(1964年版)，卡雷尔·恰彼克死于1938年。——译者注

② 约瑟夫·恰彼克(1887—1945)，捷克作家、文艺批评家、画家。——译者注

作(任何种类的写作)的作用——教育和影响人们行动的作用。比如，对一个写农村的小说家的要求，是希望他能对政府推行农业政策作出积极的贡献。这样就要求他干预原应由专门的农业杂志讨论的问题。各种形式的著作，从假想的作品直到贸易杂志，都因此而遭难。要求作家们——国家的心和脑，成为推行政府政策的没有感觉和不会思考的工具。在人民的眼里，作家的地位降落得比这还要低。有一个作家曾在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星期，病床正好紧靠着一个对政治有兴趣而健谈的病人，在这个作家离开医院时，一个护士对他说："他们把你安排在那间病房里，我们可害怕呢！ K先生讲话很不小心，我们害怕你会向警察告发。"当他询问这个护士为什么有这样想法时，她回答说："我们看了你的身份证，职业栏上写的是'作家'。"捷克作家由于政治牵连而付出的代价是高的，但是他们也不想有其他的出路。他们已在社会的真正中心找到安身之地，而不是象西方作家那样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只比流亡者过得多少舒适一些罢了。

在布拉格，据说党发现安排文学和艺术规划，比制订经济计划要容易些。1967年2月亨德利赫在中央委员会的演说，证实了这个看法。一个极权国家所使用的各种说服与强迫的方法，都在作家和艺术家当中使用了。他们要么支持现行的文化路线，要么就得让他们的作品被打入冷宫。

作家们对社会功利采用了狭隘的解释，他们还必须做到几乎是不近人情的忠诚。约瑟夫·斯克沃雷茨基的

小说《懦夫》，因为它很少提到红军，不符合众所公认的推崇形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坛上遭到了最大的非议。在油画和雕塑方面，任何抽象主义或超现实主义都是不允许的。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和希特勒的爱好是相似的，并且两人都充分贯彻了他们的爱好。在五十年代，和在纳粹占领时一样，爵士音乐成了青年人的地下爱好。戈培尔① 或日丹诺夫② 信徒的最大敌人，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斯坦·肯顿③ 等一大批爵士音乐家及其追随者。他们为拯救东欧青年人的灵魂而战斗，有很多次他们是胜利的。正当哈恰图梁④ 和许多较小的人物庄严宣告反对爵士音乐热潮时，“捷克斯洛伐克洗衣板敲打乐队”或“布拉格爵士舞团”却在布拉格阴暗的半合法的地下室酒吧里大吹大跳。一位十分漂亮的女郎当时曾邀请《懦夫》的作者（他是喜欢揶揄她的）参加党。他拒绝参加，大概也和这个女郎断绝了关系，理由是党反对爵士音乐和海明威⑤。（《文学日报》，1968 年 4 月 18 日。）一种制度化了的和经常是冒牌的民间歌舞——由地区性的歌舞团演出——是这种政策对文化界的唯一贡献。

1948 年共产党夺权后不久，许多官方人士对于哪一种书是需要的，哪一种画是最逗人喜欢的，哪一类音乐是最悦耳的，哪一些影片是最有价值的，他们都有意见。其

① 戈培尔（1897—1945），希特勒的宣传部长。——译者注
② 日丹诺夫（1896—1948），苏共领导人、理论家——译者注
③ 两人都是美国音乐家。——译者注
④ 哈恰图梁（1903— ），苏联作曲家。——译者注
⑤ 海明威（1899—1961），美国小说家。——译者注

中有些意见，无疑地已由文化和新闻部付诸实践了。毕竟这个部多的是能实践的艺术家。他们之中有些人可能认为他们在部里的职位不过是闲差；只是外面下雨时才光临他们的办公室；还有些人则永远不能保持他们的新职位的高风格。多年来，“艺术和文学的方向”就愈来愈受限制了。官员们发现提出不应该写什么、不应该画什么等等的意见比较容易，从而文化体系愈来愈依靠检查了。

1968 年初和平革命后的好几个星期里，布拉格各报登载了过去两年内被禁止发表的文章。在 1967 年秋《文学报》停刊之前，编辑对于每一篇稍微有问题的作品必须有其备用稿。一周复一周，他不是在编一份报纸，而是在编两份报纸。作者们吸取了教训，他们写寓言、历史讽刺作品、童话等来欺骗检查人员。他们知道，一家报纸拒绝刊载，决非意味着一篇文章的死刑。检查人员不能抓住摆在他面前的作品的原意时，偶而也就放松了这个检查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建立在预防的、事先的检查上的，由内务部中央宣传局主管。几乎有二十年之久，出版者在把原稿交给印刷厂之前，必须先由检查员仔细检查。各日报社则还有常驻检查员。

这种情况，捷克人是不习惯的。1849 年 3 月 4 日哈布斯堡帝国颁布的法律早已规定了言论自由。虽然这种权利经常得不到重视，有时竟被停止，1867 年 12 月的宪法宣布了出版永远自由。在第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① 时期，警察检查机关是难得行使他们颁发没收令的

① 指 1918 年 10 月 28 日成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译者注

权利的，而共产党日报《红色权利报》大概比其他任何报纸受害更甚——特别是在三十年代初期。但是事先检查制度在1918年至1938年间是闻所未闻的。

一定是个富有幽默感的人把捷克斯洛伐克新出版法的通过日期定在1967年，因为这一年就是颁布最初的哈布斯堡帝国法律的一百周年。这个新法律把出版权只给予团体而不给予个人，它还要求新办期刊应向文化部申请登记。如果"期刊的出版在技术上、财务上和经济上事先没有落实好"，或者如果这个申请不能保证期刊将"完成它的社会使命"的话，文化部可以不予登记。出版法第十七款说，"如果报道的内容与社会利益相冲突的话，中央宣传局将通知编辑和出版者"。各报刊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除了事先检查之外，还要接受共产党发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这就意味着编辑要接受一系列的指示——一种类似戈培尔博士所建立的控制纳粹报刊的办法。在1967年6月的作家会议上，伊凡·克利马说：

> "具体地拥有一批检查人员的检查制度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长期活动，这就不可能想象它不会变质成为官僚机构，并且再促使自己进一步蜕化，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文学日报》，1968年3月7日。）

捷克人是不会赞扬检查员的。远在一个世纪以前，俄国的公务员、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描绘检查员的精神痛苦时，他至少还能带领读者到检查员的漂亮住所去观光一番。可是他的捷克继承人，却没有类似那样的东西，以便把他们为之献身的工作显示出来。

还有比检查更历害的强制方法。1952年，十五位作家总共被判处二百二十年的徒刑。到1960年宣布大赦、开始释放他们时，他们已服了大约一百三十年的徒刑。司法部给他们所有的人“恢复了”名誉，但这是秘密进行的，好象官员们做了错事一样。对贝特日赫·伏契克博士而言，在他获释时才真正发生了麻烦（参看1968年4月4日《文学日报》的访问记）。他写的关于他获释的文章《理性与正义的胜利》，由于受到检查，始终没有发表。给了这位作家极少的退休金（给予老一代的前政治犯退休金，从二百克朗到四百克朗不等，只够买一双象样的皮鞋，显然不够一个月的生活费），因此，他与司法部交涉要求赔偿。他不满的理由是，他的房子被查抄后，只让他的妻子居住一半，但还是要付房租。同意给予一笔赔偿金，约合这位作家为自已的房子实际付出的房租的三分之一。然后，司法部开始讨价还价了。司法部的官员说，在伏契克博士受监禁期间，每月膳宿已耗费了国家三百克朗；而这位作家则对官员说，他在监牢里是干活的。司法部的代表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如果你不在监牢里，你当然不会在那里挣钱。以下是这位作家自已的评论：

> “你再也不能分清是非，你为自已感到羞耻，你无可奈何地只好同意了这种赔偿‘契约’，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你自已到一个由司法部领导的法院去控告司法部，是没有多大信心的。你同意了，正如你多年前承认你的罪行一样，只是为了求得太平无事，太平无事，太平无事！你恼怒，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再一次会有一种同样受辱的感觉，

即那种个人在压力下孤立无告的感觉。”

在1968年4月的会见中，伏契克博士在描绘了他几年前的生活之后，拒绝谈论审讯他的人迫使他写出“认罪书”的办法。

在最近一篇论文（《文学日报》，1968年5月2日）中，科学家兼诗人米罗斯拉夫·霍鲁勃写道，“消灭字眼走在消灭人民之前。现代世界和现代人类文明的两个来源——科学和文学，是建立在字眼和对象之间的直接和不能改变的关系之上的。”最近二十年来，对待字眼已达到了“屠宰场里的局面”。根据霍鲁勃的看法，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做的事情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却总是被保密的幕布，或者被一种奇怪的沉默遮掩着，这就是所谓的“警惕性”或“警觉性”。公开审判或者是“不存在”，或者说是“公正”的，或是“人民的意志”；遗传学被称为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价格上涨变成了价格“调整”，指派议会代表被称为“选举”。“这种种小丑的做作……使公共生活有一种特殊感受，好象是在什么想象中的国家里过的，在那里，本国语言被改造成为简单的方言”，在那里，“普遍的犯罪感在蔓延和扩大着，这是一种每当知道了现实的黑暗面，但又不得不违心而言时开始产生的犯罪感。”

经过了上面的过程之后，“许多字眼不用了，许多字眼成问题了，而新的字眼却得了癫痫症”。霍鲁勃对诸如“同意”、“我们大家”、“青年”、“选举”、“民主”之类的“新字眼的发热程度”，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在广泛使用之前，

必须对它们从各方面加以衡量和考虑。无论如何，根据霍鲁勃的看法，“民主”在捷克语里的确已是一个非常成问题的字眼。甚至象“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代名词也成了问题：“……它已经封建化了。它不是一般地指人。它作出了价值判断。”

同时，当约七万名政治犯的大军逐步被解散时，文坛开始解冻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作家们，可能已感到他们错过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时的机会，也可能感到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后，又一次错过了机会。他们忧心忡忡，深恐他们的俄国同行、特别是波兰同行当时正在享受的较大自由，将永远不会在布拉格或布拉迪斯拉发降临。后来，它终于降临了，只是降临得很迟。结果，这种自由却比东欧任何其他地方走得都要远。

将来的历史家可能要到捷克和斯洛伐克各报刊编辑部去找寻捷克斯洛伐克之春——现在它不只是解冻——的开始。《文学报》、《文化生活》周刊、《青年阵线报》、《归客》和《火焰》等报刊编辑冒了不少风险。他们受到检查员的干扰，但他们反过来也不让检查员有安宁。这不单纯是一场字句上的持久战。这关系到他们的生活，如果不是生命的话。

拉迪斯拉夫·慕拿斯科是第一个冲破捷克斯洛伐克对文人生活和工作的严谨管制的人。他的《过了期的报道》已于1964年在布拉迪斯拉发出现。这本书先是在斯洛伐克作家的刊物《文化生活》周刊上分期登载，其后卖了三十万册，还经常以黑市的价格转售。捷克人感到惊

奇。有一个捷克作家说:“开始,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了,简直不敢相信作者和他的出版者大胆到如此地步。”(《文学报》,1964年12月19日;参看《调查》,1965年4月。)慕拿斯科的主题是斯大林主义及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他认为这不是克里姆林宫围墙里少数几个人的阴谋,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慕拿斯科接触到对斯大林主义负责(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问题。他曾崇拜过斯大林,但后来在为一家报纸工作时,开始认识到那个制度的私下面貌和公开面貌之间的不同与矛盾。《过了期的报道》的故事,是新闻记者收集的案例那一类的东西;慕拿斯科突出了这些故事的政治和道德涵义,并且准备承担风险。例如,他描写一个党的干部——一个“愚蠢透顶的人”,为了隐瞒他过去的失策,如何组织一个不象样的地方公审。虽然慕拿斯科描写的一些人物没有跳出老框框,而且他也并没有作出深刻的探讨,他的短篇小说集毕竟是一个创举。

在一段长时期里,既没有人重演,也没有人追随这样的事情。在米兰·昆德拉于1966年拿出他的小说《开玩笑》的原稿之后,由于检查员希望作者删去一个通用术语,它的出版被拖延下来,这种术语是用于因政治上不受信任而没有武装、做重体力劳动的士兵队伍的。检查员的解释是,这些部队在法律上并不存在。这本书在下一年问世和1966年卢德维克·瓦丘利克的《斧头》一书的出版,已成为自战争结束以来文坛上的主要事件。瓦丘利克和昆德拉两人是四十出头一些的人,全都出生在摩

拉维亚，一直是新闻工作者。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小说描写那些试图和自已过去妥协的人，作者在两本小说里都是以故事叙述者的身份出现的。

昆德拉所取的那个书名“开玩笑”，牵涉到一个青年人的一生。一个党员又是布拉格大学学生会的干部在1948年的假期中，写了一张明信片寄给一个庄重而漂亮的一年级女生，那时她在乡下接受意识形态方面的训练。(这个女生的庄重就是那个时候流行的“不皱眉头，只带笑容”。因为每一个人如果自已不表示他的日子过得挺美，“就会立刻使人怀疑他是对工人阶级的胜利不高兴，或者使人怀疑他是自私地沉溺于某种个人忧伤之中，但也决不是罪名较轻些。”)明信片上写的是：“乐观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托洛茨基万岁！”他在大学里的同志们却不认为这是开玩笑。他被开除出党，被勒令退学。他政治上受到怀疑，在各矿区服兵役，并超期了好几年。1956年后，他终于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受雇于布拉格某科学研究所。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他遇见了过去和他在一起的某同志的妻子(两人的“结婚是党的纪律的一部分”)，他认为这个同志对他被党和大学开除应负责任。他和这个女人在叙述者的故乡摩拉维亚某处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地方会见，以及他企图通过侮辱这个女人(他的同志的妻子)来为自已报仇，这两方面就是这部小说的轮廓。

斯大林主义统治捷克斯洛伐克早期的情景，在各矿区的气氛和摩拉维亚乡村小镇的情调，真是呼之欲出；那种凄苦的情绪是作者自已的。乡下学生小橱里的东西，

错把泻药当作安眠药服了，因而自杀未遂等等，这些描写确是非常诙谐的。但是，他的主要兴趣是在道义方面，通过对人的动机作出具体分析来说明道义感，也通过道义感来说明人的动机。如此凶狠地误解无恶意的开玩笑固然是错误的，而隔了如此长久之后还在寻求报仇，同样也是错误的。叙述者发现：他的许多年前的同志早已和妻子分居；他们的婚姻象党的纪律一样已大不相同了；甚至对她施行肉体上的惩罚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个女人是一个受虐狂的患者。

读了在1967年初刚出版的昆德拉这部小说，不禁令人为作者的前途担忧。因为诺沃提尼，他的保守派，以及他们的检查员们的地位看来都很牢固，他们还在热衷于"制造假证据"。比昆德拉的小说早几个月出版的卢德维克·瓦丘利克的小说《斧头》，则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相同的主题。《斧头》是一部有诗赋素质而不是小说素质的作品，情节写得非常紧凑。

昆德拉书里的故事叙述者认为自已是失败的，而瓦丘利克的叙述者毫不羞愧地认为自已是成功的。后者在布拉格当新闻记者的现实和他在摩拉维亚的过去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矛盾；他也是一个只有了解他的过去才能了解他的现在的人。（书的最后一段开头就有这样一句话"我通过这样做学到了很多东西：一种崭新的、清晰的感觉"。）同昆德拉的故事叙述者的过去相比，他的过去私事要多一些，政治要少些，但政治还是不断地要闯进来。《斧头》里的主人公终于回到了面目全非的乡间。他希望

了解那种改革的性质及其对那些从事于改革和受到改革损害的人们的影响。

战后，他那工人出身的父亲，已成了共产党的一名地方干部。他同亲友争吵，他们大多数人正和他一样的贫困和同样的倔强。由于改革，他也许比他们受到损害更大些。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初期，党和地方上的官员常遭袭击，他领到了发下来的一支手枪，可是他想到的是用它来打自已，而不是打他自已的人民。到了晚年，他是感到困惑的，因为他的长子——故事叙述者——对要求遗产不感兴趣。这份遗产就是他父亲造的那间可怜的农舍，它“在完工以前，就已经陈旧不堪了”。

在这部小说的最后和最有份量的一章里，瓦丘利克的讲故事的人，描绘了他到邻近的叔叔和婶婶的农舍去访问的情况。（“确实知道我要去访问的只有我自已。”）他的叔叔（曾同他的父亲对党的农业政策争论得很厉害）“现在已是老态龙锺，好久以来没有说过新的词句”，他只是希望知道“……你没有过象你的老爹那样艰苦的生活吧。是这样吗？”他的堂弟查尔斯在几次短期的非熟练劳动中把他的笨拙的农民气力用过了头，战战兢兢地同这个世界保持着休战的关系。在干了一桩特别赚钱的工作之后，他买了一架价钱很贵的钢琴（这个新闻记者知道他本来是买不起的），他自已校音，把每个单键的三根钢丝搞成不同的音调，一根偏高一些，一根偏低一些，还有一根则“特别为了巴哈①”而校正；现在他演奏巴哈的曲子，

① 巴哈（1685—1750），德国作曲家。——译者注

他的不灵巧的手指“只是在别处有绝对需要时，才离开琴键”。查尔斯之所以不喝酒，是因为当“别人喝得烂醉如泥，眼看着就要完蛋”的时候，他不想同流合污，以便保住他的那架钢琴，保住他的那种极力维护的独立地位。他从来不向当权的人诉苦；他对这个时期的粗野、不诚实和完全缺乏正义毫不介意：“这个时代喜欢人们的更蠢部分。就让它这样吧，但不要包括我。”

这个讲故事的人赞同、甚至羡慕他的堂弟，但知道他自已可不能那么容易地作出选择。他在布拉格已作了政治上的决择，承担了义务。他是一个新闻记者，他知道：“写出既能发表、又能多少保持个人自尊心的东西，可不是易事。”有一次，他被派去调查“一个罕见的女子——她立意要过艰难的，或甚至更糟的生活”——所提出的控诉。调查报告使许多当地人感到不安，这个女子自杀了。那个曾经检查过她的医生（但后来在向调查委员会提出证据时，他却犯了制造伪证罪），事后解释他的欺骗行为时说：“她的节操比之那些被选为人民代表的杂种要纯洁得多。”

这个女子的父亲由于不知道女儿已死，殴打了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因此被送进了一所由某个老医生管理的精神病院，这个医生相信园艺对精神病有疗效。瓦丘利克只用了寥寥数笔，一下子就把这个精神病医生那种独特的痴狂勾划出来了。这个医生认为，自然选择的办法还不完全，譬如说在过去是通过气候来达到自然选择的，而现在则是通过“施加社会心理的压力”。当问到这是不

是他自已的看法时，这个精神病医生说不是，他的看法是从西方得来的，它在西方已是一个众所公认的理论。然后，他补充说由于“西方社会在认识自已的状况和管理它而采取的行动之间”是脱节的，他是厌恶西方社会的。这位精神病医生后来以自已的见解对捷克的思想界作出了贡献：“我宁愿我们现在仍然是一个落后而愉快的国家。你认为怎样？俄国在所谓工业社会的崩溃中将能够幸存，基本上是因为它没有完全受到这种社会的影响，因此，它在接受由于这种社会的崩溃而必然产生的制度时，不会受到损害，而且精神上是健全的。”

瓦丘利克的新闻记者兼故事员，在为这个女子操心时遇到了一些麻烦。他准备为自已辩护。他没有接受别人为他作出的辩护，说他“本意是好的”，他也没有依赖他的无可非议的工人阶级出身。他不再想搞那种“对自已进行恐怖统治”的事情，而这正是党对每个党员的期望：“捷克的发明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如此民主地对我们自已进行恐怖统治，以致没有需要去谋杀任何人了。”

文坛上这两部书的出现，有如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扬那切克[①]音乐所产生的冲击。它们在某种新鲜感、坦率以及内在的情节紧张方面，有其共同之处。在过去两年里越来越多地出现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这类作品中，它们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这种写作竖起了历史的里程碑；它医治了“字眼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它为政治方面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它具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

① 扬那切克（1854—1928），捷克作曲家、音乐评论家。——译者注

不时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自由写作的样本，未能获得党的领导人的赞许。但他们可能已经意识到，只要党没有一个前后一贯的或积极的文艺政策，这些作品还会不断地从检查员那里漏网而出。1967年6月，正当作家们即将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前，早就打算制订一个这样的文艺政策。出版了一本“只供官方使用”的小册子，它的标题很引入注目，名为《文化和新闻部活动草案》，它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声明，说现在有两种艺术：“一种只是为少数人享受的艺术”，另一种“为广大群众”享受的艺术，而后一种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个部似乎曾试图将这个政策付诸实施。少量发行了瓦丘利克和昆德拉的书；为“要求较高的观众”设立了俱乐部，放映了一般是不公开的影片。)这个部建议“要评判文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并评价它们的社会意义”。它准备通过“在文化上采取主动”，加上得到“社会需要”的认可，试图以此来鼓励文艺工作。此外，文学竞赛、奖金、新的版权制度——经济改革的回响——都将被用来进一步刺激文艺工作。

1967年夏，当作家们开始来到布拉格出席代表大会时，他们已经定下同党的官僚机构有争议的一些准则。他们希望有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和在什么时候高兴写就写的自由；党则要求他们忠诚，不干预政治事务，和必要的时候运用他们的艺术技巧。但是这些定义并不精确，规则太不肯定，争论发展成为一场全力以赴的摔角了。作家们通过他们的作家协会证明是能够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利益和压力集团来行动的。

代表大会开幕之前，作家协会已准备了一个文件，提出了作为讨论基础的建议。这个文件的起草曾在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帮助下，重写了好几次，但党的领导仍然不同意这个草案。它提供的不是一个阐述共同语言的讲坛，而是一个进行格斗的场所。预计到要发生麻烦，因而所有的新闻通讯工具对代表大会的消息都尽量不予报道。

代表大会的第一天——1967年6月27日——上午，米兰·昆德拉讲了话。昆德拉以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的身份曾和意识形态部门一起参加拟定草案初稿的工作。他准知道存在冲突的具体情况。他作了一次内容广泛的重要演说。多年来的挫析和想法为这篇演说的构思作了准备。昆德拉说，大多数国家的人认为他们的国家要生存，那是理所当然的。捷克人可不这样。他们的国家为了要生存曾叩过死神之门：他们在十九世纪有完全的选择自由。他们知道，如果成为德国人，他们的生活将会过得好些，对于他们的子女将有较好的前途。他们完全知道做小国的不利条件，他们（根据斯洛伐克诗人科拉尔①的说法）"所能想到的和感到的都是低人一等"，他们的文明是"平凡和病态的；它不是活着，而只是幸存着，它没有开花，而只是在生长，它不长大树，而只长灌木"。捷克人是睁大着眼睛，审慎地作出了他们的抉择的。他们必须在历史面前来证明他们的抉择是正确的。

他们只有摆脱乡土观念，才能这样做，而这也是他们

① 科拉尔（1793—1852），斯洛伐克诗人和学者。——译者注

所知道的。十九世纪的作家和诗人扬·聂鲁达[1]写道，“如今我们正在承担着把我们的国家提高到世界文明水平的责任……。”所有十九世纪捷克民族的创建人，都知道这一点。他们希望他们的人民在欧洲以及世界各民族中取得他们的地位。昆德拉说，这就是为什么捷克文学创造出了一个不寻常的作家类型——翻译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时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文学人物。这曾是反宗教改革时期以前的情况：捷克人是欧洲第一批翻译伊拉兹马斯[2]著作的。十九世纪荣格曼[3]翻译米尔顿[4]，这才奠定了捷克语言复活的真正基础。昆德拉继续说，尽管这样，捷克人有他们醒觉的时候，也有他们沉睡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他们的语言、作为欧洲的一部分的他们，都是理所当然的。

其后，二十世纪初期，“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毫无疑问，捷克文明达到了它历史上的顶峰”。现在捷克人对于这昙花一现的极盛时期，容易发怀念之情。然而，在他们的文学著作里，

> “抒情的文体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它还只是在开始阶段，它唯一需要的是漫长的、安定的和持续的时间。妨碍这种发展的，首先是纳粹的占领，然后是斯大林主义，一共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捷克文学同外部世界隔绝了，它的多方

---

① 扬·聂鲁达(1834—1891)，捷克诗人、小说家、新闻记者。——译者注

② 伊拉兹马斯(1466—1536)，荷兰学者，宗教运动改革开始时拥护这一运动，后来转而反对，主张在天主教内部进行改革。——译者注

③ 荣格曼(1773—1847)，捷克作家和语言学家。——译者注

④ 米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译者注

面的内部传统被废弃了，它被降低到了枯燥无味的宣传水平，这就是威胁着要把捷克民族最终被摈在欧洲文明外面的悲剧。”

昆德拉然后继续论证说，二十世纪下半叶，“在生活愈来愈国际化”的同时，“各小国语言的有效性愈来愈受到限制”。因此只能因为这些小国语言是重要的，它们是创造价值的，才有理由去保卫它们。昆德拉说，比尔森啤酒①当然也是一种价值，但各地知道的却是它的德文名字，无论如何，这不能证明捷克人有了使用自已语言的权利。“世界现在正在统一过程中，它的未来将会无情地和公正地要求对我们一百五十年前所选择的国家存在的道路进行评价，它将会问到我们为什么这样选择。”

演讲人小心翼翼地提出来的第二个论点是，捷克文学是一种平民文学，完全没有贵族文学的味道。捷克文学同整个国家的“腹地”有密切的联系，“强烈地反映了它的声音”，也过分地依靠了它的公众，过份地依靠了它的容忍程度和文明水平。“对于我们目前的文明正在丧失欧洲的特征这一点，有时使我吃惊，而这个特征同捷克的人道主义者和信仰文艺复兴运动的人的心是如此紧密地相连的。”

昆德拉认为，捷克文学和艺术的前途如何，这取决于它们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我知道一提到自由，有些人就会气急败坏地回答说：每一项自由都必须有它的限度。当然，每一项自由根据当

① 比尔森啤酒是捷克比尔森市的名产。——译者注

代知识、教育和偏见等状况，都有它的限度。但是，哪一个进步时期从来都没有设法去确定它自已的极限！……只是，在我们的情况下，守卫边界如同越过边界相比，仍然被认为是更大的美德。”

虽然昆德拉用了很大的气力技巧来说明他的论点，但是，在他的演讲快要结束时，他放出了一阵他自已独有的炮火。他说，他不喜欢把法西斯主义同斯大林主义等同起来。法西斯主义并不产生什么复杂的道德问题，因为它不触动人道主义原则和美德，而是一古脑儿加以反对罢了。斯大林主义则不是这样，它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的继承者，它保持了这个运动的许多原来的观点、理想和口号。“看到这样一个人道主义运动正在走上相反方向的歧途，正在摈弃人类的种种美德，正在把爱护人类改变为残害人民，把爱好真理改变为指责真理，这就使人们大开眼界，看到了人类价值和道德的真正基础。”

整个国家的历史，不仅包括斯大林主义统治时期的生活情况，而且包括法西斯主义统治时期的生活情况，并且因为有民族问题而丰富了民主的经验，——所有这些就是我们时代的实质问题。二十世纪的真正面貌就是这样形成的。

“这个国家在二十世记里的经历大概要比其他许多国家多些，如果这个国家的天才经常处于觉醒状态的话，说不定还会知道得更多些。这种知识就可以用来消除现有边界的限制，并超越当前我们对人和人的命运的认识的限度，从而赋予捷克斯洛伐克文明以鉴别力，成熟性和伟大性。”

昆德拉在结束时问道：捷克人可知道他们是有这个机会吗？准不准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呢？（1968 年 3 月 21 日的《文学日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演说。）

在昆德拉作了挑战性的报告之后，亚历山大·克列门特和爱德华·戈尔德斯图克谈论了政治与艺术之间的冲突；帕维尔·科霍乌特抨击了政府的中东政策。第二天，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 A·J·利姆，对欧洲各种类型的文化政策作了不偏不倚的分析。例如，谈到文艺复兴时，利姆认为“各种主义的维护者之间的竞争”有助于使宗教和中世纪国家的文化政策相互分开。“使贵族特权民主化”的十九世纪中产阶级，给艺术家和作家以自由，但也驱使他们走向市场。纵观整个十九世纪，终生潦倒的艺术家比比皆是。

文化市场在当时主要是少数人的市场，只是在过去二十年的消费社会里才改变了这种情况。“最后，自由主义用自己的方式甚至使文化民主化了，这种民主化真是既令人感动，又使人艳羡。”不过利姆指出，自由主义是以同样的热情在促进高质量和低质量作品的。

利姆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就是要把文化从双重压力（政权的压力和销路的压力）下解放出来，然后使人人都能享受它，也使人人都感到需要它。

追溯了历史的发展，利姆分辨了“由于强求一致而被歪曲了”的文化的形形色色的面貌。现在，社会主义文化政策已经历了这么多的灾难，以致捷克人趋向于把西方文化的现状理想化起来。问题在于这两种压力忽儿排

除，忽儿又恢复，根本没有彻底地得到排除。

政治压力应该加以排除，作家和艺术家的自由，除受刑法制约外，应不受任何其他限制。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对文化提供物质上的保证。利姆先生没有解释怎样才能达到后一目标。他指出范围如此狭小的捷克文化市场，无论怎么样也起不了调节作用的。他要求国家让艺术家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为他和他的广大的欣赏者们提供充裕的物质条件。他说，在他看来，美国不一定是第一个达到这个目标的国家。倒是一个“贫穷困苦的社会，甚至是一个为了追求某种能正常运转的社会主义的模式而已经付出和还要付出极不相称的重大代价的社会”却能够作出这种尝试，并首先这样做到。

代表大会的第二天，从作家们内部传出了反对的呼声。大会宣读了由几位作家署名的一封信，其中有老一代的著名小说家扬·德尔达、雅米拉·格拉查罗娃等。这封信指责某些发言人在制造“一种令人神经紧张的空气”，某些发言是在玩弄蹩脚的政治权术。

卢德维克·瓦丘利克的发言，对于正在白热化的气氛毫无降温作用。他开头的一句话，就是瓦丘利克式的老调调：“同志们，我利用这个机会来谈的一些事情，反正你们也是知道的，因为我想就某些具体事情提醒你们一下。”瓦丘利克选择了最敏感的题目：捷克斯洛伐克本身的政治权力问题。

他说，马克思主义对权力的批判，揭露了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之间那种迄今尚未被探明的关系。

“这个发现，以及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观点，为社会革命准备了基础，而预料社会革命对于权力这个老问题是会提出新的解决办法的。我们固然完成了社会革命——但权力的问题依然存在。虽然我们勇敢和果断地抓住了权力，但某些人始终在后面踢着我们。”

政治权力——“人类特殊的事态——影响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并威胁着他们两方的身心健康”。通过千百年来的经验，人类有了某些形式上民主的“交往准则”。但是，这份写得很清楚的关于制约和平衡的大纲，可能会受到资本或军火所有者、家族关系和生产垄断所运用的专横权力的破坏。对它曲解的结果，可能造成“形式上民主的准则是罪恶的根源这一牵强附会说法”。然而，根据瓦丘利克的说法，那些准则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它们不过是一种合乎人情的发明，它们“比较偏袒被统治者一方，但是当政府垮台时，它们却保护统治者免遭处死”。

“政府倒下去，公民就会重新站起来。反之，在政府长期站住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公民是倒在什么地方呢？我不准备讨好敌人，说他是倒在绞刑架上的。只有几十个或几百个公民会有这样的遭遇。我们的朋友知道，这样就已够了，因为这大概接着就会使全国陷入恐怖之中，使人们回避政治，要求极低，只关心一些细小的日常琐事，使人们逐步地愈来愈依附于那些在基层的统治者，形成一种新的和不寻常的农奴制，——所有这些对一个外国来访者都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我认为在我们国家里已经不再有什么公民了。通过多年来在报纸和广播方面的工作，我已经收集到

了证据，我不需要到远处去寻找新的理由。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并不是由我们组织的成员作出决定，而是我们的主子在考虑了他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之后，这才恩准我们召开的。和过去几千年来的习惯一样，他希望我们对他的王朝大献颂辞作为回报。

我提议每一位将要在这里发表演说的人，总得告诉我们他对那些使他烦恼的事情是如何想的。现在我们获得了这样的许可和场所，就让我们象正直的公民那样行事吧。让我们利用自已的余生，犹如我们已经上了年纪，并完全享有我们的合法权利一样。

我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在这里讲话的，这个国家是我永远不会抛弃的，但它却是我不能满意的一个国家。我心里经常想到有关公民们的事情，但是我在这里处于尴尬的地位。我同时又是一个共产党员，因此，我不应该也必须不去议论党的事情。但是事情是这样的，当讨论到某些方面时，几乎没有不属于党的事务范围。我的党和我的政府两方都在尽可能把各自的议事项目混杂在一起，我可有什么办法呢？这也就同样对我们这些在这里开会的公民们造成一种困难的局面。党员不得在非党员面前谈论某些最关键的问题的重要方面，反之非党员也不能参加一些能深入讨论问题的重要会议，因此双方想以平等地位交谈的个人自由是受到限制的。”

瓦丘利克然后继续说：

“我们两个民族的全部历史，已给它们准备了社会主义的前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个国家只需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就重新成为一个政治团体。我不想谈各种各样的分裂因素，但在1945年时并没有其他现成的

规划。”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早就应该联合起来的。

瓦丘利克说，在文学中千百次地描述过的、令人最感兴趣的关于政治权力的法则，是一个很肯定的法则。

“这个法则就是当权者喜欢那些内心世界与他相似的人们。但是，因为这样的人是不多的，他一定还要利用其他合适的人。当然，适合于当权者要求的人们之中，就有渴求权力的人，还有是生来就唯唯诺诺的人、问心有愧的人、不顾道德准则追求舒适、好处和利益的人。他还可能利用那些受过惊吓和子女众多的人，过去被贬谪的人，这些人会深信不疑地接受新的荣誉，——再有则是一些天生的蠢人。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条件下，和出于一定的目的，各式各样的道德至上主义者和象我这样诚实的、但消息不灵通的热心人，也可能暂时会被利用。利用人们的手段是老一套的，其中之一就是散布相互不信任的种子。信任是分等级的，有第一等的信任、第二等的信任、第三等的信任等等，还把一大批人当作是根本不能信任的。资料也是分等级的：有印在粉红纸上的、绿色纸上的、黄色纸上的、以及报纸上的。”

在捷克斯洛伐克，当权者选择他所需要的人。他们是些唯唯诺诺的人、不制造麻烦的人、不提出意料之外的问题的人。每次选择的都是些最平常的人。比较复杂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有幽默感的和有魅力的人都不见了。

瓦丘利克在批评了这个国家的宪法累赘、晦涩和不起作用后，说：

“我认为我们谁都不是生来就喜欢受人统治的，我建议作家协会，或者连同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其他类似性质的协

> 会采取主动，请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的专家对这部宪法提出意见，如果需要的话，则要求修改宪法。
>
> 我站在这里说话时，并没有得到那种喜欢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感，而这种自由感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我倒是感到我正在胆怯地利用公民和当权者之间的某种休战状态，我感到我正在犯罪，因为已对作家和艺术家宣布过某种禁言期。我不知道禁言期将有多久；也许要持续到冬天或者到明天。因为我不相信公民和政治权力能够统一起来，不相信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能够同心协力，所以我也不相信，艺术和权力从此会对他们不得不生活在一起表示赞赏。他们是永远不能和永远不会这样的；他们是各不相同的，是彼此不相适应的。”

但是，他们可能制订出“客客气气的交往规则”。瓦丘克补充说：“不相适应未必就意味着仇恨。”虽然如此，艺术

> “不能放弃它对政府的批评，因为政府之所以是这样的政府，政府之所以有这样的行径，都是各民族文化的产物。
>
> 我所看到和听到的是，当权者只是在他看到和听到很猛烈的反抗时才退却。当权者之所以退却不是由于辩论，因为辩论不会说服当权者；只有当他希望用老办法处理事情而一再遭受失败时，才会使他退却。失败总是要耗费我们的金钱和精神的。我看到好意是经常存在的，我也看到那种过去的坏日子要回来的危险也是经常存在的。”

1967年夏天的那一天，瓦丘利克并不感到怎样安全。他不喜欢“艺术自治”的概念，因为艺术和政治是难于划分的。某些新的和较好的法律是通过了，但是为《文学报》

写的论述集会自由的法律草案的文章还是受到了审查。

“我看不到有任何保证。有哪一类的保证呢?我可不知道。我就在这里结束我的讲话，因为我已讲到了最后的一点，即一个极大的疑团。统治集团、政府本身及其成员，他们自己的个人自由难道有任何保障吗?没有这种保障，就不能有任何创举，甚至也不可能制订出什么政策来。现在我对权力的定律的分析是结束了，我只想提示一个众所周知的信条：在磨坊里，有时磨子会把推磨人碾成齑粉。”

昆德拉、戈尔德斯图克、利姆和瓦丘利克的演说，以及伊凡·克列马对检查制度的强有力的谴责，给会议定了调子。亨德利赫（在代表大会开始时和最后一天）的两次演说，号召大家沿着党的现行路线进行深入的政治斗争，但没有人理睬这个号召。诺沃提尼总统则采取无视这个作家代表大会的态度，而在 1967 年 6 月 30 日作家代表大会结束后次日，却对布拉格党校的毕业生发表了演说。

虽然诺沃提尼提到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教条主义影响”那一套老调，但是他强烈地为党的过去工作进行辩护。他攻击那些批评党的政策的作家，并警告他们说，任何偏离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诺沃提尼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的三天之后，即 7 月 3 日，对两个作家和一个学生进行了审判。一个是帕维尔·泰赫里德，他是捷克血统的美国公民，《证据》杂志的编辑，这份杂志在巴黎出版，在居留西方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中广泛发售；一个是扬·贝奈斯，三十一岁的作家，从 1966 年 9 月起就被拘

留；再有一个是卡雷尔·扎梅兹尼克，电影学院的学生。7月15日，布拉格市法院以“颠覆活动和间谍活动”的罪名缺席判处了泰赫里德十四年徒刑。贝奈斯以帮助泰赫里德并向他提供情报的罪名被判处五年徒刑，而扎梅兹尼克则被宣告无罪。

诺沃提尼总统没有等待这个审判的结果，他于7月5日动身前往苏联度假去了。

第四章　斯洛伐克人和学生们

既有作家的问题又有斯洛伐克人的问题，真是够伤脑筋的了。它们在诺沃提尼当权的最后几个月里，已给他分别制造了许多麻烦。可是一想到在国内还有斯洛伐克作家，该把他吓得更是魂不附体了。

拉迪斯拉夫·慕拿斯科就是其中一个。（虽然生于摩拉维亚，离卢德维克·瓦丘利克的出生地只有几哩之遥，但慕拿斯科一向是用斯洛伐克文写作的。）他的新小说《权力的滋味》的稿子已由检查人员通过并已排版；后来印刷厂却接到通知把版子拆毁。显然，总统个人对这本书太关心了。

自从1964年出版了他的直率、勇敢的短篇小说集之后，慕拿斯科赢得了高级勋章——他于1966年成为“功勋作家”——也获得了沽名钓誉的本事。1967年夏他到国外去，把他的新小说原稿交给了维也纳某出版商，他还出现在当地的电视上，又写了一篇批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和对外政策的文章，然后在1967年8月10日来到以色列作短暂的停留。第二天，他宣布一俟捷克斯洛伐克同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他就将返回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出席法庭受审。8月16日，布拉格声明拉迪斯拉夫·慕拿斯科已被剥夺捷克斯洛伐克国

籍，同时被开除出共产党。他那“功勋作家”的称号也被取消了，顺便还提到了他那“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严重的道德败坏”。

8月下旬，诺沃提尼总统和他的妻子到斯洛伐克作正式访问。

斯洛伐克人正在庆祝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建立中学和马蒂嘉（一个照料旅居国外斯洛伐克人的组织）一百周年。诺沃提尼在图尔坎斯基-马丁的演说，依然是老调重弹。他说：民族问题已经获得解决，再加上斯洛伐克经济成长的统计数字，证明斯洛伐克的利益在一个中央集权的捷克斯洛伐克体制内得到了最好的实现。他指出，列宁本人认为联邦纯粹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总统后来谈到外交事务时说，捷克斯洛伐克的中东政策乃是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的运动。他大胆地把西方列强在慕尼黑时代和在1967年再次扮演的角色作了历史类比：1938年他们曾经支持侵略成性的希特勒，现在他们再次支持以色列的侵略。

诺沃提尼就这样地接触到两个最敏感的问题，是不会使多少听众感到满意的。演说之后，他找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一个书记瓦西尔·比拉克谈论马蒂嘉问题。比拉克抱怨马蒂嘉的旧房子太小；诺沃提尼建议，马蒂嘉的档案应转移到布拉格，并且认为，本来就应该由外交学会去照料旅居国外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这个建议激怒了比拉克，他大声地责问诺沃提尼怎么胆敢作出这样一个侮辱性的建议。总统和他的妻子只好把他的车子和司

机找来，提早离开了庆祝会。

诺沃提尼的举止和演说的调子，对斯洛伐克民族的庆祝会完全是不合适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这一认识传到布拉格是很慢的。1918年之前，这两个民族共同的东西很少。斯洛伐克人居住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部分；而捷克人则居住在奥地利部分。捷克人对他们自己的邦国已经有了历史的记忆，而斯洛伐克人则还没有。多少世纪以来，斯洛伐克人过的是乡巴佬的生活，他们分属于各领主——匈牙利的地主们。某些马扎儿①巨头的最大地产在斯洛伐克；科苏特②就是一个在斯洛伐克出生的匈牙利人。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斯洛伐克人经历了一次类似捷克人的民族复兴。他们产生了第一批诗人和第一批历史学家。在这次民族复兴中，信新教的少数人起了重要的作用。

推动捷克民族觉醒的急遽工业化过程，在斯洛伐克是没有的。但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之间，联系之环倒是早已铸成。捷克人为他们这种语言的相似所深深吸引，他们钦佩斯洛伐克的民间传说，特别是神话，那是在无数漫长的冬夜里逐渐完美起来的。斯洛伐克人没有他们自己的王子和国王可供回忆；在他们历史上可回忆的英雄是古老的农民造反者——民族和社会反抗的象征和带头人。其中最著名的是扬诺锡克，即斯洛伐克人强烈要求独立的象征。他被处以绞刑，让他受

① 匈牙利的主要民族。——译者注

② 科苏特(1802—1894)，匈牙利政治家。——译者注

到慢慢死去的折磨，但他正在半死之时却得到了赦免。这时，刽子手走来要把他从钩上放下，可他偏要刽子手走开，让他安静地死去。

土耳其人的侵略、农民叛乱、天主教、匈牙利地主、向美国大规模移民、而特别是在田间和丛林中无休止的劳动，都在斯洛伐克民族的生活和性格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要比捷克人更能忍受困难和更加率直；他们对自己很少斤斤计较；他们不事后懊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说服了在美国的斯洛伐克移民团体去赞助捷克和斯洛伐克统一组成独立国家的事业。布拉格大学前哲学教授和出席维也纳议会的议员托马斯·马萨里克做了许多说服工作。马萨里克的条件是好的；他的父亲是斯洛伐克人，他的妻子是美国人。1918年5月31日，捷克和斯洛伐克移民组织的代表在匹兹堡同马萨里克会面，同他谈论未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轮廓。斯洛伐克人希望得到保证数量上大大超过他们的捷克人不会试图同化他们。马萨里克当场就起草了这个未来国家的民族政策。斯洛伐克将有他们自己的行政机构、司法制度和语言文字；详细的安排将由两个民族的代表在这个解放后的共和国里制定。(所有这些都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建立前的几个月里。)

当时，有一个斯洛伐克人要求设立一个“议会”，马萨里克当即把这个要求写进这个有争议的匹兹堡协约草案。1918年11月14日，马萨里克在这个协约上签了字，

就在这一天他当选为总统，不久他离开了美国。同马萨里克和贝奈斯一起，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法国工作的斯洛伐克天文学家米兰·斯特芬尼克，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事业也作出过贡献。这位文雅的天文学家，后来对军事和飞行发生了兴趣，并被擢升到法国的将级军官职位。在飞回他的新解放的国家去的途中，他刚刚越过边界就坠机而亡。

飞机坠毁是由布拉格新政府阴谋策划的谣言，已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在中欧流传的各种神话之一。它成为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在一个国家里共同生活初期就已产生不和的证明。布拉格的议会制定了中央集权的宪法，而政府在实践中甚至更加集权。由天主教神父安德鲁·赫林卡领导的、主张自治的斯洛伐克政党，用匹兹堡协约去提醒布拉格政府注意马萨里克原来的意图。这使日益衰老的总统大为恼火，以致在给赫林卡的一封信中，他竟把这个协约说成是"伪造的"。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二十年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民族政策"，主要是为德国人，其次是为匈牙利人，却从来也不是为斯洛伐克人而制订的。人们认为，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迟早会出现，整个问题可以置之不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的斯洛伐克卫星国就是建立在斯洛伐克人对捷克人的不满之上的，这样，一个自治的斯洛伐克的想法就沾上了臭气。

但是当主张自治的"人民"党把自己出卖给纳粹时，成千上万的斯洛伐克人却在自己的国土上和希特勒德国

作战。除了战争后期的东摩拉维亚之外，捷克的抵抗主要限于收集情报，同伦敦的流亡政府保持联系，在工厂搞破坏活动和对纳粹官员不时进行袭击。在斯洛伐克，由于它有高山和密林，到将近 1942 年年底时，开始发展游击队运动。一年后成立了有三个共产党员和三个中产阶级的代表参加的斯洛伐克民族议会。1944 年 3 月，捷克斯洛伐克驻莫斯科大使，开始同俄国人商谈关于斯洛伐克准备起义时的军火供应问题；8 月，民族议会的一个代表团在斯洛伐克某机场起飞，前往莫斯科。那时，中部和东部大片领土都已在游击队控制之下。1944 年 8 月 29 日，德国军队开始越过边界；到 10 月底，他们占领了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地区，于是民族议会命令恢复用游击战争的方式进行战斗。斯洛伐造反者撤到山里去，等待红军的到来。

在希特勒保护下的自治试验已于 1945 年初告终，但是斯洛伐克人要求得到尊重和被当作另一个国家的希望并没有终结。新政府里的捷克人没有认真考虑到这一点。马萨里克的朋友和继承者爱德华·贝奈斯，并未能超出第一共和国时期① 对于斯洛伐克问题的官方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正当红军进入斯洛伐克领土之际，贝奈斯把他的政府从伦敦迁至莫斯科，在那里制订了它的第一个纲领。1945 年 3 月，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的成员建议把捷克斯洛伐克改为联邦国家。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将继续存在，它将有自己的行政机构——部长会

① 指 1918—1938 年时期。——译者注

议。捷克人将有类似的机构，而在两者之上，则设立一个总的议会和政府来处理对外贸易、国防和交通，以及所有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共同有关的问题。

但是贝奈斯和捷克的政治家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拒绝了斯洛伐克这个建议，认为这将直接导致“二元化领导”或“联邦主义”。他们是对的。事情是会这样发展下去的。1947年，斯洛伐克人不得不提醒当时的总统贝奈斯，“既然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就不能仅仅根据捷克人的要求和需要来独断独行”。

在战前的各大政党中，共产党人感到它比其他任何政党容易接受两个民族并存的主张。但是，他们内部的意见也是有分歧的。1945年春在莫斯科谈判时，一个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古斯塔夫·胡萨克是联邦主义最有力的鼓吹者，但是他的意见在他的捷克同志中很少得到反应。

于是，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发展着一种奇特的不平衡的做法，并仍然在今天的共产党组织中存在。战后，斯洛伐克人建立了他们的全权代表委员会，这是和布拉格政府重迭的地方机构，但是捷克人却没有设置类似的地方机构。相反，他们只有在布拉格的捷克斯洛伐克中央政府。① 同样，现在有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但是，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却不存在捷克共产党。

① 1968年10月27日捷国民议会通过一项宪法性法律后，已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从单一制的国家，改为由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制的国家，1969年1月1日实行。联邦中的两个共和国都各自有自己的议会（如捷克民族议会和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和政府；整个联邦则有联邦议会。——译者注

行政上的不平衡表明：捷克人没有放弃他们建立统一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的梦想。

可能这样的目标，即使在形势最有利的时候，也既非值得想望，更不是切实可行的。而过去二十年的事态发展，已排除了这种可能性。1950年已有了第一批麻烦的迹象。那一年，有三个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古斯塔夫·胡萨克、拉科·诺沃麦斯基和弗拉多·克利门蒂斯被指控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说他们企图破坏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统一。这是一个严重的和极为荒谬的罪名。随后不到两年，曾经接替扬·马萨里克继任外交部长的克利门蒂斯，即被判处死刑。1954年，在新的逮捕和公开审判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浪潮中，安托宁·诺沃提尼控告他们已"同哈布斯堡王朝的后裔和其他为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效劳的坏份子达成协议"。1952年，这些审判是在斯大林和贝利亚手下的人员监督之下进行的；两年之后，由捷克人自己单独负责审理。诺沃提尼时代的官方路线认为：民族问题早已顺利获得解决；需要时就给加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名。1967年秋，诺沃提尼总统最后一次使用了这一手。政府不敢坦率地透露党和国家主要官员们所属的民族，而是把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介绍为既是这个民族的人，也是那个民族的人，这种情况有时甚至影响到他们讲话的口音，他们用既接近捷克语也接近斯洛伐克语的中摩拉维亚的口音来讲话。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最近写到旧的民族政策时说："从每一个人表现的行动来看，好象斯洛伐克人还是一个不同的

民族，但又正处在溶入某种共同民族的过程之中。”(见米兰·胡贝尔的文章，原载《文学日报》，1968年3月14日。)

当1968年1月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接替诺沃提尼为共产党第一书记时，他成为第一个斯洛伐克人在这个党内因而也是在这个国家里身据要职。当时总理列纳尔特，碰巧也是斯洛伐克人。但是，除了建筑工程部长外，没有其他斯洛伐克人在布拉格政府里担任重要的部长职务。这个情况并没能平息沙文主义捷克人的喧嚷(“如今斯洛伐克人在统治我们啦!”)，而趣味相同的斯洛伐克人则对此暗暗高兴。这种局面为时不长。1968年4月新政府宣布成立时，就没有列纳尔特的位置。到1967年夏季快结束时，诺沃提尼和他的朋友们已不再能得到斯洛伐克人的信任。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将出现诺沃提尼的反对派，只是时间问题了。这个合适的人必然是得到斯洛伐克人的坚决支持的。

那时诺沃提尼的行动，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残酷性。在他的斯洛伐克之行彻底失败以后，他针对那些目无纪律的作家发表了演说。为了这个目的，他利用了不幸的伊里·亨德利赫，后者在6月的作家代表大会上没有能对党的知识分子贯彻纪律，并在几次感情冲动的发作过程中闹了笑话。9月26日和27日，亨德利赫召开中央委员会来批准对作家和作家协会采取惩罚措施。

党试图削减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各方面的活动。文化部接办了畅销的《文学报》周刊，开始用另拟的刊名

出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编辑部。分配给作家协会印刷所的纸张减少三百吨。经过几番讨价还价后，同意只减少一百四十吨。此外，在布拉格出版界设立两个新的印刷所并作了人事调动，目的就在于削弱作家协会印刷所的地位。为作家需要而设的文学基金，也由文化部接管。卢德维克·瓦丘利克、安托宁·利姆和伊凡·克列马则被清除出党。

但是，作家协会为保卫自己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除了开除出党和令人懊恼的限制外——例如，拒绝签发利姆去西德访问的护照——对于作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旧的权力结构，置于一个领袖、一种政策之下的一个政党的整个体系已不再是老样子了。无疑地，原来比较富裕的生活是有帮助的。例如，伊凡·斯维塔克由于他的政治观点，丢了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工作，然而，他只要卖掉汽车，还能勉强过着一种在野学者的生涯。开除出党的作家，也并没有意味着完全同社会隔绝和断绝收入的来源。他们由于有作家协会和它的基金的支持，依然享受自由，并继续写作，等着局势的好转。

政府的无能，它的呆板执拗，在另外的情况下不久就暴露了出来。这一次，诺沃提尼统治的国家的质量如何，要经受青年人所过的那种生活的考验。

六十年代的头几年，在捷克社会里青年人和其他人的不同只是在年龄方面。他们还没有成为明确的独立的集团；那时也没有世界规模的造反迹象。捷克斯洛伐克

青年联盟这个官方组织是死气沉沉的。它的会员人数已从1960年占适龄青年的57%减为1967年的26%。它的干部大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虽然饭碗牢靠，但是一只脚早已跨进中年。1968年3月还在任职的那个联盟主席已经有三十六岁，他是在十八年前去那里工作的。党的领导人经常只是从小处关心青年运动：有一次，某个前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谈到联盟领导的候选人时说，这个人“可不够漂亮”，因此不能担任这个职务。好几年以前，青年运动的组织者接到中央要组织“辅助警察部队”的指示。原来的意图是要这些部队关心青年犯罪者，但是随着部队的扩大，他们被使用的范围却更成问题了。政府鼓励他们去监视其他青年人，参加游行示威，与警察合作参加各种搜查，并向法庭提供证据。他们的工作越来越接近警察的工作，而某些成员最后也就变成了警察。青年人知道这个部队的存在，当然是不满的。从青年人看来，这是那些年长的人，当权者，出于他们自己无聊的目的利用青年的又一证据。

在城堡以南树木葱茏的小山上，亦即佩特林公园里，有一座塑像，上面有一个青年人微垂着头在闻紫丁香花。他就是卡雷尔·胡涅克·马查，①非常出名的浪漫诗《五月》的作者，死的时候很年轻。每年5月1日，布拉格的青年都要向他致敬。他们经常同警察发生冲突，特别严重的是在1966年的那一次。1966年5月1日，一群学

① 马查(1810—1836)，捷克诗人和小说家，捷克浪漫主义代表人物。——译者注

生、学徒、小职员和工人(他们的年龄大都在十七到二十三岁之间),从佩特林公园过桥游行到市中心。象“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好共产党员是死共产党员”之类的呼喊声时时传来;警察被称为“盖世太保”,电车上的一面小红旗被烧毁。几百名男女青年群众向瓦茨拉夫广场进军,在路上拦住了几辆电车,最后在广场靠边的圣文塞斯拉斯骑马塑像前停下来。人群中有着青年运动“辅助警察部队”的人员,因此口头传告人们可要留神。

1966年5月24日,布拉格市法院审判了一个十二名青年的集团。根据主要由“辅助警察部队”人员所提供的证据,他们全部被判了罪,分别处以五个月到十七个月的徒刑。其中有一个女青年后来谈到判刑后的可怕遭遇。她来到第一个监狱时正好监犯在造反,因为中饭吃了变质的汤。她和一个年轻的妓女同住一个牢房,这个妓女就常常叫她“你这个婊子”。后来她被转移到一个“感化营”——一个少年犯感化所之类的地方,但似乎也收容了年龄大一些的女人——在那里她白天穿珠子忙个不停,晚上还要躲开住在一起的许多同性爱者向她献媚。

> “我不断想到第二次再叫我过这样的生活,我可活不下去,从那时起我就不相信别人了。我在那里已经变得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下流话也习惯了,我多少也害怕发生爱情。他们有条件地释放了我,但我没有签过什么字据,说我以后保证不把这件事讲出去。我甚至拒绝在健康证明书上签字,因为你不知道在这样的地方可能得什么病。我可得了脓疮病。”(《文学日报》,1968年3月25日。)

在那些岁月里，对年青人的这种审判的公正性，显然是值得怀疑的。警察和法院是受同一个执政当局控制的，只要内务部某个官员“拿起电话筒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了。在下面，“辅助警察部队”人员既参加示威游行(谁知道他们自己喊的是什么口号)，又向法院提供证据。

1963年，布拉格大学哲学、自然科学、法律、机械工程和核物理各系学生组成了“五系团”，这个组织竭力把政治重新注入学生生活中去。1966年，在一次大学生会议上，机械工程系的伊里·弥勒说，青年组织的政策一定“不能把自己的活动仅仅局限于宣告赞成社会主义和党的目的。一定要让青年人对党为实现这些目的而采取的方法表达真正看法。如果需要的话，青年联盟就得反对党的政策”。(《文学日报》，1968年3月7日。)弥勒提出的改组青年组织的建议，包括要根据年龄和职业不同然后再组成联合会；他在演说里一再提出联盟应该有它自己的政策的要求。弥勒的意见得到布拉迪斯拉发一个法律系学生奥斯卡·诺沃提尼和其他许多人的赞同。

与此同时，发生了1966年“五一”节的游行示威和其后的审判。在那一年年底，弥勒被所在的大学勒令退学，他被开除出青年组织，并应征服兵役。六个月以后，弥勒的同事和他最亲密的朋友卢博斯·霍勒切克受到了同样的待遇。1968年春，这两个青年还穿着军服。对他们采取的措施，促使本来不一致的不满表示转化为一致的行动。青年联盟一直在筹备召开代表大会，筹备会议不时成为反对当局处理弥勒事件的办法的强大示威。学生们

继续不断地攻击这个青年组织的官方领导。

青年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67年6月5日(作家会议前几周)在布拉格开幕。苏联代表团由科涅夫元帅率领；诺沃提尼总统向五千名代表和来宾发表讲话。青年联盟依然是统一的并直接受党的控制，没有什么要把它改成为联合会的尝试。代表大会开幕以前，党曾对联盟的官员们发出指示。据称弥勒执行了"亲华派"的政策；要求官员们使学生切莫轻举妄动。有些作者如果认为1967年夏对知识界来说是个不活跃的季节，那就错了。情况恰恰相反。

当青年运动的某个官员被问到为什么开除弥勒时，他坦率地回答道，"弥勒同志是有权公开发表意见的，如同青年联盟的其他会员一样。但是，应该说，在他真的这样做的时候，这种做法在政治工作中倒是不常见的。"

然而，伊里·弥勒并没有忍气吞声地接受对他的谴责。他向党上告，并从布拉格区党委第一书记马丁·瓦丘利克(同作家卢德维克·瓦丘利克没有亲属关系)那里接到如下的复信：

> "我已收到你给共产党区委的来信，在信中你对被开除出大学和青年组织不服，提出了申诉。我认为大学和青年运动机构对此事处理得完全恰当。你想到党的区委的存在未免为时已晚。当你在准备要采取同党、学生和青年运动的利益相抵触的行动时，你就应该找我们。那是商谈的恰当的时刻。现在你是在自食其果。党不谴责任何人，也不谴责你。至于你所讲到的公民权利，我们始终认为它们同

公民的义务是不可分割的。你的申诉说明你对这种公民义务毫无认识，也毫无自我批评之意。此致

同志式的敬礼

马丁·瓦丘利克”

年青人发现老一代人在道德上的卑鄙程度是难以理解的。他们感到有什么难以置信的、丢脸的事情正在当权派这个圈子中进行。当权派中有许多人曾经被骗，或受到吓唬，以至于纵容希特勒、默许种族灭绝、无聊的战争，以及最无耻的对正义的践踏。许多人对于最终目标具有信心，然而对手段却是放任自流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年青人不管那老一套的抽象理论所讲究的完美性。由于尖锐地意识到现实和个人的存在，他们已把手段重又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他们的经济独立——捷克斯洛伐克学生已经得到了一些，他们还希望更多些——增加了他们对自由的需要。当父辈不必为其子女的教育和前途而勒紧裤带、或则倾家荡产时，高压的家长制早已行不通了。马丁·瓦丘利克妄想代替许多家长的地位，竟使他成了布拉格年青人的笑柄。

学生同国家严重冲突的基础已经准备就绪。1967 年 10 月 13 日，冲突爆发了。从城堡走出去不远，在斯特拉霍夫修道院和哈布斯堡王朝兵营的那一边，是布拉格最大的学生居住区。这是一个荒凉的、不吸引人的但却是合用的地方。那里时常断电，晚上发生这种情况时，学生要么恼火大吵大闹，要么干脆就出去喝老酒。10 月 31 日（星期二）那一天，学生委员会同新闻工作者举行会议，后

者是来看宿舍情况的。下午9时之前，电灯是一直亮着的，可是接着熄灭了。通常的喧嚷声和吹口哨声立时传开来了，还有几片烧着的纸从窗口飘落下去。一群群的人开始去外面集合，传来了“让我们全部走出去”的呼喊声。一支游行队伍立时形成了，绕着建筑物一边走，一边高呼“让我们走出校门，我们要光明！”

学生擎着火把，奏着各种乐器，开始向市里前进。在他们到达陡峭的奈鲁多娃大街以前，——是沿着这条街走下去，还是向城堡走去，正当他们必须作出抉择的时候，却感到必须谨慎从事。于是游行队伍开始缓慢地向奈鲁多娃大街移动。他们还没有走到街的尽头，一小队一小队的警察已开始到达。

学生试图向警察解释他们为什么进行游行示威。警察要他们选派几名代表，说可以带他们到适当的地方去申诉。这个建议一宣布，学生们报之以一阵震耳欲聋的大笑。接着，有一个学生说：

> “除非真是个傻子才相信这种话。招致的后果是明显的。谁去谁就立刻被指控为整个事态的组织者，他们大概将被开除学籍，或者天晓得还会碰上什么事情。他们的遭遇和那些曾被指控组织五月示威游行和其他行动的人不会两样。因此，谁都不能真的相信那个建议……”
>
> （原载《学生》，1968年4月3日。）

警察提出建议以后，学生们并没有散开。他们竟把这条大街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冲着警察高喊了一阵。然后，他们掉转队伍，开始回头上坡走。当他们在奈鲁多娃

大街上坡走时，警车在他们前后来回行驶，迫使学生只好走人行便道。接着，警察指责学生们堵塞交通，硬要驱散这一群群的年青人，并且还抓了其中三个人。抓人一下子惹起了骚乱。警察开始责难："我们知道你们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血腥的光明"，"这是政治示威"，"学生又在寻事生非了"。学生会的一名代表前去交涉释放被捕者；其中两人被允许释放。当时没有警官在场，都是一些低级警员。争吵继续下去，学生怒骂警察；警察追赶学生。有人大声高喊："他们还抓着我们的一个人！"学生们一边大声疾呼，一边又开始下坡游行。警察试图冲散队伍，但由于人数太少，未能得逞。他们就钻进警车里去，把这些警车筑成路障。双方不断地在乱叫乱骂。增援的警察来到现场，试图把学生赶回住地去。学生开始往回奔跑，其中有些人进了校门就在一边坐了下来。他们以为在校园里是安全的。

警察一赶到那里，就开始打学生。他们手持警棍，见人就打。冲突在校舍里外展开了。警察有意避开大群大群的年青人，一味追赶和敲打离群掉队的人。他们对学生喷射催泪瓦斯，不分男女，乱打一通。

星期三早上一两点钟的时候，追赶和交战的闹声终于停了下来。十二个学生和三个警察被送进医院。布拉格各日报曾于11月2日和3日报道了这一事件；1967年12月15日公布了官方的报告。政府的新闻秘书发表意见说，"我们坚决反对有人企图利用那些事件来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原载《记者报》，1968年3月6—

13日。）

在收治受伤者的佩特林医院里，医生们在11月1日早上集合讨论这个事件。外科主任发表了意见，认为警察干得太过分。两个受伤的学生有严重的脑震荡，其中一人在送到医院时早已不省人事。医疗报告说，这个受伤者“因受来路不明的某个穿着制服的人的袭击，左手和右肩有裂口”。

在10月31日游行示威之后不久，布拉格开始流传种种谣言，说学生们正在武装自己，说斯特拉霍夫事件是受国外敌人鼓动的，也许是由国外的敌人出钱搞的。学生们受到警告；工人将看管他们不得越轨，工人民兵队将采取行动。这些谣言和威胁显然来自党的最高一级。为了开脱责任，说是在斯特拉霍夫事件发生的那天晚上，政府正在城堡里举行招待会，因此警察急于要学生离开那里。

1967年11月9日，学生们在哲学系举行了五小时的会议，他们讨论了斯特拉霍夫事件。他们发了一封信给教育部，提出如下要求：查明和惩罚应对打人事件负责的那些警察，不准警察使用催泪瓦斯或其他任何化学武器，此外还要求他们佩戴有号码的标记，以便识别。

1968年4月2日我到达布拉格之后不久，警察开始在上衣上佩戴新的、闪闪发光的金属圆牌，上面有他们的号码。

第五章 经过设计的革命

捷克人自己对于他们国内近来发生的事件，可不喜欢用“革命”这个词。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既不是群众自发性的骚动，也不是宫廷革命，更不是这两者的任何结合。

在街头出现旗帜之前，已经交换过很多的观点。骚动开始在一向是和平的、守法的人民当中出现。这种骚动已遍及各报社、作家的书房、电视台、实验室和讲堂，并且也是在经济学家们的预测之中。它是以“知识分子的革命”开始的，但是知识分子既没有被号召去守卫路障，也没有被号召去接收本国政府的全部职权。

靠近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有一幢阴森森的十九世纪建筑物，那就是科学院的所在地。它成立于1952年，有庞大的预算以及颁发学位的权利，前身就是有名的皇家学会和捷克文理研究院，但科学院院士并非都是由科学院自己推选的。在它成立时，党内外学者之间的冲突是尖锐的，政治条件是遴选的标准。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没有入选；只写过一两篇论文或政治性小册子的人，却都被选为院士。党员和非党员的冲突，在文科方面比在理科方面更为尖锐，特别在象法律那样与政治有联系的学科方面，更是如此。

但是比较年轻的科学家和学者，对科学院初期有过的分歧和宿怨并没有多少兴趣。中年一代虽然是由那些过去曾经受到学术上不公正待遇的人教出来的，但是他们有自己的问题和争端。例如，他们不喜欢1960年诺沃提尼干涉科学院事务的那种方式。他们对帮助政治家们解决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实际问题并不介意，但不愿听取来自对方的建议。

他们当中有些人和作家发生过争吵。因为是近邻，作家们知道学者们在干什么，而学者也密切注视着作家们的活动。在科学院里，有不少人是温和的改革派，而作家们则倾向于比较激进。两派和党的领导都有直接联系，一般是通过意识形态部门——这是诺沃提尼总统在任的最后几年中党内最敏感的一个部门。它的负责人一个接着一个垮了台。他们不断地受到双重压力。党的领导人要求知识分子听话；而知识分子反过来则要求有调查和言论自由。知识分子和党都期望意识形态部门的负责人会讨好他们。很多人，包括一些著名的有才智的人，发现要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

帕维尔·奥尔斯佩格，一位受过专门教育的历史学家，原为诺沃提尼的私人秘书和演讲稿撰写人，1965年1月被任命为意识形态部门的负责人。他担任此职到1967年3月为止。尽管他首先要忠于党和党的路线，但他本人毕竟是一个知识分子，因而日益受到了他的朋友们的影响。据说在他任职的末期，曾见过苏联的历史学家兼外交家乌达尔特索夫，还有一个苏联的新闻参赞。

他们讨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化问题，以及捷共新闻工作者的反苏倾向。这次讨论是在布拉格一家地下室酒吧中进行的，一直争吵到深夜才不欢而散。不管怎样，几个月以后，他被罢了官。他在一次会议上伤心地说："同志们，改革这个词，我可再也听不下去啦！"他所受的压力很大，感到很难跟上形势。他是一个中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人，可能因此而有额外的精神负担。

虽然如此，奥尔斯佩格在职期间，有一两项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计划还是开始了。将近1966年底的时候，科学院成立了一个研究组，探讨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制度应作哪些改革，以适应经济上的改革。这项研究定于1968年底完成。这个研究组不断举办民意测验，以了解人民对选举制度、政治机构等的态度。1967年7月28日，当它的成员在布拉格电台讨论他们的工作时，有一个谈到了最简单的民意测验，就可以证实人民对他们的政治制度是不满意的。

这个研究组的负责人兹德尼克·姆利纳日，是科学院的法律事务和政治活动方面的专家，他曾几次和作家们进行过交锋。他和奥尔斯佩格有密切的联系，1966年初曾帮助奥尔斯佩格竭力使旧《文学报》同党亦步亦趋。因此，作家们一直对他怀恨在心。可是，当意识形态部门就瓦丘利克在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要他发表一点内行人的意见时，他却拒绝了。

由于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所面临的困难有着广泛的了解，姆利纳日和他的朋友们往往采取策略上的

妥协道路。这使得他们有时支持保守的政策，因而与一些不受欢迎的人为伍。为此，姆利纳日曾经公开表示过歉意。《文学报》的一个工作人员谴责奥尔斯佩格和姆利纳日时，说他们把这个作家周刊的编辑视为

> "疯子，不懂规章而玩弄政治，因此有助于党内的教条主义者，阻碍了进步的共产党人的工作。依照奥尔斯佩格的政策(现已破产)，我们被禁止在本报批评新闻法草案，反对内部的工作指示(这种指示非法地使那个可怜的新闻法变得更加厉害)，批评二十年来的选举闹剧等等，——所有这些现在就连奥尔斯佩格和姆利纳日也都放弃了。当然，姆利纳日那时是知道我们在干什么的，事实上还知道其他更多的事情，因为他和奥尔斯佩格(尤其是后者)时常告诉我们说，我们并不了解全面情况。但他又从来不让我们了解全面情况，这真是一件卑鄙的事情。我承认姆利纳日比我聪明，因为他属于[科学院的]小组，而我不是。我将在自己所了解的范围内，暂时支持他现在致力的工作，但我可不承担任何义务。我也知道一个人在政治上必须妥协，但是用妥协来达到一个人的目的，这是卑鄙透顶的。我知道，策略是存在的，那些体面地运用策略的人是有用的，因为策略有助于克服危机或工作停滞时的困境。但是，我想，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不施展策略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否则就无法知道，在这个国家里哪些人需要什么，需要多少，而政治家们就只好卷起铺盖回家了。"(瓦丘利克的信，原载《文学日报》，1968年3月21日。)

姆利纳日和他的小组尚未完成他们的研究项目，毫无疑问这个研究项目将以"不施展策略的人"的意见为基

础。但是，在姆利纳日深入进行他的研究工作之前，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拉多万·里希塔和他领导的研究组，却在1966年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这个组的人数较多（其中二十五个是男的，三个是女的），包括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有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建筑师、一个物理学家、一个自动控制专家、一个统计学家，以及其他学者。这个组专门研究科学技术革命以及这个革命对社会的影响，并将研究成果以《十字路口的文明》为题公开发表了。这份报告的引言扼要地叙述了西方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研究，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对一个社会在工业化以后所产生的那些问题，有时容易忽略。不管怎样，报告的作者们手头就有一段经典的引文。那就是苏联科学院院长关于现代国家工作中的优先顺序问题所说的一段话：

>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使技术的成长和发展走在重工业的前面，而物质科学的发展又应当比技术更快，因为它是构成所有一切技术进步的主要基础，技术进步则是最重要的工艺上的设想的主要源泉。（原载《真理报》，1961年6月13日。）

要把严密的科学名词用到不怎么严谨的社会科学中去，里希塔知道是有危险的。他们的小组采取注意避免这种危险的方式，有力地说明了他们的主旨。

这份题为《十字路口的文明》的研究报告认为：工业社会中旧的、传统的、对人和机器并重的做法，早已成为过去。捷克斯洛伐克目前正站在科学技术革命的门槛上，但是，这些作者们却发出严厉警告，说这个发展远不

是自动来到的。它可能受到阻碍，或者完全转变方向。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管理，由于它的低水平不能理解这种过渡的性质。它还在试图“使社会回到向广度发展工业的道路上去”。

过去，捷克斯洛伐克“生产力的发展偏向于用传统的生产力结构去片面地增加工业产品数量，这就造成对投资、劳动力、原料资源等等的需求过多”。几乎没有利用加快发展速度的手段(如科学的应用，人的才能的发展等等)。工业发展束缚了太多的劳动力，而生产的增长却不能令人满意。研究小组认为，最迟到 1958 年或 1959 年，捷克斯洛伐克在向广度发展工业方面已经达到了极限。陈旧的“从行政上指挥的管理制度”，已无法把工业制度转变为科学技术制度。

捷克斯洛伐克同其他国家比较，目前在运转的自动化设备，数量较少。例如，机械工业约有 70% 是单件生产，或短期性的生产，过渡到自动化还得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根据目前情况，科学院的研究小组估计，捷克斯洛伐克机械工业自动化的发展水平，比美国低三到六倍；电子工业所生产的自动控制系统设备，比先进国家低两到三倍；在自动化的最高级形式电子计算机方面，捷克斯洛伐克的生产比美国低五十倍，比英国、法国、瑞典低十到十五倍。捷克的塑料生产比美国或西德低三到四倍，它的纺织工业使用的人造纤维比日本或法国少四倍。

当社会主义国家急需实行工业化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却面临这样的抉择，或者是利用技术革命为它们

提供的机会，或者是经济停滞不前。两种制度之间的差距，看来是拉长了；赫鲁晓夫乐观的宣言已成往事。捷克科学家估计，社会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比美国低两到三倍，如果保持现有的增长率，那么，赶上资本主义制度将需要“二十年、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在两种制度的竞赛中，技术革命对不能保持同速度前进的人是不利的。

这份报告还暗示教条主义是垮台了，取代它的是灵活的、经验主义的态度。捷克人知道，必须创造一个灵敏度高的社会组织、一个适应性强的社会，才能轻易地对变革的要求作出反应。研究小组的成员认为，在某种限度内，集中工业的所有生产手段——扩大工业社会的两方面的阵容，即扩大生产线与配备在生产线上的工人——是最有利于增长。但是超过了某种限度，就会得到相反的效果。关键在于把生产手段从生产中解放出来，而不是把它们投进生产中去。有专门技能的人才，经检定合格的人才，以及获得这些人才和使用这些人才的决心，在目前是非常需要的。按照苏联的估计，一位一般的科学家在一年里抵得上三十六个工人。“因此，把人当作非熟练工人使用的传统办法，必将在一个又一个部门中成为阻止生产力发展的制动器，并造成人才的浪费。”由于自动化从生产过程中排除了人，整个社会结构开始改变了。

旧有的生产手段的一下子改进，比如，自发明纺车以来，接着是整个制度依靠已取得的成就波浪式地前进，现在则由连续的、普遍的变革所代替了。不断革命在政治上不会发生，但是在科学上是可能的。这份研究报告就

有这样的含义：迄今为止，政治家利用了科学家；而从现在起，科学将决定政治的步调。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将是为科学发展开辟和扫清道路。

《十字路口的文明》中所表示的经济观点，反映了捷克斯洛伐克目前流行的想法。当里希塔的小组正在进行研究的时候，新经济模式的设计已到了最后阶段。以奥塔·希克教授为首的科学院的经济学家们，正在领导他们的同事们试图改革旧制度。经济灾难，以及诺沃提尼相信可以孤立地解决经济灾难，把关闭着的大门打开了一条缝。

希克教授矮小而果断，四十九岁，出生在比尔森。他还在学童时代就对经济学发生了兴趣，并且如今仍然对它着迷。同诺沃提尼和亨德利赫一样，战时大部分的岁月，他是在茅特豪森集中营里渡过的；战后，他在几所大学里教授政治经济学，1960 年成为科学院通讯院士。两年后，他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并担任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64 年 3 月，他在中央委员会里从意识形态部门调到了经济部门，同年发表了他的第二本重要著作：《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关系问题》。五十年代初期，他遇到过一些小麻烦。他在最近的一次广播谈话中说：“有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期里，虽然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过，我是被排斥在党组织之外的，也没有选派我为代表……。”十年后，这个国家新的经济思想，主要就是从他那里提出来的。

捷克斯洛伐克旧有的经济制度，人为地创造了它自

己的一套市场经济；市场的自然供求关系中断了。以指标和各种商品的生产定额为支柱，实行严格的、长期的、范围广泛的中央计划经济。各种“工业经理委员会”下面，组成卡特尔式的各种“联合公司”，以便辖管各工厂。这些委员会具有广泛的权力。它们有权对所属的各工厂征收所得税，借此可以使资金从利润高的工厂调拨到赢利不大的工厂。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价格只是对决定价格的人才有意义。此外，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变成苏联原料的加工厂。和苏联签订的贸易协定，已成为国内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参阅瓦茨拉夫·霍列索夫斯基的杰出论文《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改革》，原载《苏联研究》1968 年 4 月号。）

不论这个制度可能有什么样的缺点，大批官僚已习惯于它的运转，很多人同保存这个制度有着切身利益。党的干部政策是重正确的政治观点，轻技术才能；自 1948 年以来，一贯采取的对政治上有功的人委以国有化企业的工作的做法，已不象最初看起来那样正确了。诺沃提尼政府公开承认：质量下降和技术愈来愈落后，都是旧制度带来的后果。俄国人已开始到别处去选购制成品，而捷克人却还在依赖俄国的原料。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的讨论始于 1963 年秋天，可惜已经晚了几年。当讨论真正展开时，却是一场公开的、有些一边倒的辩论。改革派发表了意见，旧制度执行者则保持沉默。1964 年 9 月，有关改进的“几条初步原则”发表，并于 1965 年 1 月 30 日为中央委员会所接受。在

1965年整整一年里，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拟订具体细节。这些拟订出来的措施，将自1966年起至1968年这一时期内实行。另外——这是改革派在1966年夏天的重大胜利——改革派使党的领导同意调整价格，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些调整，就很难估价他们工作的成败。接下来是进行第二套改革，通过了一系列法案，使一些过去不合法的事情合法化，而且这些法案将在1967年到1970年期内实施。到1966年底，新经济模式已经完成，仅仅有待于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对旧制度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它导致虚假的规划。它只是把经济推向某一个方向，其他就不管了。它背后的指导思想是与经济无关的。

自从1957年苏联经济实行"撑场面的生产"以来，整个发号施令式的计划制度，经过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的仔细审查，发现是有缺点的。（这是迈克尔·波拉尼教授的话，参阅《调查》杂志，1960年10—12月号。）捷克经济学家和很多其他欧洲国家的同行一样，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的声明里充满了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词汇。他们几乎大体上回到了海耶克教授①的信念，即市场是代价最小的计划者与调节者。捷克的改革派相信，好的计划意味着目标的实现，所以他们把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放在最优先考虑的地位。他们认为，在他们的新模式所创造的环境下，计划还是会有它应有的地位的。他们不要计划工作者仅仅成为市场情况的记录员。他们在考虑一种"可

① 海耶克(1899—)，英国经济学家。——译者注

以调整的计划”，这种计划虽然为期几年，但根据执行中的经验可随时加以修正。不过，他们面临的问题，仍然是要使这个国家有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不仅仅是要取消旧的原料分配制度，主要的是要创造出一个买主和卖主可以相遇的市场。必须缩小各种“联合公司”经理委员会的权力，必须恢复各个工厂的自治。这就要求经理们的自我克制达到几乎不近人情的程度。也就是要求他们放弃很多权力，在实际上解散他们的帝国，然后使工厂脱离旧的制度。在新的经济模式中，工厂不仅搞生产，还要做更多的事。它们必需直接和原料供应者及产品购买者打交道。它们很可能会对新的自由感到担忧。改革者也担心它们会利用这种自由来提高价格。因此必需严格控制价格。这就立即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既能控制价格，同时又不阻碍市场上供求关系对价格变化发生影响。

在和经济管制者的对峙中，市场赢得了一次代价高昂的胜利。当新经济模式在1967年全面实施后，立即遇到了困难。希克教授调查了改革的第一个回合后宣称：批发价格上涨了29%，而不是计划中的19%。市场上仍旧求过于供，物资匮乏的经济依然如故。(《新思想》，1967年4月14日。)1967年5月，希克教授在贝尔格莱德《政治报》上抱怨捷克斯洛伐克推行经济改革的速度是缓慢的。“我的计划……仅仅在一部分企业中、在一些小的事情方面试行。对它的抗拒一直很尖锐并且很恶毒。当然，我们可以继续这样拖拖拉拉，但是明天政府将会被

迫强制推行这个制度。此外不会有别的选择。”

经济局势是爆炸性的。很多人认为，新模式并没有引起什么变化，因而宁愿回到老路上去。希克教授的改革开始被认为是试图修补经济的又一次拙劣的尝试，毫无社会意义或政治意义可言，对于这类无意义的活动，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了。

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有很多理由感到沮丧。与其他国家相比，他们的确搞得很糟。他们有一位经济学家（奥托·施米特，他的文章原载1968年5月23日《文学日报》。）计算了捷克斯洛伐克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得出的数字是1,448（根据1964年联合国的统计资料，计算单位是捷克的克朗），与其他国家比较：法国2,250克朗，奥地利2,250克朗，西德3,560克朗，联合王国4,170克朗，瑞典5,900克朗，美国10,400克朗。同时，合格的科技人员的每月平均工资是：捷克斯洛伐克2,000克朗，法国12,900克朗，美国21,000克朗。

但是，比较一下法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时就出现了偏差。1962年，捷克斯洛伐克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的1.86%，法国则占3.86%，而法国人口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口的3.4倍；因此捷克斯洛伐克[按每人产量]倒比法国多生产了1.75倍的工业产品。一位经济学家曾把这个偏差归诸于“病态的因而最终是无效的生产，而这样的生产主要是由很不合格的、外行的管理所造成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则作以下补充，说“这是我们的外汇比价所造成的复杂情

况”。

许多年来捷克的国际贸易，主要以和东方贸易为主；如果说捷克人感到他们象是一个冠军队被迫只和蹩脚的球队进行比赛一样，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失去了与先进的工业国家竞争的刺激。再说，他们开始怀疑他们在国际贸易上赔了钱。的确，除了不能兑换的卢布之外，他们没有得到其他什么可以炫耀的东西。布拉格经常缺少购买西方设备或其他商品的硬通货。

例如，在将近1966年底的时候，发表了同年9月所签订的苏捷石油协定的某些细节。同国际市场的成交价格相比，捷克人认为他们被迫以高价——比国际市场价格高一倍——购买苏联石油。根据这个新协定，从1970年起，俄国人供应捷克人的石油将达到五百万吨。捷克人则承担供应建设西伯利亚西部秋明油田所需的机器和其他设备，在1974年前陆续交货，总值将超过四十亿克朗。按照这个比率，捷克人将为每吨俄国石油支付十八卢布，恰好是德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付给俄国人的最高价格的一倍。

克朗的自由兑换和内部的经济改革，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改革在1967年处于困境，是因为没有同时进行政治改革；而在1968年因为确定了目标，政治改革就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大变动具有深思熟虑和目标明确的性质，它没有采取暴力的形式。

第六章　改革和中央委员会

1968年1月5日晚上九时，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电台都广播了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接替安托宁·诺沃提尼为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公告。自从1967年夏末以来，党的最高一级内部存在着尖锐冲突的迹象陆续反映出来，就象一艘遇难下沉的船在不断发出呼救的信号一样。

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已使中央委员会重新活跃起来，而且斗争在中央委员会和主席团内是同时开展的。（自从1966年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以来，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开始有了改变，地方组织已比中央的党和政府机构有更多的代表。）南斯拉夫通讯社竟把10月30日至31日在布拉格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称为"可能是过去十年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捷克斯洛伐克的各新闻机构所作的报道则比往常为少。

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冲突，已涉及到经济情况和党的作用。诺沃提尼和保守派为旧制度辩护。他们用全面的家长式观点来理解"党的领导作用"。党应以严格的纪律来保持权力的垄断。另一方面，改革派则不赞同党有这样大的权力，认为这种主张基于错误的前提。党脱离了群众。党的领导人对于这个国家的政治形势不了解、也不感兴趣，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党就会冒失去它的

领导地位的危险。如果他们希望仍旧保持领导地位，他们必须知道群众有什么要求。10月31日上午讨论暂停，下午召开了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五十周年的官方庆祝会。转天，诺沃提尼带着几个亲信到莫斯科去参加苏联的节日活动。

反诺沃提尼的意见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为中心具体化了。他是主席团委员，斯洛伐克党的第一书记。他们先是试图通过把诺沃提尼担任的党和国家的两个职位去掉一个，以剥夺其部分权力。这个意见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诺沃提尼的人坚持党应该等到1968年选举，那时让诺沃提尼放弃总统职位而留任第一书记。这是保守派佯装不理解当前形势所作的一次不坏的尝试。事实上面临危险的是书记的职位，而不是将来的总统职位。

被逼紧了的诺沃提尼，先后打出了最后两张王牌，即苏联的支持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部队。1967年12月8日，苏联第一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突然飞抵布拉格进行访问。虽然亨德利赫后来提到这次访问具有"为赞助诺沃提尼同志而进行干预的性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党的领导人很快就发现勃列日涅夫不会为诺沃提尼出力。勃列日涅夫在出席了主席团为他举行的告别宴会之后，于12月9日(星期六)离开布拉格。

当勃列日涅夫离开布拉格时，主席团仍旧是分裂的；原订下周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也不得不予以延期。诺沃提尼开始采取预防措施。米罗斯拉夫·马缪拉是党的保安部门的首脑，对行政和司法机构有着广泛的权力；

这时他接到指示要开出一份诺沃提尼的主要反对者的名单，并已准备好逮捕证。武装部队处于临战状态，还动员了部分后备人员。

勃列日涅夫访问后，布拉格气氛日益紧张。1967年12月21日午夜前不久发表了一项公告，宣称中央委员会自12月19日起就在开会。与此同时，主席团会议也在交叉进行。诺沃提尼是否应当下台，如果下台谁来接替，都还没有得出一致的意见。在主席团的十个委员中捷克斯洛伐克出席东欧共产党的共同市场①的代表奥塔卡·西穆涅卡，国民议会主席博胡斯拉夫·拉什托维奇卡，以及伊里·亨德利赫，他们是一贯支持诺沃提尼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奥德日赫·切尔尼克，德拉霍米尔·科尔德和雅罗米尔·杜兰斯基则反对诺沃提尼。在主席团的其他两个斯洛伐克委员中，米哈尔·胡迪克是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主席，但他本人反对杜布切克而支持诺沃提尼；总理约瑟夫·列纳尔特是在1963年带着改革者的声誉来到布拉格的，但从那时以来，他的所作所为已使他的这种声誉丧失殆尽。列纳尔特到最后还是支持了杜布切克，他很清楚如果另一个斯洛伐克人取得党或国家的最高职位，那么，他自己的位子就保不住了。

到12月底，意见还没有一致，于是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休了会去度圣诞节和新年。1月2日复会后，他们只花了三天时间就把诺沃提尼撤换了。在主席团最后几次会议中的某一次会议上，诺沃提尼显然触犯

① 即经互会。——译者注

了他最忠实的党徒之一，伊里·亨德利赫。他所采取的方式，完全是他那老一套。整个1967年在保守派几乎所有易受攻击的位置上都可以找到亨德利赫。他有很多的机会使自己不受欢迎，这些全都被他用上了。诺沃提尼可能曾经想到亨德利赫还有更多的用处。1967年夏，当青年作家扬·贝奈斯因和巴黎的捷克流亡者的报纸《证据》有牵连而受审时，警察发现了亨德利赫女儿的名字，据说她是向同一个地方提供材料的。虽然没有定她什么罪，诺沃提尼在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对亨德利赫说，"亨德利赫，我知道你的女儿在干什么，她向《证据》报提供了材料。"亨德利赫显然愤怒地顶了回去，说，"安托宁，你想把我弄成另一个巴拉克，是决不会得逞的！"(《星期日电讯报》，1968年5月5日；参阅本文第二章有关部分。)亨德利赫本来是可以充当很好的替罪羊的。(在1967年6月的作家代表大会上，亨德利赫穿着衬衫和背带裤子作了几次激动的表演，并不能给作家们留下任何好印象，却提供了一个倒运的、被击败的政客那种无力自卫的形象。)这个故事虽然不容易得到证实，但听起来倒象是挺可靠的。

主席团发生了这次事件之后，诺沃提尼失去了亨德利赫的支持。相持不下的局面被打开了。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是接替诺沃提尼的最可能的候选人。自从1967年10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来，他是改革派的主要发言人，他终于在1月初当上了党的领袖这一事实，证实了这场冲突的性质。这不是一次宫廷革命，不是主席团内

部派系力量的变化造成的人事调动。这是党和国家中两种不同观点的冲突。杜布切克在主席团内没有去找他的那两位斯洛伐克同乡的支持，因为如果这样做就会削弱他的改革派领袖的地位。他在中央委员会里却得到了斯洛伐克人一致的支持。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于1921年11月27日出生在斯洛伐克的一个小镇——乌赫罗维克。那时，他的父母从美国回来还只有三个月。他的父亲，今斯洛伐克科学院院长，是“伊利诺斯[①]社会主义党”的创始人之一。杜布切克一家于1925年移居苏联。青年亚历山大在那里当了一名制模工学徒。大战爆发前不久，他们一家却回到了斯洛伐克。1939年，亚历山大加入共产党，在斯科达工业公司的杜布尼察工厂做工时是党的地下组织的成员。在斯洛伐克起义中，他两次负伤；在这次起义中，他的美国出生的哥哥尤利乌斯于1945年1月遭到杀害。战后，杜布切克在特伦钦一家工厂里工作了四年，1949年成为党的脱产干部。在特伦钦当了两年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以后，他迁到斯洛伐克党的领导机构所在地布拉迪斯拉发，1953年又迁至班斯卡-比斯特里察。1955年到1958年期间，他在莫斯科的党校学习，以优秀成绩毕业。回到布拉迪斯拉发之后，他任区党委第一书记，并且是布拉迪斯拉发和布拉格两个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从那时起，他开始成为显要人物。1960年，他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1962年，他成为主席团委员，转年担

① 美国中部州名。——译者注

任斯洛伐克党的第一书记。

杜布切克是一个朴实的人，与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住在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一幢小房子里。他在党内有“清白”的声誉；例如，在1967年9月，他拒不同意党处理捷克作家的办法。1968年1月上台后，有几个月时间杜布切克住在一家旅馆的临时房间里，也许要观望一下他能否在布拉格长期呆下去。他代表一种新型的共产党政治家。和诺沃提尼相比，他给公众的印象是一种轻松得多的风度。他的演说是闲谈式的，不用难懂的术语，有时放慢了速度，寻找确切的词汇，他懂得如何取悦于人。在布拉格，他说，他感到非常愉快的是终于当上了这个市的公民，这使听众们很高兴。阴郁的家长统治作风，在杜布切克的政治生活中是没有地位的。他讲的内容比较轻松，而且是以轻松的方式表达的。他随时准备听取和采纳别人的意见。问题只在于这些意见的质量如何。

杜布切克的“民族”共产主义，他和莫斯科闹独立性的程度之大，这和1956年以来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是一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结束后的头十年，东欧共产党对苏联的依赖程度，是和这些党在取得政权过程中所得到的苏联援助的数量有关。铁托是南斯拉夫强大的游击运动的领袖，所以有搞独立的本钱；而东德的威廉·皮克和乌布利希就差得很远了。

哥特瓦尔德在布拉格还没有受到同样的限制。他把战前苏联共产主义的全部发展，集中在他当政的五年中(1948年到1953年)去搞。哥特瓦尔德从一个有希望的

"社会主义"革命(它使共产党成为这个国家的决定性政治因素)登台，而在布拉格的大清洗中途去世。1952年至1954年间布拉格公审中主要被告的罪名，在斯兰斯基案是"铁托修正主义"，在克利门蒂斯案是"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这些问题最后在杜布切克和诺沃提尼之间的斗争中才得到了解决。

对斯洛伐克人来说，斯大林主义表现在布拉格的中央集权主义，因此他们比捷克人更容易有要求独立的习惯。杜布切克由于他在斯洛伐克起义中的卓越业绩，以及没有在战时流亡斯大林俄国的经历，可以同俄国人平等地进行交涉。他在莫斯科党校学习的时间也是重要的。1955—1958年正是赫鲁晓夫结束个人崇拜，松开斯大林帝国对东欧束缚的时候。

杜布切克是倔强的，他有一套政治纲领。到他上台时为止，他的策略都是无懈可击的。他和他的支持者在危机中取得进展而没有作出任何策略上的妥协。在1967年12月这个关键时刻，杜布切克和普尔赫利克将军在布拉格党的政治学校召集了一次高级军官会议。向全国各地的部队司令部都派出了特别代表，这就使诺沃提尼和国防部副部长扬科将军无法为自己的目的去使用武装部队。由于军队和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都支持杜布切克，已经准备好的对杜布切克及其支持者们的逮捕证也就毫无用处了。

1月初，中央委员会会上选出了四名新的主席团委员。他们都是杜布切克的人。扬·皮拉尔，镟工出身，

1945年入党，原来已被提升到党的高级职位。诺沃提尼在1962年时曾把他调到政府部门任副总理，1965年又把他降了职。从那时以后到1968年1月，他一直担任着较低的职位——重工业部副部长。约瑟夫·什帕切克，主席团最年轻的委员(生于1927年)，布拉格高级党校毕业，曾担任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从1966年4月起任布尔诺区党委第一书记。他曾经保护过直言不讳的布尔诺文学杂志《归客》，在党的危机中，他采取了坚决反对诺沃提尼的立场。约瑟夫·博鲁夫卡，战前入党，他生动活泼，能说会道，是东北波希米亚一个农业合作社的主任。当他被选为主席团委员时，他请求依旧留在他的小村庄里。第四个新委员埃米尔·里戈，是东斯洛伐克大型炼铁厂党组织的负责人。1月底，斯洛伐克党公布了人事变动。瓦西尔·比拉克继杜布切克任第一书记。

除了主席团的变动之外，捷克斯洛伐克的公众生活在1968年1月5日宣布领导阶层斗争的结果之后，平静得出奇。政治家们似乎已精疲力竭。在快到月底时才恢复了积极的政治生活。1月29日，杜布切克赴莫斯科作了一次短暂的访问。他向俄国人保证布拉格的人事变动不会影响东欧的外交和军事体制，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团将参加预定月底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共产党国家会议。他要求苏联领导人让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清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在杜布切克赴莫斯科之前，捷克党报的一个外事评论员强调所有共产党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2月4日，杜布切克在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边界上的科马诺城，

会见了匈牙利党的领袖卡达尔，向他保证捷克斯洛伐克一切情况正常；三天以后，杜布切克在靠近摩拉维亚和波兰边界上的城市摩拉维斯卡-俄斯特拉发，和哥穆尔卡谈了同样的问题。2月19日，中央委员会负责和外国共产党国家联络的书记弗拉基米尔·考茨基，动身赴罗马尼亚。

在肯定获得了东欧一些有影响的共产党领袖的支持，或者至少是善意的中立之后，杜布切克就转向国内问题。他的那些重要的同志中，有些人已经有点不耐烦了。1954年以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已在1963年恢复了名誉）的古斯塔夫·胡萨克，于2月初写道，人民正以新的希望，但也抱有旧的疑虑注视着新的形势。（《文化生活》周刊，1968年2月2日。）前驻伦敦大使米罗斯拉夫·加卢什卡在布拉格电台上说，他记起了1956年的相似情况。那时党内的每一个人都“公开地、坦率地”发表了意见，但是什么也没有得到。

然而，杜布切克的缓慢步伐对于形势却是很合适的。没有必要到处去讲第一书记准备进行彻底的改革。这样做，是可能会被误解的。就杜布切克来说，他希望了解有些什么样的要求。

同时发表了党的上层机构的第一批人事调动。第一个下台的是负责保安工作的米罗斯拉夫·马缪拉，他被调到列特纳尼的飞机工厂当职员。瓦茨拉夫·普尔赫利克上将接替了他的职务。从1956年以来，他就是武装部

队的政治顾问，1958年当选中央委员，1960年任国民议会议员。他在阻止诺沃提尼使用军队来反对改革派中出了力。他在军队政治部的职务，则由埃吉德·佩比赫少将继任。佩比赫原来炼钢工人出身，参加过斯洛伐克起义的战斗，战后成为职业军官。亨德利赫在3月初下台，新当选的主席团委员约瑟夫·什帕切克当上了意识形态部门的负责人。

在1968年2月22日，共产党取得政权的二十周年纪念日，有东欧和苏联领导人在场，杜布切克发表了他上台后的首次重要演说。他呼吁全体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帮助他使这个国家从顽固的冷漠无情中解脱出来。他对工人说，他特别依靠工人们的合作，还指出解决目前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他强调说，对过去的政治犯、在旧政权下受到迫害的人、特别是“那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共和国工作过的”人，必须完全恢复名誉。他批评了1960年宪法中有关民族问题的部分，声称必须作出新的安排，既能被斯洛伐克人所接受，也能被捷克人所接受。关于外交方面，杜布切克说，欧洲是捷克斯洛伐克表示主要关注的地区。在提到西德时，若与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把西德说成是“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的陈词滥调相比，他的语调就显得较为温和些。然而，勃列日涅夫赞扬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和它过去的成就：这是提醒杜布切克苏联真正赞同的是什么。诺沃提尼总统在次日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就同一主题作了细致的刻划。例行的阅兵仪式没有举行。

在庆祝二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武装部队的周刊发表了武装部队政治部的新首脑佩比赫将军的文章，证实了诺沃提尼在岁尾年初时曾试图发动军事政变的消息。(《人民防线报》，1968年2月23日。)两天以后(1968年2月25日)，扬·谢伊纳少将偕同他十八岁的儿子和一个年轻姑娘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边界。为此要求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当局协助追查他的下落。谢伊纳是国防部党委书记，直接隶属于中央委员会负责保安工作的首脑马缪拉。谢伊纳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将军，生于1927年，原为农业工人出身，是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国民议会议员。由于党的推荐，他在武装部队中升迁很快。由于性格内向和有点羞怯，从1963年的某个时候起，他开始对写作发生了兴趣。那时他是上校。他就请人辅导他写作，并且交上了来自文艺与电影界的新朋友。其中就有布拉格的阿尔提亚国际出版公司的总经理，诺沃提尼总统的儿子。

1967年12月，诺沃提尼总统要求谢伊纳务必以军队来支持他。谢伊纳就和国防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扬科上将合作，看来就是他们发出了要军队进入临战状态的命令，并开始把驻西波希米亚的第一坦克师调往布拉格。国防部长洛姆斯基将军在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则不甚清楚。在追究此事的高潮中(1968年3月初)，在一次电视转播的冰球比赛的休息时间里，洛姆斯基将军否认他和这个阴谋有牵连。他说，军队没有企图影响中央委员会的决策；他还说，由于12月4日到18日之间在中、

北、西波希米亚恰好有军事演习的缘故,可能引起人们猜疑,但也可能有人“背着我发布命令试图利用武装部队”。

主要的策划者谢伊纳和扬科不能很好配合起来。扬科是一个有经验的职业军官。第二次大战时期,他在俄国前线的捷克斯洛伐克师作战。他回国时三十三岁,是最年轻的一个将军。但是,谢伊纳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军事经验。他未能完成诺沃提尼交给他的任务,因为他没有弄清各军区司令员究竟对谁效忠。他在1968年2月底的逃亡,竟使诺沃提尼丢了总统宝座,但同时也使杜布切克和他的朋友们处于并不令人羡慕的地位。在华沙条约国家里,已逃亡出境的军官当中,以谢伊纳的级别最高,所以他的逃亡必然使华沙条约武装部队的司令员们大伤脑筋。这次叛变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盟国有了借口对布拉格的改革派施加压力,特别是在军事方面。

然而,谢伊纳逃亡的官方解释——说他卷入了大规模的三叶草籽投机活动——倒是给国际上增添了一点笑料。美国中央情报局驻西德的头子雷·S·克莱因,立了从1962年以来的最大一功。(1962年他曾把古巴导弹基地的照片送到肯尼迪总统的面前。)1968年3月14日,扬科将军在他的公家小汽车里开枪自杀,这是将军们的阴谋演出了它的最后一幕。也是这次革命中很少的几次开枪中的第一次。

虽然他在每一个(包括倒数第二次的)回合中都输了,诺沃提尼在1968年1月5日的时候还没有承认失败。他不满足于当一个有职无权的国家首脑。他深知1

月份的人事调动并未影响到党的基本结构和党政之间的安排：他知道大多数由他任命的人员仍然在职。他高估了他们对他个人的忠诚，低估了改革纲领的感召力。为了修补他已经受损的地位，诺沃提尼试图争取工人的支持。2月17日，他访问了布拉格东郊最大的工厂"捷卡德"，这个厂是他一向特别关注的。他的老一套讲话——他的政府过去取得的成就和对工人阶级利益的新威协——却没有得到热烈的赞扬。

诺沃提尼的这种做法，却帮助了改革事业。他迫使这场辩论被带到了各工厂和公众生活中去，并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不再是党的最高领导层中少数人操心的事，却变成了全体人民所关切的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话开始了，革命每天都在更新。沉默了二十年之后，对话势在必行。

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不是去守卫路障，而是在倾听着、注视着和阅读着。不需要任何人去向各通讯中心进军并加以占领。它们等待着有此需要的人去使用。编辑室和播音室成了革命的活动中心。一种新式的政治活动家出现了。党的机器被投进了熔炉，最高奖赏不再属于那些能够操纵这种机器的人，而是属于那些能够抓住和保持广大听众注意力的人。改革派也被自己放出的洪水惊呆了。

热烈过问政治成为最时髦的消遣。1968年3月和4月，成百次这样的集会在捷克斯洛伐克各地举行。第一次这种活动，由布拉格的青年运动组织和共产党的历史

研究机构安排，已于1968年3月13日(星期三)举行。地点是布拉格市中心一家大舞厅；有几百个青年进入了会场。还有几千个青年只好呆在外面，把附近街道的交通都阻塞了。第一次活动的成功，使组织者相信有必要再举行一次。一周以后，第二次活动就在当时所能得到的一个最大会场中举行了。议会宫原设计可容纳三千人，但是进去的青年人至少超过此数一倍多。整个会场已被挤得水泄不通，连售货小亭也被利用了。青年们自己掌握会场的灯光。他们把强烈的灯光集中在发言人的身上：主席要求他们把灯关掉。会场以外，一大群一大群的人从他们的半导体收音机中倾听会议的进程。他们要晚一小时才听到，因为大会是在下午七时开始的，而全部录音广播则到八时才开始。这两次会是想在政治上"打开大门"，并给群众提供他们所关心的情况。

现在的国民议会主席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是这些公众集会最红的明星之一。斯姆尔科夫斯基生于1911年，离开学校后曾向面包师傅学艺。他于1933年入党，并在苏联接受政治教育训练。战前，他在共产党的青年组织中工作；1944年成为地下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在1945年5月布拉格反对德国人的起义中，他起过重要的作用；1948年当了农业部的副部长。他在1951年8月被捕，斯兰斯基案件也牵连到他，说他是"盖世太保的代理人"。斯姆尔科夫斯基在1955年获释后，曾去偏僻地区呆了八年光景。接着，他又先后在森林管理机构和集体农庄工作过；1963年正式恢复了名誉，成为中

央委员会农业部门的一个成员，1967年1月担任林业部部长。

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公众面前的态度是令人愉快的，表现得既热情又轻松；他很善于思索和追忆。他对年轻的听众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对他们说，"……你们有权利和有责任更加激进和更加革命。在我国这次伟大变革的过程中，我们年长的人有责任不让任何意味着灾难的事发生。"会上提出的问题是各式各样的，从政治到私人生活各方面。这些问题大多数是严肃的、坦率的；有些是轻浮的，并带有刺儿。有人问作家扬·普罗哈茨卡，"你认为伊里·亨德利赫怎么样？"普罗哈茨卡回答说，"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人。"也有刊登在报纸个人问题专栏中的那种问题："我的丈夫是个军官，也是斯洛伐克人，在我工作的地方，人人都和我为难。我应该怎么办？"普罗哈茨卡回答说，"我们谁都有自己的问题哪。"一个私人生活的问题，也会引起政治性的回答："去年安托宁·诺沃提尼当了你儿子的教父，是真的吗？""不是儿子，是女儿，他也不是她的教父，只不过是有一天晚上他来吃过晚饭罢了。他所以来吃饭，因为去年我好象自以为要左右欧洲历史的进程似的。那时，有一个西德记者给我打电话，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谈；于是，我们会面了，他告诉我说，基辛格先生想捎个口信给诺沃提尼先生。因此之故，我就邀请了诺沃提尼同志来吃晚饭。结果他来了，我就把这个口信转告了他，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为那些由于政治罪名而遭到不公正判决的人恢复

名誉，是听众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向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马丽亚·斯维尔莫娃所提出的质询，主要就是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斯维尔莫娃后来说，当她读着向她提出的那些问题时，“我感到惊讶，为什么没有在五十年代黑暗时期生活过的青年人会谈论恢复名誉问题，为什么他们要重新追究那些问题？我只能用他们要准备战斗来解释。”对于大清洗的原因，斯维尔莫娃作了如下的回答：

“这是我们常常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也是一开始就使我们感到犹豫的问题。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考虑那些问题。请相信我，经过了很长时间后我们才去找寻原因，去追查根源，为什么一个共产党人要去攻击另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老朋友不再互相信任，而是相互畏惧。在随后的那些岁月里，我已不是社会的一个成员，我已同社会完全隔绝了。请相信我，我时常对自己说，——自从我被释放以后——我在监狱里，比人们生活在十分紧张的气氛中，承受心理上的压力，要求处决所有那些被称之为罪犯的人，要过得好些。我在这里不能告诉你们全部有关事实，它们不是在某一天开始的，这是长期发展过来的。整个时期必须加以审查。我相信这是从接受斯大林若干不正确的教条开始的，包括他的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观点在内。在那段时期里，就开始努力去揭露暗藏的敌人以及一旦发生战争时所有那些可能组成第五纵队的人。最后，在敌人正在试图渗入共产党(包括最上层)的口号下，就在我们自己党内进行了追查。”

马丽亚·斯维尔莫娃对战后的共产党领导人很了解，她认为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自己本来也必定会成为这件事的牺牲品，因为他完全相信“那些可怕的指控，

从而撤消了对他最亲密的朋友们的保护。当他停止相信这些(指控)时,他就活不下去”。哥特瓦尔德是在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回到布拉格之后三天死的。

对最敏感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关系——也由斯维尔莫娃作了回答:

“圣诞节前勃列日涅夫同志被邀请到这里来,在他了解了这里的情况后,他说,‘同志们,那是你们捷克斯洛伐克的事,苏联党和苏联将不干涉你们的内政。’刚巧这是事实……当我们获悉已经请了勃列日涅夫同志来,而且他已经来了,我们对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这一点是感到疑惑的。但当我们明白了他的观点时——他早晨到这里,晚上就乘飞机走了——我们很高兴。当然,你们很多人可能认为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那是因为你们过去对政治不感兴趣,你们对政治感兴趣才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你们认为,在我们的共和国里,坐在驾驶员位置上的是苏联。我的年轻的朋友们,如果谁仍然这样想,那是大错而特错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同志们,我们的关系现在是建立在平等和自主的原则上的。那是真的。……我们常常看到青年发泄他们对苏联的不满,特别是在冰球比赛时更是如此。请注意,喜欢或不喜欢,那是个人的私事。谁都不能强迫你们哪。但是,你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当你们回到学校或家中时,打开地图看一看:谁是我们的邻居;因为我们现在不可能脱离政治而生存,瞧在德国那一边,又是什么样的政治,这一点可能会引起你们的注意。这是为了使你们切莫象我们自己那样经历一个可怕的醒悟过程。不要把我现在所说的当作儿戏,不要虚度光阴,不要低

估你们对我国安全所负的责任。我想再说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有苏联，那我对我国的前途是很担忧的。我这样说是出于一片真诚。至于我们的各种罪恶，事事'模仿苏联'，连刷牙也学苏联的样子，如此等等，对于这些，苏联可没有责任。……"

斯姆尔科夫斯基在1968年3月20日和青年第二次会见时，警告他们要当心混在听众中的挑拨分子，特别是在回家的路上更要警惕，以免和警察发生扭斗。他提醒听众说，这场辩论不应当是"无效果的"，也不应当"陷入某种不可控制的无政府状态，如果这样，我们都要为此而付出代价"。它应当是一种向前看的讨论；斯姆尔科夫斯基接着说，"我想，现在我们很多人会认识到我国可能变成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有很多东西值得向西欧发达国家人民推荐。"

在议会宫大厅里举行的集会，是浸沉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大会进行了六个小时。发言人——希克教授、戈尔德斯图克教授、作家与旅行者伊里·汉泽尔卡和其他一些人——开诚布公地、生动活泼地回答了向他们提出来的各种问题。一年前被大学开除的卢博斯·霍勒切克，这时身穿军装出现在讲台上。他说权力垄断问题是头等重要的；接着他说：

"如果说我们能这样讲话和集会就是当前巨大的进展的话，我们认为，用我们现在的声音去支持杜布切克同志领导和代表的党，还不是我们最后的要求，也不是我们最后要说的话。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举止应该是明智的、审慎

的和合乎人情的，我们将不让这个进展（虽然是有些混乱和偶然的开始）被任何方式所糟蹋。与此同时，我们要宣布，我们将为实现我们自己的纲领而努力，这是青年人的纲领，它可能同某些有名的进步人士，比如戈尔德斯图克教授的计划不完全一样。”

经过充满着激动的六小时议程以后，以大会的名义起草了致国民议会的一封信，要求诺沃提尼总统辞职；也起草了一个“青年宣言”。宣言说不能考虑恢复资本主义秩序，因为“社会主义是我国的现实”。但是，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废除权力垄断和新闻垄断，是“公众生活彻底民主化”的一个必要前提。青年们要求废除新闻书刊的检查制度，修改集会法，改变领取护照和出境签证的办法，进行经济改革，要求知道“我国经济的全部真象”，以及“民主的法律保障”等等。宣言设想成立一个“宪法法院”（负责审查法律和宪法之间有无矛盾），并审查新法律的公布。要求把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开，也要求为所有遭到不公正判决的公民恢复名誉。“我们希望应从我们在中欧的地理位置出发来考虑我们的外交政策。”决议宣读以后，对外交问题展开了生动的、有时是激烈的辩论。最后，原文在作了如下的补充后即被通过：“……并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建立平等的关系。”

第七章　四月行动纲领

整个3月份来自下层的压力在不断加强。两个周年纪念日——3月7日托马斯·马萨里克的诞辰和3月10日扬·马萨里克的忌辰——给捷克人要求继承为诺沃提尼政权所否定的那种传统提供了机会。官方代表团，数千名学生和工人，拜谒瞻仰了在拉尼的马萨里克父子的乡村墓园。同时，和诺沃提尼体制关系过于密切的高级干部，在党内却受到了重大的压力。在各区党的会议上批评了很多部长，其中包括总理列纳尔特、国民议会主席博胡斯拉夫·拉什托维奇卡、布拉格区委第一书记马丁·瓦丘利克。瓦丘利克应邀去布拉格大学哲学系教授会回答问题，他被告知说，"别害怕，瓦丘利克先生。凭你的那套词汇你准能再混过几次革命的。"

1968年3月22日诺沃提尼辞去总统职务，和旧政权最后的一点可见联系就此断绝。党的主席团推荐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将军接替他。国民议会在3月30日的秘密投票中接受了这个建议。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卢德维克·斯沃博达都在俄国人一边作战，第一次是在捷克志愿军里，第二次是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一个司令员。1945年4月，贝奈斯任命斯沃博达为国防部长。他在1948年加入共产党，1950年3月根据斯大林的直接

命令离开了部队。然后，他有一年多时间主管国家体育组织，从 1952 年初起已完全退出了政界。他受过短期监禁，后来在一家农业合作社当会计。赫鲁晓夫有一次访问布拉格时问起了斯沃博达，花了好些时间才把他找到。此后，斯沃博达慢慢地重新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身份是撰写有关军事文章的作家。1965 年 11 月，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英雄的称号。他现年七十二岁，手脚仍然轻健，是新政权的挂名领导。

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是 3 月 28 日开始在布拉格城堡召开的，中间插进了总统选举。全会同意杜布切克推荐的总统候选人，接受诺沃提尼辞去主席团的职务，并选出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填补空缺。一月变革时期的驻罗马尼亚大使、和诺沃提尼不和的切斯特米尔·齐萨日博士，这时当选中央委员会书记，负责教育和科学工作。当中央委员会在 1968 年 4 月 1 日复会时，杜布切克和他的同盟者立即对中央委员会表示尊重，并把它的会议记录广为散发，以进行宣传。

杜布切克告诉中央委员们，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讨论眼前的行动纲领草案。杜布切克在讲话中一再提到两个主题：1968 年 1 月以来的形势和党的作用。他说，中央委员们特别清楚“1 月份时我们的意见有多么地不一致”，因此当党的领导“向新的发展敞开大门并采取主动时，它对这些事件究竟如何发展却拿不出详细方案来”。自发而不受操纵，是当前形势发展的主要优点。

> “很多人吃惊到了如此程度，他们忧心忡忡地在想党这样做岂不是在对压力让步么，要不是被这些发展所迫，党是不会放弃它的立场的；他们担心党能否对付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出现的错误态度和无理要求。”

杜布切克知道，党内有很多人也许宁可保持过去的状况，那时存在着“按照某些领导同志的意向所形成的似乎是一致的社会利益”；他们宁可不要1月份以来出现的大量不同的和对抗的利益与观点，这些利益与观点“代表着极不相同的社会集团的某些眼前和长远利益”。他接着说，“某些非社会主义情绪复活了，甚至有人愤怒叫嚷要求报复”，党“必须克制自己，以免在民主和恢复名誉的掩盖下使那些情绪合法化”。但是，杜布切克又说，“让我们不要害怕这个浪潮，让我们从中学习吧。”党应该分析和领导这个浪潮。“对党的信任和党内的自信，正在日益增强。”

杜布切克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对抗的扩大”(换言之，就是冷战的开始)为背景，来评价斯大林的政策。1968年4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看到了党的任务是“在非对抗关系的时代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从而“需要发展、形成和创造一种适合新形势的政治制度”。党必须创造性地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

> “因为党掌握了科学的理论，因为党在历史上取得了成就，因为改革的过程以及我国跨进新的发展阶段都是在党的支持下进行的，所以，我们想，我们有权利、也比过去更有

理由地宣布：共产党仍然是我们社会里具有决定性的和有组织的进步力量。”

按照杜布切克的说法，党应当对社会作出有力的冲击，但必须避免用暴力去统治社会。党应当在公众讨论中捍卫它的领导地位：“必须重新建立权威，因为权威决不是永远属于哪一个人的。”杜布切克然后讨论了政府的任务和政府与国民议会的关系，他说，所有由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机构，直到国民议会这一级，都应成为真正决策的地方。杜布切克认为，他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有赖于代表机构的复活，和所有“社会和利益集团”的真正独立。他说，这不是“把党的生活恢复成形式上的议会制”的问题。杜布切克建议撤销1967年9月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关于由文化部接管和领导作家协会所属的周刊，并将克利马、利姆和瓦丘利克三个作家开除出党。他还要求撤回对作家兼剧作家帕维尔·科霍乌特发出的警告，并要求取消米兰·昆德拉所受到的党纪处分。

转天（1968年4月2日），伊里·亨德利赫和弗拉基米尔·考茨基辞去了他们在党内的一切职务。（《红色权利报》，1968年4月2日。）考茨基系在警察和学生发生冲突的斯特拉霍夫事件时主管教育，他在中央委员会发言时，竟归咎于当时他正在患病，并听取了错误的汇报；亨德利赫却比较直率，他说：“因为我为党的团结担忧，我试图去调和不可调和的极端问题。那就是我最严重的错误所在。”安托宁·诺沃提尼在4月4日作了一个多钟头

的发言。发言人的名单上原来没有他的名字；可是还让他的发言超过了规定的十五分钟。他说："我想说从我们民族民主革命开始以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虽然他承认某些小错误，比如谢伊纳的提升，但他还同意

> "那些同志的意见，他们说党对意识形态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进展，还未能充分地加以控制。各式各样的新闻工作者都在积极的或消极的意义上使公众受到影响。正在让国内的消极力量活跃起来。联系到恢复名誉问题，如果设想事事都要复原，就会产生一种运动，其结果只能是有害于党。我们务必不要因为目前人人都说自己是为了社会主义而受到迷惑。"(«劳动报», 1968 年 4 月 6 日。)

他在发言时受到了嘲笑。之后不久，科学院的历史学家们给他写了一封公开信，来回答他的发言。他们提清诺沃提尼注意：1951 年时他已经进入党的最高领导班子，而那时正在对巨大的政治审判作出准备。虽然当时他并不是这些审判的主要组织者，但到临近第一次大高潮的末尾时—— 1953 年和 1954 年——诺沃提尼已是党的最高领导了。因此，他必须和萨波托斯基总统和西罗基总理共同分担责任。"在 1956 年，你和党的其他领导成员都知道审判是事先策划的。既然知道情况，就应该接着采取果断的行动。可是直到八年以后，在受到形势的极大压力之下才采取了行动。"历史学家们也没有放过诺沃提尼所说的这句话：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没有任何人由于他的政见而受到过非法的审讯。撇开 1956—1961

年间的许多事例不谈，历史学家们提醒诺沃提尼：在1961年，就有一批老党员和老干部被捕；在1964年，一位对政治有兴趣的哲学家伊凡·斯维塔克，连同科学院哲学组全体成员一起受到了迫害；同年夏天，普尔斯博士也被逮捕了。

历史学家们在他们给前总统的信中还指出，“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再次出现了对政策作基本改变的新机会。”那时诺沃提尼在干啥呢？他正忙于揭露和惩罚一批“亲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拼命压制党内的知识分子。前斯洛伐克农业部长尤利乌斯·朱里什，由于不同意诺沃提尼的政策，就丢去了中央委员的职务。最后，在1962年捷共“十二大”以后，“事态开始发展了，而你对它并不是全都反对的”。对党员的审判重新作了彻底的检查，党开始考虑奥塔·希克等人所建议的经济改革。全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开始有了生气，但是新的希望又破灭了。

> “去年你的态度表明：你选择了用暴力这个极端手段，来镇压我们社会的民主改革运动。你在4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演说中，竟把当前我们党和社会的发展说成是你一贯（虽然有时未能坚持）追求的某些东西的继续。这是我们完全不能同意的。”

就在他发言的那一天，诺沃提尼被正式解除了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米哈尔·胡迪克，奥塔卡·西穆涅卡，伊里·亨德利赫和博胡斯拉夫·拉什托维奇卡也离开了主席团。前工会领袖米罗斯拉夫·帕

斯蒂日克，也被撤消了主席团候补委员的职务。然后，杜布切克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新的候选人的名单，旨在减少主席团委员的人数，同时也减少兼职。因此可以有更多的人去担任较少的高级职位。秘密投票的结果是有点出乎意料的，例如选出了马丁·瓦丘利克和前总理约瑟夫·列纳尔特为主席团候补委员，列纳尔特还当选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有关政府中的全部共产党员都要辞职的建议，这时也获得通过。几天以后，宣布了以奥德日赫·切尔尼克为首组成新的内阁，他是杜布切克在主席团里的老盟友；奥塔·希克教授则是他的副总理之一。改革运动的第一个阶段结束了。

当中央委员会于 1968 年 4 月 1 日复会时，它指定了一个小组草拟党的“行动纲领”。奥塔·希克，帕维尔·奥尔斯佩格和《十字路口的文明》(见本文第五章)的作者、科学院研究组负责人拉多万·里希塔，他们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科学院的另一个研究组负责人兹德尼克·姆利纳日，在 1968 年 4 月 4 日当选党的书记处书记。)在 4 月 5 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中央委员会批准了行动纲领。

由于采纳了事先在里希塔研究组调查报告中论述过的长期打算，行动纲领得到了加强。它强调了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必要，就是要把这个传统放到原来所属的工业化社会的范围里去考虑。纲领的第一段指出，“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土地上，二十世纪社会的发展已受到两股强大潮流——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的推动。”这个纲领的结束语说，

> “我们现在必须经历不平常的局势。我们将进行试验，给予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形式，运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些都有赖于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发展作出正确的理解。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比较先进的物质基础的价值及其利用状况，由于它的非常高的教育水平和无可否认的民主传统，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有重任的国家。如果我们不利用这样的机会，那谁都不会原谅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第29页，«红色权利报»1968年4月8日增刊。）

存在着特殊的“捷克斯洛伐克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它是把社会推向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个工业国家。纲领扼要分析了“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原因，其中提到“个人，特别是诺沃提尼同志的特殊地位”，接着纲领的作者们干脆直接指着诺沃提尼说：“党断然谴责那些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集团相互为敌的企图，党将消除一切在它们中间制造紧张关系的因素。”

虽然工人阶级仍旧是现制度的主要支持者，党将“竭尽全力使复杂的和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得到合理的报酬”。纲领中有一节专谈“虚假的平均主义”及其废除。这样的平均主义被看成是

> “深入发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障碍之一。平均主义是有害的，因为它有利于懈怠无用的和不负责任的工人，而不利于自我牺牲的和刻苦勤劳的人；有利于不熟练工人，而不利于熟练工人；有利于技术上和专业上落后的人，而不利于具有首创精神的有才干的人。”

在讨论党的领导作用时，纲领特别提到要取消“干部

晋升最高限度"的制度，即那种从工业、教育等部门的领导职位中排除非党员的惯例。

必须为 1968 年夏末将要举行的党的"十四大"的议程和新宪法做好准备。但是，不必因此而推迟改革。改革的基本前提是"要指出哪一个机构、哪一个干部或官员对哪些事情应负责任，实行改革的保证是什么，制度、工作方法、或具体到某人是否必须更换"。关于机关和个人职权的新规定，连同各种组织在政治生活中的一体化，已被设想为发展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手段。"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不能为任何一党或几个政党的联合所垄断，必须让所有一切的人民组织都能得到。"行动纲领要求社会主义的民主必须比资产阶级的民主更加深入。设想了定期进行民意测验和发表测验结果的办法。集会、结社、迁移的自由，少数民族的权利和个人财产应受到保护，这一切都由法律加以保证。共和国应当成为两个平等的民族——即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国家。纲领主张分权应当成为反对滥用权力的保证。国家机关的地位过去被压低了，甚至在中央政府一级，曾经有"把责任转移给党和取消决策的独立性的趋势。"

纲领在经济部分则全部承认了改革派的努力。它强调"生产结构必须多样化，就象市场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也批评了服务的低标准。在服务领域里还可以有"小私有企业"的地位。国家的经济生活应当更富有弹性，以便能对国内外的经济变化迅速作出反应。"同世界市场长期隔绝，已使国内的价格结构和国际价格脱节。"产业部门

的实际工资应当每年增长2.5%到3%。工会应当恢复它们的原来职能，集中全力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不应象过去那样成为自上而下的经济制度的支持者，或则甚至是一个立法团体。

纲领中关于科学与教育的一节说，“社会主义的起源、自立和胜利，乃是工人运动和科学相结合的结果。……从长期来看，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将由科学技术的领域来加以解决。”但是，研究和生产之间，仍然有过多的障碍；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党的推动，但党“不应干涉创造性的科学工作的实际进程”。“艺术作品必须免受检查”，虽然，

> “艺术的社会影响不是没有政治意义的。我们将注意充分尊重受到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然而，共产党不能放弃引导的任务，不能放弃使艺术作品有力地塑造为改造世界而斗争的社会主义者的努力。”

纲领的最后部分涉及到外交政策。提到了“世界范围的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所作的斗争”，并强调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保持友好关系的必要性。

> “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将积极推行和平共处的政策。我们的地理位置和一个工业国家的需要与前景，要求有一个更加积极的欧洲政策，旨在同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发展互利关系，并巩固欧洲大陆的集体安全。”

改革派同意必须复兴国家的经济，必须废除预防性的新闻书刊检查制度，必须通过联邦的办法来处理斯洛伐克问题。但是党的“领导”地位，和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所

获得的自由的"保证"，都是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1968年1月以前，只有党的领导人才关心党在国家中的地位。诺沃提尼在4月4日对中央委员会的演说中，机灵地估计到他的很多同志将会丧失过去已经确定的东西，因而他深感忧虑。哪一个执政的共产党从来都不准许对它的垄断地位进行公开的讨论。

在强大的压力下，四月行动纲领的作者们承认：这个纲领决不是改革的定论。虽然主要的共产党人不断提到他们国家的民主传统，他们都不愿说应该恢复某种"正式的"多党制政体。他们认为把国家和党的职能分开就意味着相当大的进步。尽管这样，党的新主席团中两个主要的改革者——奥德日赫·切尔尼克和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还是在国家机关中兼任了很高的职务。在1968年春天的形势下，只要共产党本身保持着民主，民主议事的进程就会继续下去。如果党在自己的组织里还限制自由交换意见，如果党的领导人决定要以别的方式进行统治，那么，垄断权力之路是向他们敞开的。

从理论上说，捷克斯洛伐克还存在着另外两个政党。一个是社会党，它的前身是1898年创立的国家社会党。这个党当时成立的目的，是为了遏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传播，亦即对付社会民主党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捷克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它变成了爱德华·贝奈斯博士的党。另一个政党人民党，是与中欧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传统有联系的。这两个政党势力都没有扩展到斯洛伐克。

1948年1月，人民党拥有四十八万三千七百二十五名党员；1966年党员人数已减到只有二万一千三百六十二名。它的报纸《人民民主报》(沿用党名)，平常每天发行十五万六千八百份，星期日则达二十二万五千份。1956年以前，没有允许这个党发展新党员；它的四分之一以上的党员(26.8%)是领养老金的人，还有30%的党员则是农业工人。在国民议会中，它有二十个席位，它的一个被开除出教会的天主教神父，竟在政府中当了二十年的卫生部长。

社会党在1947年拥有六十五万二千名党员，1949年时只剩下三千七百九十二名，到1967年则有一万零七百零五名。它的日报《自由言论报》，平常每天发行十七万份，星期日则达二十五万份。这个党的主席当了二十年的司法部长，并在国民议会里拥有和人民党相同数目的议席——二十个。目前不能把这个党看成是政治权力的认真的竞争者。它没有纲领，它的领袖长期以来是和旧制度妥协的，对新的发展没有作出任何贡献。人民党的报纸还能维持一般日报的标准，但是自从检查制度放松以来，它已落在其他各报后面了。如今共产党的日报经常引用《泰晤士报》，而社会党的机关报则仍旧依赖于《晨星报》的新闻和评论。若同共产党相比，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两个党，以及在斯洛伐克的另外两个小的政治组织的力量，则都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它们有自己的机构和报纸，它们极不可能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中起作用的力量。1968年4月，这些小党的总书记都否

认曾有企图把它们的党扩大为有广大群众参加的组织。(《学生》，1968 年 4 月 3 日和 10 日。)

在不能使老的政党重整旗鼓的情况下，对于如何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完善地重建各种力量之间的制约和平衡这个问题，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通过大规模的宣传工具表达出来的舆论，就足以控制政治权力。报纸和广播，尤其是电视，对政治事件发展的影响是如此深刻，以致有人建议应该把大规模宣传工具的使用制度化，从而使这些工具有可能尽到它们的政治义务。但是，这样一来，大规模的宣传工具做的将不是它们的本份工作，而本份的新闻传播工作也许又要直接从属于政治考虑了。这样做也仍然不能保证党或政府去注意在电视屏幕上迅速出现，而又很快消逝的种种论点。

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的开明党员则主张，如果有人能提出另一个真正可供选择的纲领，那就应当给他包括组织在内的各种便利，以便把它公之于众。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政治让步。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通常在开始成立组织前就掌握了理论，即纲领的基础。但这并不是习惯的做法。在欧洲一般都是先有政党，然后才有纲领。

共产党人迄今认为其他一切建议——群众性宣传，国民议会中有个别非党议员，恢复非共产党党派的活动，工会和其他组织从事政治活动等——都比创建一个第二大党的建议更容易接受。想搞一个反对派，这使他们感到非常震惊。(参阅瓦茨拉夫·哈韦尔的文章，原载《文

学日报》，1968年4月4日。）

它向共产党人指出，不同观点的竞争，即所谓民主的基础，只不过是民主的公开表达方式而已。“民主不是信仰的问题，而是保证的问题”，“对权力进行公开的和合法的竞争”乃是民主的最好保证。“如果共产党不能从外界获得力量尽快推进它的有效控制，它将不能保证自己不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衰退。”要求共产党人承认非共产党人已经知道了多年的事情：社会主义如果牺牲民主，倒霉的还是社会主义自己。

这是现在（1968年初夏）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中最敏感和关系重大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可能影响到国家的前途。虽然共产党人没有把他们的行动纲领当作是最后的纲领，共产党的领导人感到眼下他们已经走得够远的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国家现在的情况和六个月以前相比，那么，他们是正确的。几个月的时间里经历了整整一个历史发展的时代。

第八章 回溯往事的革命

布拉格的改革派一再提到过去。这有点儿象是历史学家笔下的革命。“行动纲领”一开头就有一段历史叙述。科学院的历史学家们驳斥了诺沃提尼关于执政情况的自述。在1967年夏天的会议上，作家们既分析了书报杂志的检查制度和对作家的恩赐作风等涉及面较广的问题，也分析了他们祖国的过去。1968年2月23日，共产党人庆祝他们掌权二十周年；1968年10月28日则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日。

但是在某一点上回顾历史，却成了一触即发的政治问题。为五十年代的政治犯恢复名誉，就是要回顾的一个方面。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还活着。在那些审查、折磨过他们并判过他们罪的人当中，也有很多人还活着。一个从前的审查者和他的审查对象同住在布拉格附近某地避暑。一个已退休，另一个则已恢复了名誉，但两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遭到很大的损害。在晴朗的日子里，他们在一个花园饭店里相会并共进午餐。但象这样的友好并不是很普遍的。

根据捷克的历史纪述，在长时期的深重苦难中，悲剧是屡见不鲜的。十世纪初，当这个国家传奇式地开始出现时，就有过两次谋杀案，一个是行刺王室案，另一个是

谋杀兄弟案：文塞斯拉斯王子的祖母卢德米拉遇刺身死（根据她媳妇的命令），文塞斯拉斯则在教堂门口被他的兄弟所杀害。卢德米拉和文塞斯拉斯后来都被尊为圣者，他们短暂而默默无闻的一生，却成了对谋杀犯的永久的谴责。当时，扬·胡斯是维克立夫①的追随者，要求改革教会的战士，同时又是一个讲道能触动布拉格普通人的想象的传教士，捷克正字法的创造者。当扬·胡斯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②上拒绝放弃他的教义，竟于1415年7月6日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尸灰被撒落到来因河中。四年以后，1419年7月30日，第一次有记录的“扔出窗外”事件③导致了布拉格暴动，接着是历时约十八年的宗教战争。在1618—1620年，即“三十年战争”的开始时期，捷克社会上各个阶级已造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反。1620年11月8日，他们却在白山之役中被挫败；1621年6月21日，参加起义的二十七个领袖——三个贵族，七个骑士和十七个平民——在布拉格被公开处决。哈布斯堡家族牢牢掌握着这个国家。各市镇已逐步实现德国化，贵族则逐渐丧失了国籍；国家的政治中心已转移到维也纳；很多要继续信仰新教的捷克学者就只好流亡国外。反对宗教改革已在捷克土地上取得了胜利。布拉格成为巴罗克建

---

① 维克立夫(1324—1384)，英国的宗教改革家。——译者注

② 天主教的重要会议，1414年在德国康斯坦茨举行。——译者注

③ 例如以后在1618年5月21日又发生过“布拉格扔出窗外”事件，波希米亚的叛乱者把正在举行会议的两个帝国委员和他们的秘书扔出窗外，成为三十年战争的前奏。——译者注

筑① ——反宗教改革者的建筑——的城市。它不再是一个捷克城市了。如今捷克人可以说，在他们周围的最伟大的豪华建筑，能使他们想起了最严重的民族灾难。

他们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最近都对历史特别表示关切。布拉格大学庞大的历史系，拥有一些在国际上知名的教授。关于近代史的著作极受欢迎。然而，目前对过去的兴趣，它和缺乏普遍意义的某门严谨的学科，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的消遣都是毫不相干的。在这种回顾中，并没有什么感情用事，而是有一个道德问题。那些小说家，特别是卢德维克·瓦丘利克和米兰·昆德拉懂得这一点，因为他们所描写的对象，就是当前试图和过去妥协的那些具体人物。他们并不是在谈论什么最后的“历史判决”或者整个国家的普遍规律。

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现在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必须和过去妥协，而不是反对过去，或把过去当作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要回顾的这个时期并不太长。它只涉及一代人的一些时间。现在五十岁以上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公民，生下来时都是哈布斯堡帝国的臣民。他们（中年和青年一代更是如此），现在要面对令人迷惑的过去一段历史：哈布斯堡帝国及其在1918年的土崩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创始人托马斯·马萨里克和他的朋友兼助手爱德华·贝奈斯的个性和政治活动；1938年的慕尼黑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48年共产党的取

① 十六世纪末叶至十八世纪中叶欧洲的一种建筑形式，一般以盘旋的线条、奢华的装饰和显著的光影对比为其特征。——译者注

得政权。所有这些都被一层层的仇恨和崇敬包住了。

哈布斯堡帝国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实体。在今天的年长一代的父辈和祖辈们看来，那是理所当然的；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的，是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那种巨大的、家长似的形象。捷克人曾对维也纳的宫廷印象很深，只是抱怨它离得太远了。他们通常积极参与帝国的政治，但有时他们也会激流勇退，不愿再干了。

在哈布斯堡王朝的保护下，捷克人又开始过一种象文明人那样的生活了。十九世纪上半期，捷克农民的子弟开始大批进入德国人的城市。他们为了子子孙孙已把自己土地上的外国城市都收回来了。他们进入了第一批捷克的学校，自 1882 年起他们的子女已有了一所捷克的大学。这是一个创业维艰的文艺复兴运动。十九世纪中叶，他们最出名的作家还要花很多时间写向人借钱的信，因为当时书的销路很小。布拉格的捷克人为了建造他们的民族剧院，就得一分钱一分钱地把资金攒积起来。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情况改变了。有几个阔富的捷克人集资，在布拉格市中心为捷克人建造了巨大的音乐厅和舞厅。那时，捷克民族是兴旺和强大的，但缺乏自信，还没有证明它存在的最根本的东西：自己的国家。

托马斯·马萨里克在 1882 年担任了布拉格捷克大学的第一个哲学教授。他那时三十二岁，妻子是美国人，他讲的捷克话听起来却很象斯洛伐克话。他深受学生们爱戴，在当时重大的公开争论中，他大都有份。1891 年，他当上了维也纳议会的议员。他所用的信纸背后，都印

有道歉的话：由于时间关系，正面手书的信不得不很简短，请原谅。

象大多数捷克的政治家一样，马萨里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对哈布斯堡帝国的瓦解并不表示关注。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开始过流亡生活，这时他已是六十四岁了。马萨里克怀疑俄国的力量，而相信英帝国能对战争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德国和奥匈帝国击败了沙皇俄国，但反过来，他们自己又被得到美国支援的英国和法国所击败。这些战时发展的过程，使得马萨里克最终可能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

他在战争末期做了他一生中最有争议的事情。在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不久，他安排在俄国东线与俄军一起作战的捷克志愿军变成了法国陆军的一部分。1918年春，捷克志愿军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卷入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斗。一直到1920年，有些志愿军部队还呆在俄国，被西方盟国利用来反对列宁的政权。

在马萨里克和他的战时朋友、第二号人物爱德华·贝奈斯的领导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同当时中欧其他各国相比，它是相当兴旺和十分和平的。它对国内人数众多的日耳曼和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比对斯洛伐克人的政策更加通情达理。(见本文第四章。)但它毕竟是在争夺东欧势力范围的主要对手德国和俄国都已战败和后撤时才建立的一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是在西方列强的保护之下建立起来的，它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和这些国家友好的基础之上

的，特别是和法国建立了同盟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们在联合王国、美国和法国所作的宣传中，马萨里克和贝奈斯竟把哈布斯堡帝国描绘为“各民族的监狱”，捷克人一直在那里遭受苦难，同时也是始终表示反抗的。在两次大战之间，战时的宣传已被捷克的历史学家所接受并得到发展。他们尽最大可能从他们民族的历史中去掉哈布斯堡那一段，这样才能使他们的历史终于摆脱了局限于中欧的格局。此外在和约中还加上了两个条款，即反对哈布斯堡家族卷土重来，反对奥地利和德国实行联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那些岁月里，从捷克人的行动来看，有时好象他们的新国家就在法国的东面，只有一河之隔。

马萨里克在 1935 年辞去总统的职位，贝奈斯从外交部搬进了城堡①。托马斯·马萨里克于 1937 年 9 月 14 日去世，享年八十七岁。全体人民都哀悼他。沉默的群众队伍不分昼夜地登上城堡去最后瞻仰那位老人的遗容。当时举行了非宗教的追悼仪式；议会仿效古罗马的做法，通过特别法律，承认马萨里克“对国家的巨大功绩”。民族独立的象征已消逝了，这时敌人的武装力量已在逼近了。

一年之后，即 1938 年 9 月 29 日，英、法、意的首相和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没有被邀请去慕尼黑。根据协定，捷克斯洛伐克应向德国割让它的边境领土，还应作出有利于匈牙利和波兰的领土

① 指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府所在地。——译者注

调整。捷克斯洛伐克剩下的领土，则得到保证不会受到“无缘无故的侵略”。这时，捷克斯洛伐克已被从前的盟国所抛弃，重新陷入希特勒（在国内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帮助下）所制造的中欧混乱状态。二十年前，才建立起来的它和西欧的联系，和中产阶级民主的联系，竟然被毁于一旦。

1939年3月，希特勒占领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斯洛伐克则成立了自己的国家——一个在纳粹德国庇护下的小国。9月，战争爆发以后，成千上万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纷纷流亡国外。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加入了法国和英国的武装部队。1938年10月，战前捷克斯洛伐克的三大政治组织之一的共产党，已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以及斯洛伐克自治区内被禁。后来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莫斯科，另一部分则留在国内，转入地下。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瓦茨拉夫·柯别茨基，鲁道夫·斯兰斯基等战前党的领导人，全都到莫斯科去了。贝奈斯在伦敦为了使他的政府取得承认，曾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他曾得到共和国创立人之子、战前驻圣詹姆斯宫廷的大使[1]扬·马萨里克的协助。1941年，贝奈斯终于成为已获得承认的流亡政府的总统。

同年，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联盟关系，即西欧和东欧反对中欧，又一次出现了。不过，这一次首先垮下去的是法国，而不是俄

① 驻英大使。詹姆士一世（1566—1625）是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创始人，此处指英国。——译者注

国：是联盟的西方存在着弱点。这个结果却改变了中欧和东欧的政治面貌。在斯大林的红军推进到中欧之后不久，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兰，都已分别成立了共产党的政权。铁托则毋需帮助，就在南斯拉夫成立了他自己的共产党政府。战前法国和东欧结成同盟的体制，那种维持封锁线的概念，现在已被颠倒了过来。战前，它是针对俄国的。现在斯大林已使东欧来保护苏联。

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地区，是由红军在1945年解放的。贝奈斯于同年3月到达莫斯科，他的伦敦政府和在莫斯科的捷共领导达成了协议。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似乎克服了那种使流亡的波兰人感到很不安的困难。1945年5月，贝奈斯总统带着他的联合阵线的政府来到了布拉格。

共产党在新的国家中充当了主角。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到布拉格时是个副总理，于1946年2月便当上了总理。三个月之后，他的政党在竞选中获胜，虽然还没有得到绝对多数。它控制着分布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的一个最大的和最有效的组织。在所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它和其他政党都达成了协议。尚待解决的只是一些次要的问题。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施政纲领，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1948年2月，共产党成功地掌握了国家的绝对权力。关于它为什么要采取那个步骤，历来就有很多的解释。捷克的共产党理论家喜欢这样解释：由于冷战开始阶段，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和国内阶级斗争的激化，因而

斯大林要堵塞他在东欧防线中的漏洞。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非共产党的政客非常无能，而贝奈斯总统又患了病。也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共产党人手头没有其他的模式，就模仿了苏联一党制的先例，试图重演1917年以及其后在俄国形成的局面。

不论是什么原因，总之，哥特瓦尔德奠定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一个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基础。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它发展了它的官方历史和神话。姑且不说它对哈布斯堡帝国的态度——民族主义者的"各民族的监狱"的说法，极易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可挽救的封建残余的说法——它同在两次大战之间所流行的有关捷克斯洛伐克近代史的观点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正如战前著作家曾经试图抹去哈布斯堡的历史一样，共产党试图从他们的人民历史中抹去主张自由主义的第一共和国。

"没有俄国的十月革命，就不会有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家放出的第一枪，就是这样说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今天所以有他们的国家，全靠列宁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而不是靠马萨里克和西方盟国。马萨里克和贝奈斯早已背叛了人民，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或"法西斯分子的走狗"。1953年，布拉格公开出版了一个题为《关于T.G.马萨里克反社会和反民族的政策的文件》的汇编文集。第一共和国受到谴责，因为它是由资产阶级统治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们把它说成是一种新型的奴役——工人的监狱，1938年以后它又轻易地堕落为法西斯主义。据认为

贝奈斯的无视苏联的外交政策，直接导致了慕尼黑事件；而1945年共和国的解放仅仅靠的是斯大林和红军。

现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历史学家们，终于开始把哈布斯堡的往事看成是一个可供客观地研究的内容丰富的主题。马萨里克和贝奈斯都重新以本来的面貌出现了。历史学家们不再集中注意马萨里克在盟国干涉俄国时所起的有争议的作用，现在转而谈论他作为一个民主领袖的素质问题了。他们指出，和苏联结盟的政策，毕竟还是贝奈斯首先提出的。但是，捷克人对贝奈斯于1938年9月执行的政策提出责问，当时他的政府已接受了慕尼黑协议。他们问，战争使三十七万五千个捷克人和斯洛伐克遭到死亡，那么如此小心谨慎的理由是什么呢？群众对于西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些富于戏剧性的战役和间谍事件，具有强烈的兴趣。1944年斯洛伐克民族的起义，已成为最近引起争论的一个主题，开始受到它应得的注意。

但是，现代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中，1948年2月的问题仍然是最突出的。它已成为现代史长河中的一个黑水潭，既神秘而又令人寒冷刺骨。冷战无助于它的解决。研究共产主义的学者和移居西方的捷克政治活动家们，虽然对战后共产党的成功，曾经陷于那种流行的、有点吃惊的困惑之中，但他们终于形成了自己对1948年2月问题的看法。他们认为，这是以苏联的力量和经验为后盾的，冷静地策划和无情地执行共产主义"渗透"过程的结果。很少考虑过这样的事实，即自1921年以来，共产党

一直是这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同时，它在1948年可能是做过头了。

很多捷克共产党人现在感到，1948年2月后发展新党员太滥，这就削弱了党并改变了党的性质，可能因此而促进了清洗。凭借新近所获得的权力，党就把重任肩负起来。具有最大讽刺意味的是，对付“战败的中产阶级敌人”的措施，就是把成千上万的人送进工厂、矿山和其他正当的、但是并非这些人习惯的工作岗位上去。工人阶级——政府以他们的名义进行绝对统治——的组成，也就发生了变化。

斯大林主义对历史的看法，具有深远的实际含义。塑像已从各公园里消失了；教室里的政治家照片（这些照片是在1918年时代替传统的耶稣受难像的）换掉了；街道和火车站的名称被修改了。在西线作战过的退伍军人则受到虐待，有时甚至竟被处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巨大伤亡，是这个国家为继续存在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在五十年代的政治迫害中，却有七万多人被卷入。这是由他们自己的统治者硬加给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一种惩罚。没有什么直接的外国敌人可供谴责，这在多少世纪以来还是第一次。这就是为什么对往事的追究具有一种责罚的性质。

在这一点上，政治与往事会合，就形成了一种爆炸性的混合物。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弄清楚那些统治者为什么要这样做。然而法官、秘密警察和党的责任问题，以及遭到政治迫害的受难者的恢复名誉问题，却已跨过了历史

与政治之间的这条小小的分界线。并非所有从前的罪犯和他们的审讯者，全都有共进午餐的习惯。

对扬·马萨里克和他的死的那种强烈的、凄惨的回忆，提供了往事和当前政治之间的必然联系。1968年4月初，有人向最高司法当局提出，必须追查扬·马萨里克的死因，以此来证明新的统治者对恢复名誉是真心诚意的(《学生》，1968年4月3日)。成立了特别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同时进行它自己的调查；各报对此也有着极大的兴趣。对这个案件的判决尚待分晓。

1948年2月，扬·马萨里克在哥特瓦尔德的新内阁中留任外交部长。3月10日清晨，外交部的锅炉工人发现马萨里克死在部长公寓的浴室窗下。捷克人象在1937年夏天哀悼扬·马萨里克的父亲那样来哀悼他。

人们对1948年3月之死所以特别感到凄惨，也许因为它是紧接在一个很有希望的时期之后发生的，因为它使一个未完成的抱负结束了。马萨里克的名字，现在不仅是独立的象征，而且也是历史连贯性的象征。马萨里克本人在欧洲的所有首都和美国都能应付自如。他一点儿都没有偏狭的乡土观念，而是为人宽容，富于自信，举止彬彬有礼。所有这些素质，都是他的同胞们有目共睹的。自从民族复兴以来，捷克斯洛伐克的传统主要就是下层中产阶级的传统，这种传统就是由努力工作，艰苦磨炼和习以为常的悲观情绪所养成的。扬·马萨里克则在他们的生活和政治中引进了一点有色彩的东西。人们知道在马萨里克身上兼备的那些素质是特殊的、也许是不

协调的，和一般人平常的素质是不同的。

到1948年隆冬时，人们很容易相信象马萨里克这样的人是不得已才离开他们的。马上，谣言传开了，说是在深更半夜里从外交部抬出了几具棺木。在马萨里克的遗体供人凭吊时，人们注意到在他头旁有一小束雪花。① 他是从窗口摔下来的，还是有如捷克历史上被抛出窗外的，这个问题引起了评论。这个事件在过去二十年中从来没有被完全忘记过。

1965年在西德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杂志上，重新提出了暗杀的说法，好象结论已定似的（《明镜》周刊，1965年4月7日）。在布拉格，这篇文章就被用来支持人们所提出的正式调查马萨里克之死因的这种要求（《学生》，1968年4月3日）。当时，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弗兰齐歇克·布尔科维克博士和警方医生雅罗米尔·捷普雷博士，就是在尸体发现后不久来到马萨里克在外交部里的公寓房间的。这篇文章进一步宣称，卧室里很混乱，浴室里有碎玻璃和脏东西，并在尸体上发现有“反映致命的恐惧的生理迹象”。在同年的晚些时候，布尔科维克被指控犯谋反罪，未经审讯就被处决了。浴室的窗子虽然比较小，却比卧室的窗子高一倍。这篇文章的作者问道，为什么会选定公寓中最不容易爬出去的窗子去自杀呢？另一个警方医生维立鲍尔德·霍夫曼，则在烟灰缸里发现了许多不同牌子的烟头。此外还不准马萨里克的私人医生奥斯卡·克林格博士去看尸体。他在马萨里克去世前两天，

① 一种球根草花，在残冬或初春开小白花。——译者注

即3月8日，曾经替他检查过身体，发现他的健康情况很好。附有尸体解剖报告的那个文件，是伪造的。在上面签字的哈耶克教授见过尸体，不过只是在三码以外看到的。马萨里克遗体供人瞻仰时头旁有一小束雪花的照片，就在举行葬礼那天已被收回。作者说策划谋杀马萨里克是“弗兰茨·什拉姆”少校，他是国家安全部负责与俄国内务人民委员部联系的连络官。1948年夏天，什拉姆本人也被暗杀了。3月9日夜间值班的外交部警卫员，是瓦茨拉夫·塞德姆。他说因为牙痛，就在当夜离开了警卫室。塞德姆是一个关键性的证人，先是对他的服务大为奖励，后来却在1948年6月的一次撞车事件中丧命。布尔科维克不顾内务部的命令，竟对马萨里克之死私自进行调查，发现什拉姆少校和塞德姆之间有联系。

1965年4月《明镜》周刊的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把谋杀说法讲得最透彻的一篇，但是也包含着一些严重的错误和矛盾。(它的作者笔名迈克尔·兰德，就是本努·韦格尔。他对另一个说法也负有责任，这个说法伪称是根据过硬的材料撰写的，涉及到苏联间谍乔治·布莱克逃出伦敦监狱到达布拉格所经过的路线。)事实上，布拉格刑事小组的负责人布尔科维克博士，在1948年3月10日清晨看过马萨里克死亡的现场。可他只是匆匆一瞥而已。他至今还活着，他的兄弟则在1948年被处决。马萨里克之死的调查事宜，就由内务部的保安人员接过来了。浴室里没有发现碎玻璃，浴室的窗子和卧室的窗子一般高。什拉姆少校的名字不是弗兰茨而是奥古斯廷，他也

不是保安官员，而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工作人员。哈耶克教授通过正常的手续验了尸。外交部从来也没有过名叫瓦茨拉夫。塞德姆的警卫人员。

但是，最近谋杀论出现了一些新的证据。它是3月9日夜间外交部值班职员帕维尔·斯特拉卡提供的。(《青年阵线报》，1968年4月7日。)当时所有的电话线(除一条以外)都接到他的办公室；在前捷尔宁宫的这座大厦中，除了他之外在值班的，只有一个看门人，一个警察和一个工友。斯特拉卡说，大约在半夜十一点钟时，他听到有几辆车在大厦门口停下来。门厅里有闹声，他的全部电话线一下子都中断了，他的房间从外面被反锁上。大约在一刻钟之后，嘈杂的声音停止了，然后大约在凌晨二时光景却又响了起来。那时，电话已接上了，门上的锁打开了，汽车开走了。也许在清晨四时，斯特拉卡走出房间；惊恐万状的看门人请求斯特拉卡到院子里去。那儿有一具尸体，面部朝下，根本没有血迹，三楼房间的窗子都是关着的。斯特拉卡在六时离开外交部，没有提出报告。但他却打过电话给卡雷尔·恰彼克的寡妇——女演员奥尔加·沙因普夫卢戈娃，告诉她别信自杀的那种说法。

从1968年4月到6月底没有发现更有力的证据，以便支持确系谋杀的这种看法。斯特拉卡本人于1949年已被外交部开除，后来被判处十五年徒刑。他已在1960年获释，现在斯洛伐克一家啤酒厂工作。奥尔加·沙因普夫卢戈娃是最近证实有过电话对话的人，她记忆中的

斯特拉卡是“有点儿哀伤感”，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业余演员。他所叙述的事实的真相，在布拉格是受到怀疑的。

自杀论一边的证据，虽然同样来自间接方面，却比较更有份量。且不说验尸的结果，证据主要来自三个人：前社会民主党副书记约瑟夫·诺沃提尼（《劳动报》，1968年4月11日）；马萨里克的私人秘书、现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的卢密尔·苏库普博士（《观察家报》，1968年4月29日；《泰晤士报》，1968年4月30日；《苏格兰人报》，1968年5月13日）和外交部秘书、最近在美国去世的海德里希博士（《泰晤士报》，1968年3月12日）。他们一致认为，马萨里克在去世之前情绪低落，并曾经说过要自杀的话。但是，对于马萨里克自杀的动机，他们却没有一致的意见。约瑟夫·诺沃提尼先生说，扬·马萨里克曾答应父亲他永远支持贝奈斯。1948年3月9日，他驶车去探望贝奈斯总统，要求解除这个约定。两人发生了争论；总统拒绝了马萨里克的请求。这时，贝奈斯已转到反共的立场，正犹豫不定是否要辞去总统的职务。按照诺沃提尼先生的说法，马萨里克同哥特瓦尔德一直相处得很好，并认为自己有责任，留在政府任职。

苏库普博士最近批评了那种要贝奈斯为马萨里克之死负责的企图。（承蒙苏库普博士在和本作者的私人通信中总结了他的观点。）他证实了以下事实，即老马萨里克在遗嘱中曾要求他的儿子继续忠于贝奈斯，而在1948年2月共产党掌权后两人确实有过意见不合。苏库普博士和他的旧同事海德里希博士都认为，马萨里克的自杀

是他“最后的、最高的行动”，正是他表示不赞同共产党领导人的权力狂的一种形式。

1948年3月9日深夜，马萨里克和贝奈斯会晤后归来。次日早晨，在他的床头桌上发现家用圣经是翻开着的。肯尼迪总统之死发生在大白天，为成千上万人所目睹，还有数百万人在电视上看到。且不谈涉及阴谋的大问题，那一天在达拉斯①的基本事实，仍然是人们争论的所在。扬·马萨里克死在夜里，当时在那座巨大而古老的王宫里总共只有四个人，而发生的时间距今已有二十年之久。科特拉尔博士的委员会调查马萨里克之死的任务，比之沃伦委员会②的任务更为困难。如果它证明自杀论，那么，布拉格的这个委员会对于马萨里克死的动机和意义是提供不出任何线索的。

政府表示它对恢复名誉问题有诚意，虽然极大多数的前政治犯仍然在等待着。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已习惯于失望：无论如何，这并不是恢复名誉的第一次尝试。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就是以使他们受审和被判决的“K 231”号法命名的。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都可以入会。在政治迫害上，没有党员和非党员的区别。1950年、1952年和1954年的几次大审判，仅仅是它的象征性的和可见的表现而已。

1950年5月31日，在布拉格开始了对一批十三个人的审判。他们都不是共产党人，他们被指控与1948年

① 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大城市，肯尼迪遇刺的地点。——译者注
② 美国调查肯尼迪之死的委员会。——译者注

2月以后逃出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活动家有联系。四个被告被判处死刑,其中有一个妇女米拉特·霍拉科娃,她是国家社会党的议员。接着在1952年11月进行了最大的一次审判。以鲁道夫·斯兰斯基为首的"叛国阴谋集团"一伙都是共产党人,他们被说成是"托洛茨基—铁托分子,主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叛徒,共和国和社会主义的敌人"。除了党的总书记(那时哥特瓦尔德的党主席的职务和斯兰斯基的职务还没有合并成为"第一书记")斯兰斯基而外,这个所谓阴谋集团的首要分子之中,就有弗拉多·克利门蒂斯,他于1950年3月被免去了外交部长之职。被断定为阴谋集团的首要分子中,有十一人被处以死刑。他们都是犹太人。最后,在1954年4月21日到24日之间,古斯塔夫·胡萨克,拉科·诺沃麦斯基和其他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则在布拉迪斯拉发受到了审判。四年以前,他们就遇到了麻烦,那时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他们被指控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这次审判中提到的罪名是相同的,包括他们同克利门蒂斯和斯兰斯基保持接触的问题。胡萨克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的人则被处以期限不同的徒刑。

所有这些审判,罪名错综复杂,被告的口供都是伪造的。这些人的被处死,是披着法律外衣的凶杀事件。它们发生在"个人崇拜"的高潮时期,在对党内提出了告诫之后。这个告诫指出,党的主要任务是"在我们的队伍中加强革命警惕,揭发和根绝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不管他们隐藏在哪里"。(拉吉斯拉

夫·柯勃里伐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950 年 2 月 24—25 日。）这些话同莫斯科所讲的类似的话遥相呼应。这就是斯大林对战时同盟的最终瓦解和美国的原子弹垄断所作出的反应，当时他反对那些相信能够走自己道路的某些东欧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铁托。

这些审判影响着当时的政治形势，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它们既是一种证明国内外紧张形势确实存在的方法，同时又助长了紧张形势的加剧。它们向一般党员和其他头脑简单的公民指明，什么才是不正确的政治态度。它们已为经济危机或采取严格的政治措施提供解释。它们解决了党的最高一级的夺权斗争。

1949 年，正当〔匈牙利〕在准备审判拉伊克·拉斯洛的时候，匈牙利党的领导人拉科西·马加斯给了哥特瓦尔德一张名单，里面大约有六十个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高级共产党人。那是在审查拉伊克和帝国主义在布达佩斯的间谍中心时，显然牵连到了他们的名字。名单上的大多数共产党人，战时曾流亡英国；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在西班牙内战时参加过国际纵队。哥特瓦尔德起初对这个名单表示很怀疑，他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党〔在战前〕一直是合法的，因此不会混进很多敌特分子。

大约就在同时，即 1949 年夏天，成立了以拉吉斯拉夫·柯勃里伐为主席的所谓“混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系由党的高级干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官员共同组成。接着立即掀起了第一个大逮捕的浪潮。首批受难者中，即有外贸部副部长龙金·洛布尔，国家旅行社主任古斯塔

夫·帕夫利克，党报编辑威廉·诺维。1949年秋，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国家安全机关，审查共产党内的“敌特组织”；1950年2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竟批准了成立国家安全部的建议。柯勃里伐是它的首任部长；到1952年1月换上了卡罗尔·巴契列克。但是，身为党的主席团委员的巴契列克，对国家安全部不太感兴趣。专家们——贝利亚的莫斯科国家安全部成员——的意见，倒是可以得到的。这些人却被他们的捷克同事恰当地称之为“老师”。

奥托·斯林系布尔诺区第一书记，已于1950年10月被捕。他的朋友马丽亚·斯维尔莫娃(她的丈夫曾是党的一位领袖，已于斯洛伐克起义中牺牲)也受到了党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讯。她否认有任何阴谋的意图或行动，也不承认有参与谋害丈夫的活动，但承认了在她的政治工作和私生活中有过某些错误。她被开除出党，并遭到逮捕。

在逮捕了斯林、审讯了斯维尔莫娃以后，保安机关看来对下一步该怎么干不免有些犹豫不决。斯维尔莫娃根本没有屈服；斯林原任的职务虽然重要，但是远离布拉格。到1951年夏天，事情又开始动起来了。国家安全部觉得满有把握构成一个控告党的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的案子。起初，哥特瓦尔德显然对国家安全部的这个建议表示抵制。但在1951年9月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他批评了斯兰斯基在“任命高级干部”方面的严重错误(例如，斯兰斯基是任命捷克斯洛伐克高级外交官员的五人特别委员会的成员)。总书记失去了他的党内职务，

转而担任副总理之职。

鲁道夫·斯兰斯基的政府职务，仅仅保持了几个星期。1951年11月，国家安全部通知哥特瓦尔德，说斯兰斯基正在准备逃往西方，要求逮捕他。斯大林也要求哥特瓦尔德把斯兰斯基拘留起来。因此，斯兰斯基于11月24日被捕，受审判则在一年之后。1952年12月3日，斯兰斯基遭到处决，并把他的骨灰从卡车里撒在布拉格以西某处的公路上。

无论政治错误，疏于职守也好，或则他们的私生活也好，一切都被用来反对被告。那些罪状被歪曲成刑事性质的样子，并与“西方帝国主义者”联系起来。贝利亚的专家们的主要任务，看来就是对被告的选择进行监督。这些被告都是与国外有联系的，或是在国外呆过一段时期的（大部分是在战时）。其中很多是犹太人。这些审判可同其他东欧国家类似的措施联系起来，因此这些阴谋的国际性或“犹太复国主义”性质便成立了。斯大林继承了戈培尔的衣钵。

然而，斯大林和贝利亚都没有对那些政治审判承担全部责任。尽管这些政治审判具有国际意义，但在索非亚，或在布达佩斯，或在布拉格，主要还是当地党的领导深深卷入的一些国内事件。在布拉格，哥特瓦尔德不断从他的保安人员那里接到“阴谋”的证据，这使他很发愁，时常不能或不愿对此采取行动。他已是个年老多病的人，可现在被迫扮演的角色，却是对他毕生事业的嘲弄。他既受到来自斯大林的强大压力，还受到他自己同志们

的更大的压力。在强烈要求他控告斯兰斯基的人当中，就有安托宁·诺沃提尼。在斯兰斯基离开主席团的当天，诺沃提尼就成了党的主席团委员。诺沃提尼认为，斯兰斯基太冷酷、太超然，野心勃勃，很不适合担任党的高级职务。但是，在清洗的准备工作中扮演最可鄙角色的，却是拉吉斯拉夫·柯勃里伐和国防部长、哥特瓦尔德的女婿阿列克谢·切皮茨卡。他们两人后来都被开除出党。

党陷入国家官僚机构的事务，有意混淆职能，以及个人责任感的削弱等情况，就是炮制这些审判案件的背景。各级党员都习惯于互相指责，党的工作人员的“个人档案”建立了，开始一点一滴地收集各人的材料，包括无事闲谈和造谣诽谤在内。随后把那些档案送到国家安全部。党的领导人和保安官员共同拟定可能的嫌疑犯的名单，然后把名单交给负责对他们立案审讯的官员。

他们使用了二十世纪的各种审讯办法。布拉格附近的鲁津监狱和科罗德耶城堡，是国家安全部的两个主要中心。它们有全部必需的设备：小得无法躺下的透亮的囚室；有暗门的审讯室，把一个房间的地毯图案复制在另一个房间的墙上，同样的，这个房间的墙上也复制着另一个房间的地毯图案；监狱医生用药品逼取口供，或对受害人灌输口供。让人昏迷不醒，不知时间和方向，室内温度剧变，一会儿挨饿和一会儿吃饱，都被用来粉碎罪犯的反抗。审问时还采用了“传送带”的方式。此外还使用了种种施加心理压力的极端手段：对罪犯家属的威胁；并引诱招供了就可减刑；在公审的案子中，出庭时表现好

就可减刑。当国家安全部感到业务上压力太大的时候，就开始采用粗糙、低级的工具和手段。铁棒，潮湿的地牢，摩托车驾驶员用硬纸做的（不是用玻璃做的）护目镜，甚至布拉格郊外的周末游憩用的小别墅，都派上了用场。

斯洛伐克党的一个领导人描述他的经历如下：

> "我被带到了布拉格附近某个城堡里。我带着手铐和被蒙上了眼睛，多年来经常如此。城堡的楼上有保安官员；楼下的地下室，原来存放土豆的仓库，是没有暖气的临时牢房。那时是寒冷的二月天气。外面的卫兵穿上了毛皮的靴子和大衣，戴上了毛皮帽子，仍然冻得发抖。可我还穿着夏天的衣服。审讯室里倒是很热的，审讯员只穿衬衫，却给我披上大衣，叫我全身直流汗。从热得难受的楼上，直接回到了寒冷透顶的楼下。不管白天还是夜里，一次又一次地总是这样。三个官员昼夜不停地轮流担任审讯，用上了侮辱、殴打、威胁等整套经过精心设计的折磨人的方法。党送你到这里，党早已对你作出决定。错误、缺点、偏差、叛逆、破坏！统统招呀招出来！这就是党的命令。不惜任何代价，招认和签字……。"

有一个高级共产党人在口供上签字时，不得不由审问者扶住了他的手。

犯人的口供和专家的意见（例如，关于被告损害国家经济的方式）则由国家安全部转送给党的领导。对于少数几个公开审判的案件来说，还需要做的就是给被告吃好东西，照太阳灯，指定法官和检察员，并把日期确定下来。第一个被指定对斯兰斯基起诉的检察员，他竟然拒绝承接这个案件，却到一家工厂去工作了。而在一个小

城市负责起诉工作的约瑟夫·乌尔伐列克博士，他却乐于被邀请到布拉格来。卡罗尔·巴契列克亲自向他保证，这是他的莫大荣誉，负责审查的是国家安全部最有才干的人，还有苏联专家的帮助，并且党和哥特瓦尔德本人将亲自监督这次审判。（《红色权利报》，1968年4月14日。）

那些被告在国家安全部和以后在法庭上的口供，都被当作主要的罪证。也许有少数人象阿瑟·凯斯特勒的《月亮的阴暗面》一书中鲁巴肖夫一样，感到自己是在为党尽最后的义务。而别人看来是在经受了几个月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之后，盼望着早日结束这个莫明其妙的闹剧，然后服一个时间不长的刑期。在筹备那些审判工作的人当中，就有党的真正的仆从。其中有一个人后来见到较为年青的同志对他表示忘恩负义，不禁大为震惊。"我深信这样做是为了党的神圣利益。他们要我干这件事，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一切服从党的。甚至他们对我说，把你的头搁在这里的断头台上，把它砍下来，说这是为了党的利益嘛，那我也会乖乖地把我的头搁在断头台上的。……"（《文学报》，1968年3月28日。）这些理想主义者就这样和追求名利者结合起来了。

1952年11月宣布判决时，著名的音乐评论家、斯美塔那和马萨里克传记的作者、科学院院长兹德尼克·尼耶德列说："揭露了斯兰斯基叛国事件以后，我们应该对党的坚定和不可战胜感到崇敬。资本主义世界所能做的一切坏事，都被用来反对它。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被击

溃了，而党又一次胜利了。”（《对叛国阴谋集团的审判》，布拉格，1953年。）清洗后幸存的老党员发表了演说；年青的党员则写了诗，歌颂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人民是怀疑和激动的。审判产生了一种群众性的精神变态，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回顾起来，这种情况似乎是不可理解和可耻的。排犹主义的浪潮席卷了这个在中欧各民族中过去最不排犹的民族；他们眼看着他们的统治者们（或者至少是其中有一些人）倒台，不禁感到满意。

1956年以来，安托宁·诺沃提尼和他的同事们面临着恢复名誉的问题。诺沃提尼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促进了他的倒台。以鲁道夫·巴拉克为首的第一个委员会，于1957年提出了它的报告。但是这时诺沃提尼和党还没有准备好。这个报告的内容部分是根据诺沃提尼的指示写的，后来却又受到他的批评。它被说成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到1961年为止，即巴拉克还在内政部长任内期间，大批政治犯获释。1962年指定了另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处理同样的待办事项。这个委员会在布拉格的前女修道院中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研究政治起诉的文件。它的调查结果没有得到诺沃提尼的重视。党主席团的一个委员把上述调查结果看成是一种“挑衅”；亨德利赫认为上述调查走得太远了。后来书记处起草了另一个报告，由诺沃提尼于1963年4月3日向中央委员会宣读。虽然语气大为冲淡，它仍然是一个破坏性的文件。

1963年，布拉格最高法院撤销了对斯兰斯基的原来判决，但是没有恢复他的党籍。诺沃提尼认为，斯兰斯基

犯下了这样多的错误，他应该继续被摈在党外；另外一个被处决的党员也没有恢复党籍，因为他的行为“象冒险家，利欲熏心分子，独裁者，并且过着不道德的生活”。如此的恢复名誉，不仅对还活着的人是可耻的，而且在党内还会造成混乱；在计算财产损失或收入的补偿时，也存在同样的吝啬味道。

一般的印象是，恢复名誉不是光明正大地进行的；也听到少数人说，它应当包括非共产党人在内。普遍和公开的恢复名誉的原则，现在已经被接受了。它触及到很多捷克和斯洛伐克人神经特别敏感的私生活。

第九章　1968年夏天的危机

1968年5月的某个时候，布拉格政府同意不久之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上举行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演习。整个7月里，运输坦克的车辆、披着伪装的通讯部队车辆，以及所有显著表明有一支军队在行动的装备，正和仲夏度假的游客车辆在公路上交织在一起。反对捷克改革试验的宣传运动，加深了俄国、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东德的部队延期驻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含义。

捷克人没有被吓倒。1968年6月中旬，有一批科学家要求卢德维克·瓦丘利克起草一个关于改革运动的经过和展望的宣言。6月底，这个以《两千字》为题的宣言发表了（《文学日报》，1968年6月27日），它是迄今为止论述民主社会主义的一篇最尖锐的声明。瓦丘利克写道：

> "改革运动没有给我们带来很新的东西。它带来的很多是比我们的社会主义所犯的错误还要老的思想和论题，而另一些东西则发源于一些看不见的事态发展，是老早就应该宣布的，但是却受到了压制。我们不应幻想这些思想是因为包含真理才得到传播的。旧领导的软弱无能，却是这些思想能够占上风的决定性因素，在经过了二十年没有受到任何人反对的统治之后，这个领导显然必定是疲蹋不堪了。那个制度的基础和意识形态中所包含的全部缺点，显然已经完全熟透了。因此，让我们不要过高地估计作家

们和学生们所提出的批评的重要意义。经济是社会变革的根源。恰当的词汇只有在适当的情况下才能表达它的重要意义。不幸地，我国的情况是普遍的贫困和旧的统治制度的彻底崩溃；我们听任某一类政客轻易地牺牲我们的利益，作出不讲原则的事情。因此并不是真理压倒一切，而是别的东西都已耗尽，剩下的就只有真理了。没有举国欢庆的理由，只能说有了一线新的希望。

我们在这个具有希望的、虽然也是一直受到威胁的时刻向你们致词。我们有些人经过了几个月才懂得现在让我们讲话了，而我们有很多人至今仍然对此表示怀疑。但是我们既然已经讲话了，既然已经公开站出来了，我们唯有完成我们要使这个政权变得通情达理的意图才行。否则，保守派的报复将是残酷的。我们向那些还在等待的人作出呼吁。眼前的这段时期对未来的很多年将是决定性的。

即将到来的就是有节日和假期的夏天，按照旧习惯，我们将会把一切事情都停下来。但是我们可以打赌，我们亲爱的反对派可不会去消夏的，他们会把自己的人动员起来，他们要在现在为自己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作好准备。因此，让我们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让我们了解并对这些发展作出反应。让我们放弃那种不可能达到的要求，即要求某个高高在上的人，应该经常往下传达唯一的正确解释和唯一的简单结论。每个人将不得不作出自己的结论，并对自己负责。只有通过讨论才能得出一致的意见，为此，言论自由是必需的，它的确就是今年我们在民主方面的唯一成就。

在即将来临的日子里，我们必须采取主动，作出自己的决定。

首先，我们将反对已经发表过的这种观点，说可能在没

有共产党人、甚或在反对共产党人的情况下恢复某种民主。这是既不公正，也不合乎情理的。共产党人有他们的组织，必须支持他们中间进步的一翼。他们有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而且毕竟各种开关和杠杆仍被他们所控制。但是，他们的行动纲领已公之于众，它是第一次使最大的不公平变得公平一些的纲领，别人也没有另拟一个同样具体的纲领。必须要求每个县、每个乡都把各自的行动纲领公之于众。极平常的、盼望已久的、正确的行动，就会突然地出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正在筹备它的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将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让我们要求它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更好些。如果共产党现在说它希望在将来要依赖于公民对它的信心而不是使用暴力，那就让我们尽可能信任它，正如我们将信任它目前委派的出席州县会议的那些代表一样。

最近，人民在担心民主化的过程是否停止了。这种感觉部分是由于在激动人心的事件发生之后人们产生了厌烦情绪的结果，部分却是正确的。意想不到的透露真相，高级官员的辞职，不寻常的、大胆的语言，这样的时期早已过去了。但是各种力量的冲突，仅仅是隐蔽一些而已，法律的内容和形式问题仍在争论之中，实际措施的范围问题也是这样。除此而外，必须给新的人物，包括部长、议员、主席和秘书们以工作的时间。他们有得到那种时间的权利，以便经受检验或者否定自己。……

我们将来的民主的实际质量，全在于工厂的命运如何和工厂内部会发生些什么。尽管我们讨论了这么多，经理们还是可以要挟我们的。因此必须找到一些好的经理，并且支持他们。的确，和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工资普遍很低，有些人甚至低得够呛。我们可以要求更多的钱，它是可

以印出来的，但它也会贬值的。所以还是让我们请经理们和主席们向我们解释一下：他们想生产什么，成本多少，他们打算卖给谁，价格如何，可以获得多少利润，利润之中有多少将用于生产的现代化方面，多少可供分配。我们从看来呆板的报纸标题下面，可以发现民主和为孩子们找工作的人之间存在着剧烈斗争的迹象。工人们和经理们可以通过选举工厂领导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成员对这个斗争施加影响，雇员们最好能选出他们天然的领袖来做他们的工会代表，就是要选那些有能力和廉洁的人，且不管他们是不是党员。

如果目前对中央的政治机器不能有更多的期望，那就必须在各县、镇取得更大的成就。让我们要求那些滥用权力、损坏公共财产、行为不老实或残暴的人辞职。必须找到迫使他们辞职的办法。例如：公开批评，通过决议，游行示威，组织示威的工作队，为他们的退休金筹募捐款，罢工，抵制他们上班办公，等等。但是，我们必须拒绝采用不合法的、无礼的、粗暴的方法，因为有人会利用这些去影响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最近，外国干预我们国内形势的可能性，引起了极大的不安。面对着优势的力量，我们只能有礼貌地保持坚定态度，而且不去触犯别人。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政府知道，只要它遵照我们的委托办事，我们将支持它，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来；我们也可以向我们的盟国保证，我们将履行我们的同盟、友好和贸易条约。不断地挑剔和没有根据的怀疑，只能使我们政府的处境更加困难，对我们也没有好处。只有国内情况改善了，我们才能确立以平等为基础的对外关系，即我们应该把复兴的过程推进到有朝一日我们将推选出那样

一些政治家，由于他们将是一些勇敢、廉洁和干练的人，所以能够建立和保持上述对外关系。无论如何，世界上所有小国政府都有这个问题。

与战后一样，今年春天我们又有了一个巨大的机会。我们又有可能控制我们这个在名义上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使它的形态更符合于我们从前的声誉，更符合于我们原来对自己相当满意的情况。刚刚结束的春天是一去不复返了。要到冬天，我们才会明白一切。

就此结束我们这个给工人、农民、官员、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其他一切人的宣言。它是在科学家的倡议下写成的。"

宣言是在华沙条约组织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演习开始后才几天发表的。虽然中央委员会谴责了这个宣言，保守势力也有重新活动的迹象，人民对宣言的反应证明了支持杜布切克先生和改革运动的基础是很广泛的。与此同时，俄国、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东德的领导人，于1968年7月14日到15日在华沙开会时所写的联名信，已经到达布拉格。这封联名信谴责了改革派的工作和纲领，把捷克斯洛伐克目前的局势描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并告诉他们说，这已经不再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而是华沙条约国家共同关心的事情。1968年7月18日（星期四），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在电视上露面，要求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支持他。同一天，布拉格对它的盟国来信作出了答复。在坚定而有礼貌的回信中，党的主席团就捷克斯洛伐克的立场作了解释，并没有向压力屈服。

在这个月的下半月里，对布拉格的压力增加了。保加利亚党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正在与日俱增”，“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几个中心”正在迫使事态朝着“修正主义和复辟”的方向发展。(《工人事业报》，1968年7月30日。)布达佩斯各报刊所发表的文章，都是充满着有经验的、严肃而带有警告的语调。十二年前，匈牙利毕竟发生过同样的事态。有一家匈牙利报纸(《人民之声报》，1968年7月30日)评论道：“我们的历史经验证明，在我们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各种敌对势力必将卷入并利用每一个对他们有利的机会。”

华沙信件之后，捷克人与俄国人之间的对抗已是不可避免。这次对抗从1968年7月29日（星期一）开始，持续了四天光景。这是两个国家的统治者之间最奇怪的一次会面，谈判进行得很艰巨，时间要比任何人预料都要长。会面的地点是蒂萨河畔斯洛伐克边境小镇切尔纳某电影院。第一天的谈判在当晚十点半结束后，俄国人回到边界的对面去过夜。杜布切克先生无法入睡，半夜以后还在切尔纳街上蹓跶，并同一群铁路工人闲谈。

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团，各自都带来了仔细准备好的声明，以及很难和解的态度。谈判一开始，俄国人就指控捷克人背叛了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甚至是在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效劳。从年初起他们就在收集反对布拉格新领导的证据，在切尔纳他们抛出了摘自各冷门期刊的一段段文章，证明捷克人对国内的写作已经失去了控制。当捷克领导人对苏联人说，他们从未见过这些引文，

而且不管怎样，他们的试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让地方的编辑可以自行其是；对此，苏联人并不表示满意。关于新闻自由的辩论，对双方来说都是关系重大的，并且引伸出了其他问题。从俄国人的观点来看，对新闻界已无力控制，或不愿加以控制，这就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对捷克和斯洛伐克政治的指挥能力已开始走下坡路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虽然至今仍在保证捷克斯洛伐克遵守华沙条约和经互会章程，但由于放弃了它的"领导地位"，正在危及苏联在东欧的经济和军事体制。

捷克人不同意这个推论，因为他们并不希望有这么大的分裂：他们的目的是比较有限的，而一个更富于"人情味"的社会主义前景，已使他们的决心得到了加强。两种不同的立场很难调和。会谈一度破裂，勃列日涅夫先生回到他的专用列车休息去了。只是在杜布切克先生迫切的、坚定的和委婉的请求之后，会谈这才重新恢复。8月1日发表了简单的联合公报，邀请所有的盟国两天之后到布拉迪斯拉发参加会议。杜布切克先生回到布拉格之后，对记者们说他带来了好消息，每个人都可以安心睡觉了。当晚约有五千人在"老市镇广场"集会。斯姆尔科夫斯基先生为了使这些人安心，没有谈任何具体的事情。那一周的《文学日报》，则发表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头戴雅各宾① 帽的女人，在布拉格机场欢迎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政治家们，她说道，"你和你们的朋友们，你们可从没

① 雅各宾，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译者注

有跟家里通过电话啊。”

1968 年 8 月 3 日晚上，六个华沙条约国的首脑在布拉迪斯拉发城堡的明镜大厅里集会，签订了一个内容含糊的文件，其中有一个要点完全和华沙信件的精神背道而驰。在布拉迪斯拉发，政治家们保证在“平等、自主、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没有提到各社会主义国家有干涉他们盟国内政的责任。

乍一看，危机似乎已经解决了。捷克人觉得他们赢得了重大的让步。布拉格市民产生了一种可以舒舒服服地消夏的感觉，很多人离城度暑假去了，包括副总理奥塔·希克教授和外交部长哈耶克博士。驻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的庞大的外国记者队伍，也慢慢地散开了。少数含有警告的声音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切尔纳会谈期间最有见解的警告，也没有引起反应和关注。布拉格《记者报》在 7 月 31 日所发表的一篇题为《沉湎于幻想》的评论中写道：

> “不能小看这次决裂。它在我们嘴里留下了难以去除的坏味道。……我们和各盟国的关系，已经紧张到了非常危险的关头。即使没有经互会的存在，也已经超过了被驱逐出同盟的极限。至少在目前是否有可能恢复正常，平静下来，回到讲理的、友好的交谈，我们到底能不能这样盼望呢？
>
> 得出肯定的答复是不容易的。事实上，我们没有犯过我们被指控的任何罪状，我们没有‘偷偷地’从事任何故意背叛社会主义的活动，我们也没有打算取消与我们盟国的关系和解除我们的义务。然而，我们在这场戏里引进了其

他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能构成宣传路线的一部分，但却是问题的真正关键所在。

我们引进了清算官僚阶级（一个由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引进国际舞台的阶级）的绝对权力的幽灵。客观地说，这是每个国家都要达到的一个历史阶段。但是，即使官僚还没有发展到成为一个阶级的地步，在涉及运用权力的方面，官僚政治仍会表现出它的种种特点。它会采取预防性措施以保卫自己，它将拼命这样做，直至灭亡。

当然，每种制度有它自己的上层组织，它自己的那套官僚政治结构，它或多或少地具有许多消极的、反民主的倾向，同时对一种现代社会组织的生活则作出积极的和必需的贡献。要取消它是不可能的，然而要把这个非经选举产生的技术官僚成分，能否永久有效地附属于经由选举产生的权威，那是很难肯定的。但是，我们正在接近这样一点，可能我们正在朝着打破这个几乎是世袭的阶级的权力垄断这一方向前进，而这个阶级和它在外国的同样阶级却在共同腐化和共同利益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上这些就是我们的罪状。可我们并没有危及社会主义。恰恰相反，我们危及的是官僚政治，而这种官僚政治却正在全世界范围内缓慢而又稳当地干着埋葬社会主义的勾当。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实在很难希望官僚政治给予我们兄弟般的合作和同情。……”

然而，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政治家都不是那样地看待形势的。他们大多数在党的机关中当过政治学徒，他们很了解它的缺点。他们全神贯注地试图消灭那些缺点，他们得到人民的完全支持。他们致力于政治改革事业，因为——他们一再这样说过——没有经济改革，复兴是

不可能的。再说，他们的党若和俄国的党组织相比，则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经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以来，即在有议会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它要争取选票，举行公共集会，发行报纸。战前，它获得的选票从未低于总票数的十分之一；在1946年5月的选举中，它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取得的选票已占40.17%，在斯洛伐克则为30.37%。它已习惯于进行政治竞争。反之，俄国的党组织总是要对付困境。1917年以前，布尔什维克过的是非法的地下工作、监禁和流放的生活；革命以后，他们有大量的、有时是棘手的问题需待解决。他们总是把执行纪律和命令列为最大的美德。捷克斯洛伐克事事仿效苏联，已在二十年之后造成了深刻的民族危机。然后，这个国家的共产党领袖们从早期的经验中汲取了教训。他们在这样做时却忽略了其他的东欧共产党领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对国际局势也还抱着乐观的态度。

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生活在热闹的、常被各方争夺的欧洲的中心十字路口。全世界的军事战略家们，都熟悉他们的山路隘口、他们的铁路交叉点的名称以及他们的重工业和军火工业的商标。多少世纪以来，捷克人和德国人之间总是时而打仗，时而合作；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之间也是这样。然后，在上一世纪里，有些捷克民族复兴运动的领导人物转而把俄国当作获得力量和鼓舞的源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两个亲俄的政党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活动。战争爆发后的头两年，东摩拉维亚的某些地方，即处于沙皇俄国炮兵的射程之内。到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末尾，红军解放了斯洛伐克、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大部分地方。红军受到极为热情的欢迎，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1945年，中欧的力量均势已倒向了俄国这一边。

正当俄国和德国都暂时处于晦暗时刻之际，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创立者托马斯·马萨里克，却在欧洲的地图上留下了他的痕迹。由于种种原因，但不是因为外交上不够努力，捷克斯洛伐克在两次大战之间并没有成为西欧的一部分。但它是法国的外围圈——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者的前沿阵地——中的可靠环节。1944年和1945年，斯大林和红军占领了这一线的所有国家和东德，使它们转入另一方向。经父亲用西方自由传统哺养起来的扬·马萨里克，在1947年说过："我们可不能进行自由的选择。捷克斯洛伐克不是处于东西方之间。它是处在俄国与德国之间。我没有选择余地。我愿同东方一起走。但是，这样会害死我。"(《火焰》，1968年2月。)

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它害死了扬·马萨里克和其他很多人。但是在1968年的夏天，捷克的领袖们相信并且希望：那种陈旧的、严峻的形式可再也不存在了。他们相信：在1917—1919年间开始加剧，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高峰的那种紧张关系，正在逐渐解决中。俄国与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方式，和随之而来的外交活动，已使俄美之间的对立缓和了。双方都接到了足够数量的善意的信号，华盛顿和莫斯科都讲一些理智了。与此同时，古老的欧洲大陆已大大恢复了它的活力。捷克

人已经过够了处于永久包围之中的生活，他们已开始在一个并不划分为两个敌对阵营的欧洲去寻找他们的位置。

另一方面，俄国人却并不这样乐观。他们知道德国问题是被搁置起来，而不是解决了。莫斯科有影响的军界思想，仍然把欧洲当作两种制度抗衡的最重要的地区。在核武器上与华盛顿达成谅解，仅仅使部署常规部队的重要性增加了。

在莫斯科关于西德"复仇主义"或美国"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种种阴谋的宣传词句背后，有一个严格的和可以辨别的外交政策的推论。俄国人在本世纪内已有两次不得不承受来自中欧的袭击。只有他们才知道上次战争中他们究竟受到了多大的损失，而这个国家仍然是由那些捍卫过它的人管理着。战后苏联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已表明，战时人口的伤亡比西方最高的估计还要高。巨大的伤亡，约有两千万甚或更多的人死亡，都是在保卫俄国西部边境的过程中蒙受的损失。

俄国人无意解除他们对西方的防务。他们不愿看到他们目前在东欧的部署将会受到任何扰乱；在他们看来，之所以引起扰乱，只是因为布拉格有几个经济学家和政客瞥见了西欧明亮的灯光。在他们的军事和经济体制中，捷克斯洛伐克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它是来自俄国和东欧的大量原料的加工厂；这个国家的领土已构成一条从西欧直通苏联的隧道。

俄国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西方传统也有疑虑，并且

往往容易过高地估计它们的政治意义。5月间，他们的一家报纸竟把托马斯·马萨里克描绘成一个参与策划暗杀列宁的奸险的阴谋家。这件事激怒了捷克人，因为他们刚刚重新认识了马萨里克，于是他们立即作出了尖锐的反应。这个问题和历史的真象是完全不相干的。俄国人认为，马萨里克和俄国现代史中最混乱的一段时期——即西方各国干预和内战时期——是有牵连的。另一方面，对捷克人来说，马萨里克是他们的独立和他们的第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无懈可击的缔造者。去年10月，捷克斯洛伐克庆祝了建国五十周年。它只比苏联年轻一岁。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认为，它现在满可以照顾自己的事务了。

莫斯科的观点可不是这样。在〔1968年〕夏这三个月中，俄国人和他的盟国曾竭力迫使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就范。他们施加了经济压力，并通过报刊作出愤怒的表示。1968年6月11日，莫斯科向布拉格发出了它的第一个外交抗议，要求禁止发表反苏文章。捷克人遭遇了一场神经战。俄国人任意调动他们的坦克和部队来提醒捷克人：根据华沙条约的条款，他们也有权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这样做。夏季军事演习没完没了，仅仅在8月3日，即布拉迪斯拉发协定签字的那一天，最后一批部队才离开了这个国家。

苏联对杜布切克政权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已有多次被公开提出，然后又被否定了。辩论集中在与1956年匈牙利的情况作比较。纳吉·伊姆雷，即后来被处决

的匈牙利革命领导人，当时他曾确信匈牙利必须退出华沙条约。他认为，莫斯科会欢迎有一个中立和友好的匈牙利做邻居。捷克人认为，纳吉的第二个错误，是他未能恢复国内秩序，从而使苏联的武装干涉成为不可避免。(可参阅《文学日报》，1968年6月13日。)1968年8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游荡的，并不是一支支武装队伍，而是通常在夏天到来的欧洲人。捷克领导人从不放过机会向莫斯科保证他们是忠于华沙条约的。

一直在准备着两个党的代表大会。斯洛伐克人定于8月26日在布拉迪斯拉发集会；捷克斯洛伐克党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则定于1968年9月9日在布拉格举行。各州选举代表的情况确切地表明：大会将批准过去的改革，并为未来的进展扫清道路。但是，捷克斯洛伐克要使社会主义更富于"人情味"的试验还没有完成。俄国人和他们的盟国，利用了最后的机会来刹住这次改革运动。

象深夜的窃贼那样，他们的军队在8月20—21日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莫斯科的统治者们的关心、忧虑和自我安慰，立即变成令人震惊的极不合适的行动了。当然，没有人指望俄国领导人采取违反他们国家利益的行动。但是，将来他们可能会受到指责，说他们不懂得这些利益究竟是什么，和如何最好地维护这些利益。他们为了要维护愚昧、不人道和贫困，并在不需要使用暴力的时候使用了暴力。他们实际上是要求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用陈旧的、公式化的口号来代替他们新近发现的、

紧迫的和有意义的讨论。他们所提出的建议，是要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捷克斯洛伐克各族人民开始相互攻讦。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是反对从长期来看对整个东欧有利的经济改革事业。

1967年6月——1968年8月大事记

1967年

6月27—29日　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

8月27日　斯洛伐克的第一所中学和斯洛伐克马蒂嘉[1]创建一百周年纪念。

10月31日　布拉格学生同警察发生冲突。

11月1日　南斯拉夫通讯社指出10月30日和31日在布拉格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是"最近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中央委员会上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冲突，涉及到经济状况和党的任务。以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为中心，形成了诺沃提尼总统的反对派。提出了去掉诺沃提尼总统部分职权的要求。

12月8日　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先生到达布拉格。

1968年

1月3—5日　中央委员会开会，一致选举杜布切克

① 保护国外斯洛伐克人的组织，详见本书第63页。——译者注

	先生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诺沃提尼留任共和国总统。
1月29日	杜布切克赴莫斯科。
2月7日	杜布切克和波兰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在俄斯特拉发会面。
2月10日	弗拉基米尔·考茨基赴布加勒斯特。
2月25日	扬·谢伊纳少将逃离捷克斯洛伐克。
3月13日	议会要求最高法院院长完成恢复前政治犯名誉的工作。
3月14日	国防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扬科上将自杀。
3月22日	诺沃提尼总统辞职。
3月30日	斯沃博达将军当选总统。
4月3日	扬·马萨里克死因调查委员会成立。
4月5日	中央委员会批准党的“行动纲领”。
4月6日	授权奥德日赫·切尔尼克组织新政府。
4月10日	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共和国实行联邦化，让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处于平等地位。
5月3日	国防部长楚尔将军证实，在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最近访问布拉格期间，曾讨论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举行军事演习的问题。
5月5—7日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路易吉·隆哥访

	问布拉格。
5月17—22日	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访问布拉格。
5月29日	卡沙可夫将军和其他华沙条约缔约国武装部队的代表到达布拉格，筹备6月间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参谋人员演习。
6月27日	《两千字宣言》发表。
7月14—15日	俄国、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和东德领导人在华沙会谈，起草了一封态度强硬的华沙联名信。
7月18日	杜布切克在电视上要求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支持他。对华沙联名信的复信发出。
7月29日	捷克与苏联领导人在蒂萨河畔的切尔纳举行会谈，历时四天。
8月 3 日	六个华沙条约缔约国的领导人签署布拉迪斯拉发协定。
8月 9 日	铁托总统到达布拉格。
8月20—21日	五个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以“工农革命政府”的名义逮捕了杜布切克和其他捷克与斯洛伐克领导人。
8月23日	斯沃博达总统率领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

8月26日　在莫斯科达成协议：杜布切克继续担任第一书记；入侵的武装部队逐步撤回，但其中一部分则仍驻留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边境；恢复新闻书刊检查制度；加强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附　　录

捷克的胜利与悲剧

〔英〕戈登·布鲁克-谢泼德
　　　戴维·弗罗伊德 著

第一章　在切尔纳的对抗

当“布拉格之春”已经过去而漫长的夏天来到的时候，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经济压力不断地加重，就好象两只手掐住这个国家的脖子似的。

1968年5月8日，苏联抓住红军“解放”捷克二十三周年纪念日的机会，派了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将科涅夫元帅，带着一个庞大的军事代表团去布拉格。这是一群穿着军服的宣传使节。他们不单同捷克的反对派那帮人会谈，而且还周游全国，在各地工厂里发表演说，不遗余力地在产业工人中鼓动亲苏的感情。

接着，就在他们还在捷克继续“友好”旅行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以后长期接连不断的军事神经战的最初动态。5月9日，传来了封锁捷波边境和苏军在波兰境内调动的消息。

然后，5月17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亲自率领另一个大型的苏联军事代表团飞抵布拉格。过若干小时之后，苏联最高级的贵宾、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来访。这是关键的一着，带有重要的双重目标。他们的目的是：格列奇科深入调查军事情况，而柯西金则是窥测政治形势。

格列奇科元帅的使命在于尽快地使苏联军队进驻捷

克，无论用什么借口都行。他再度强行要求捷克同意苏联将一个约有一万两千兵力的师驻扎在它的西部边境。杜布切克拒绝了这个要求。可是，就在两个星期前，杜布切克本人在莫斯科原则上已同意提前在捷克境内进行军事演习，现在不可能连这一点也加以拒绝。

5 月 24 日，即同格列奇科的会谈结束两天之后，布拉格宣布：军事演习将于 6 月月中举行。捷克国防部长马尔钦·楚尔说：这实际上不是演习，仅仅是"联合进行的参谋训练"。这位将军的说明给予人们这样的印象：将要举行的是一次在特定的军事基地内，由大约为数不多的通讯兵和观察班① 帮助进行的参谋军官的实习。

大军涌进来了

假如楚尔将军真是那样想的话，他就会体验到痛苦的幻灭感。苏联方面则有着另外的想法。他们一得到渴望已久的出兵借口，马上就加以利用。格列奇科离开布拉格还不到一个星期，苏军的先头部队连为演习所规定的日期都等不及，就越过边界进入捷克境内。6 月上旬，波兰、匈牙利和东德的部队跟着开了进来。

他们象是一大群训练有素的蝗虫迅速涌入；从各个方面入侵的这支大军究竟有多少军队开进来，任何人，甚至连捷克的军事情报部都说不清。这是最早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占领，这个军事行动结束的时候，至少有

① 军事演习时负责观察炮弹是否命中目标的一个班，称为观察班。——译者注

两万五千名、也许不下五万名的外国军队开入捷克境内。

继通讯部队之后,“警戒部队”来到了,紧接着装甲部队和空军的大部队也开了进来。

这哪里是泛泛的参谋训练,苏联军队和它们手下的地方行政官员,已在捷克全境完全占据了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许多军事要冲。而且,连捷克军事当局也没有被允许了解在那些地区发生了什么事情。例如,有一次,捷克总理切尔尼克表示希望同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兼“演习”指挥官雅库鲍夫斯基元帅通电话交谈。可是,切尔尼克得到通知说,这只有通过莫斯科才可以办到。

苏联军队的到来是打算长期驻扎的,这是很清楚了。一部分军官甚至带了家眷来。而且,在部队驻地附近的村镇里征用了舒适的住房。苏联军队安装了一整套通讯设施,甚至配备了广播电台和理论上——因为后来事实证明它办不到——能够干扰捷克斯洛伐克无线电广播的电波干扰设备。他们控制了军用飞机场,巨型的安东诺夫式运输机随便起飞和降落,并运进大量的装备和兵员。

这事实上是披着伪装的占领,任何时候都可以非常轻易地脱下伪装,一变而完全统治这个国家的生活。在那6、7月份的任何时候,如果“健全的势力”或“忠诚的共产党员”,在捷克斯洛伐克能够找到可以非难杜布切克路线的事情而向苏联请求援助的话,苏联也许可以不必引起反对侵略的骚动而毫不费力地提供这种援助,并立即付诸实施。就苏联来说,毋庸置疑它是处在跃跃欲试、迫

不及待的状况，但那样一种局面虽然可望而远非可即。

然而，尽管苏联方面采取了一切鼓励的办法，"健全的势力"并没有请求援助。连柯西金也未能说服他们挺身而出。他坐在卡罗维发利[①]的色采陈旧、具有维多利亚王朝样式的豪华房间里，喝着对健康虽有好处却不怎么好吃的矿泉水，总算保持了"在疗养"的借口，后来柯西金在预定的十天访问还未满期以前，终于死了心而离开了。柯西金的所见所闻使他充分懂得，无法用议论来说服杜布切克了，没有某一个强有力的、适当的叛徒的帮助，仅仅凭在布拉格对杜布切克施加直接压力，苏联可不能达到它的政治和军事目的。不能不采取另外的方法了。

保 守 派

柯西金回去不久，6月1日[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赫拉德查尼堡开会。这次会议的任务是：确认杜布切克的领导并支持其政策；再撤掉若干名声誉扫地的亲苏人物的高级职位；而最重要的是，使党的全部机构"民主化"，并决定召开下一次党的特别代表大会的日期。有可能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工作之一，将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众所周知，这意味着事实上要把还留在委员会内的三、四十名斯大林主义保守派赶走。只要

① 这是西波希米亚的温泉城市，在布拉格西北大约90哩，离东德边境12哩。——译者注

② 此次捷共中央全会于5月29日开始举行，6月1日结束。——译者注

他们还留在委员会内，苏联就可望在民主形式之下使杜布切克垮台。

现在，这个希望只能够保持随后三个月这么短暂的寿命了。全会决定特别代表大会于9月9日召开。留给克里姆林宫考虑的时间眼看着就要过去了。6月1日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定，成为苏联坦克再一次于8月间残酷地扫荡它的国土的一个原因，这注定了捷克斯洛伐克已在劫难逃。

尽管由于苏联军队的留驻而产生了不稳的情况，6月份还是比较平静的。在响应据说是捷克"民兵"所发出的团结呼吁的借口下，苏联从6月19日起在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苏捷友好"的宣传运动。苏联各报和文化杂志，对捷克的"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对他们视为杜布切克政权的思想上的中心人物——切斯特米尔·齐萨日博士反复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但是，捷克的知识分子拥有反击的充分力量。事实上，6月27日他们就作了由其后果看来也许是过于猛烈的反击。

在如今为人所熟知的那篇《两千字》宣言中，他们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政府呼吁，要求大力推进改革过程，使每个人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篇宣言，是由小说家卢德维克·瓦丘利克用有力而动人的词句写成的，由七十名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① 签名，发表在

① 据路透社1968年6月28日发自布拉格的电讯报道，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是科学家、知识分子、运动员、布拉格工厂的工人及其他人。这个宣言的译文可参阅本书正文第九章。——译者注

《文学日报》和其他报刊上。这批知识分子，向人民宣传，要把共产党的“保守的”残余分子作为自私自利者、懦夫、恶棍加以排斥，特别是在地方上，要强迫那些仍然留在原来职位上的反动官员和“健全分子”辞职。

这个宣言还号召人民管理地方报纸、设立保卫言论自由委员会、揭发告密者。

《两千字》还承认“外国干预我们国内局势的可能性引起了极大的不安”。然而它的签名者们保证，只要政府照人民的委托办事，人民将支持它，“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来”。

即使不借助于事后的聪明，从政治上看来，这个行动既是刺激性的，又是轻率的。《两千字》宣言的意图是要举起捷克斯洛伐克抵抗的火炬，却招致了煽起苏联愤怒的后果。杜布切克本人觉察到了那种危险。《两千字》宣言发表的当天，他感到必须在主席团会议上对它表示不同意。然而，他却未能因此而使盘踞在布拉格的亲苏集团的领袖阿洛伊斯·英德拉不把《两千字》寄发给所有的地方党委，以达到煽动一般群众反对杜布切克的情绪的目的。

7 月中，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这主要是由于苏联军队拒绝撤退而造成的。“参谋演习”在 6 月的最后一天已正式结束。7 月 2 日，雅库鲍夫斯基元帅给了捷克新闻界一个可以称之为最后的侮辱——他不同意捷克各报刊的代表参加为宣布演习正式结束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苏联方面郑重地宣布，华沙条约部队在两三天内撤

走。可是，7月9日，捷克国防部长马尔钦·楚尔声称，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华沙条约部队已经开拔。这个说法意味着：波兰和匈牙利的部队撤出了，而苏联军队几乎全部还留驻着。

苏联方面制造了各式各样的借口，以便延期开拔。最初，他们以"为了避免引起周末公路上的交通混乱"为口实而延期离开。随后，他们感到有必要同地方上的人民举行告别集会。下一次，他们说，为了修理损坏了的装备必须召来新的部队。后来又表示，因为从东德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机械化装甲部队要离境，打算经由斯洛伐克东部穿过这个国家。

假如苏联暗中的意图并不含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那么，这种奇怪的行径几乎可以说是一桩荒唐的事情。这时捷克的刊物越发不客气了，就对苏联大加奚落一番。

7月10日，杜布切克的忠实支持者普尔赫利克中将认识到这时已经出现了"新局面"。这位将军说：苏联虽然答应撤兵，但它至今还是按兵不动。布拉格下了决心进行对抗。同一天晚上，杜布切克打电话给在莫斯科的勃列日涅夫，强烈要求苏方迅速撤兵。据传杜布切克说："如果您那一方让这样的事态继续下去，那么，两国间保持着的友好关系就会全部遭到破坏。"这个威胁确实有了效果。

两天之后发表的联合公报①宣告撤军将开始；7月13日，苏军至少已从所占领的战略地区撤出，并开始拆

① 指华沙条约缔约国军事演习正式结束的联合公报。——译者注

除它设置的通讯设施。一部分大部队却重新集结在斯洛伐克西部，在那里磨蹭了三个星期，现在克里姆林宫似乎认为原来的和平占领的企图失败了，所以得出停止这个行动为妙的结论。

有理由相信：7月间的这个决定在莫斯科经过了很大的周折，是在有人提出“坚持到底”的强硬主张之后好不容易才作出来的。而且，好象至少有一部分苏联领导人认为，为了更大的跃进，此时后退一步是上策。

上述这一点，已由对布拉格加强政治压力一事暗示出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欢迎莫斯科的匈牙利傀儡卡达尔·亚诺什的群众大会上，勃列日涅夫显露了新的鹰派作风，大骂了一通。他再一次号召在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战斗中采取共同行动。

苏联所说的“共同行动”意味着什么，不久布拉格的领导人就明白了。勃列日涅夫发表演说之后，他们立即分别从苏联、波兰、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五国共产党那里收到了请柬，邀请他们参加在华沙举行的“最高级”会谈。忠于“不干涉”和平等立场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依然置身局外。

苏联及其盟国显然抓得很紧。为什么那样急躁呢？大概是想把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请到国外去，在苏军还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任意摆布他们吧！这也许就是杜布切克担心的事情。他可不想自投罗网。反正他吃过在外国搞的群众审判的苦头，他是不愿再问津了。

7月11日，苏联又给布拉格送来了一份可以说是强迫性的请柬。而且，作为这份请柬的帮腔，《真理报》上还刊登了一篇文章，它使用了恫吓的词句说，如果捷克领导人不接受这个邀请，那就只有进行武装干涉了。这篇论文标志着7月间对布拉格施加的压力的顶点。最不祥的预兆是：谴责捷克斯洛伐克正在蔓延着“反革命”，并把当时的形势同1956年同一类的“反革命”的匈牙利事件相比拟，而后者就是特别使用了苏联坦克来消灭的。

对于苏联在杜布切克头上挥动的“大棒”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已经不能再有丝毫的疑问了。倘若还有疑问的话，那么，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凭着他对苏联作法的丰富经验，按照他极其慎重地选择措词的习惯，用任何人都能领会的语言，给我们说明了它的危险。铁托在7月13日说，他不能相信“在苏联人中间存在着对捷克斯洛伐克使用武力那样眼光短浅的人”。这就是铁托独特的婉转措词，意思是他知道那样的人物是存在的，而且他们的势力正在增长着。

有几千名、也许几万名苏联军队还驻在捷克国内，要对抗苏联这样的压力，杜布切克需要冷静的神经和果敢的精神力量。捷克领导人更加有这种需要，因为从他们的经验，从匈牙利的教训，从迄今西方对他们的主张缺乏关心等等来看，他们清楚地知道：当苏联袭击过来的时候，谁都不会向捷克和斯洛伐克伸出援助之手来。即使如此，杜布切克和他周围的一帮人，断然坚持了他们的立场。他们拒绝了去华沙的召唤。

因此，华沙会议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事实上，捷克最初知道这个会议的举行还是通过波兰的无线电广播。

这次聚会时间短促，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心情舒畅的。苏联的驯服的同伙——哥穆尔卡、乌布利希、日夫科夫、卡达尔，在堆砌了露骨的最后通牒般的词句的致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信件上，匆匆忙忙地签了名。

"不能容忍"

他们的主张很简单：局势已发展到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派同事们所控制不住了（"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反革命势力，正在接连不断地从你们手中夺取局势的控制权吗?"），而且这不只是"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们"的问题，也是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是"完全不能容忍"的。纠正的唯一办法，就是镇压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取缔所有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团体的活动，恢复新闻检查，清洗共产党的队伍。这种说教似的恫吓，概括起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用强权政治的术语来说，在克里姆林宫的眼中一旦出现了威胁到他们本身极端重要的利益的危险的时候，所谓尊重别国的国家主权等等保证，也就一文不值了。

这是7月间的正面冲突，是一场同意志和神经的作战。杜布切克面对面地奋起迎战。他不单是抵抗，而是在全线进行反攻。7月17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开会之后，给签署来函的五个国家回了信，既有礼

貌地，但又坚决地警告他们甭管别人的闲事。然而，这封回信还补充说，捷克领导人对于同几个盟国在个别的基础上举行双边会谈可没有什么异议。布拉格的主席团在同一会议上采取了意外的措施——宣布7月19日召开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这是杜布切克对企图从内部搞垮他的苏方所抱希望的一个决定性的沉重打击。中央委员会还是由事实上跟诺沃提尼时代相同的人物所组成。只有党代表大会才有变更它的权力。据说：中央委员会中大体上有三分之一的成员被认为是“保守派”，还有大约同样数目的人被认为是骑墙派，因而杜布切克害怕在表决中失败，一直踌躇着不敢召开中央全会。

可是，到7月19日中央全会召开的时候，诺沃提尼时代如何遭到唾弃、苏联自己的高压策略如何产生了意外不利的后果，就看得一清二楚了。一百零七名中央委员中有八十八名出席了会议。全体与会者投票支持杜布切克和主席团拒绝华沙来信。

苏联在政治上遭到失败。尽管它的军队在捷克国内昂首阔步，并从外部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然而，苏联却未能使隐藏很深的“健全的势力”替换杜布切克和他的同事们。

杜布切克说“不！”

勃列日涅夫这一次可要对莫斯科最得意的门徒试一试新的政治策略。他又提出了另外的提案；这回是建议

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举行两国会谈。而且，他提议时间定在7月20日或23日，可从莫斯科、基辅或利沃夫①中任选一地作为会晤地点。

如果让杜布切克来说，不管是莫斯科也好，基辅也好，利沃夫也好，都是明显地比华沙更令人不感兴趣的地点。当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在苏联领土内的时候，苏方能够把它的成员隔离开，或者可以逮捕他们之中的几个人，而强制其余的人宣布他们自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正统的统治者。杜布切克再一次说“不！”，这对于勃列日涅夫及其政治局不可能是一桩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

勃列日涅夫似乎预料到这一着，立刻同意7月29日在捷克境内举行双方会晤。

当时，苏联早已胸有成竹，以它特别演出的喧闹的好战的音乐为背景，开始了一场最后的政治赌博。7月23日塔斯社宣布，苏联陆军从波罗的海到里海，在苏联西部领土和包括波兰以及东德在内的一大片地区，举行大规模演习。据报道，这是苏联军队历来进行过的演习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它动员了许多后备人员，征用了地方民用运输工具。这次演习预定将持续到8月10日。

现在我们也能看得清楚：这次演习是一个烟幕，以便在7月底以前，为了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开始最后动员华沙条约部队。演习将在农作物收获季节最繁忙的时候进

① 据合众国际社1968年7月20日发自莫斯科的电讯报道：苏共中央政治局给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信建议在基辅或利沃夫举行会谈。基辅是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首府；利沃夫也在乌克兰，离波兰和捷克的边境不远。——译者注

行，这一事实当时已经暗示出它很有可能隐藏着那样的意图了。虽然如此，可是全世界对于苏联的那个公告①都采取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7月末，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越发临近危险的时候，发生了两桩表明他们的大团结的事件。一桩是，帕维尔·科霍乌特②执笔、刊登在十分仓卒印刷出来的《文学日报》临时增刊上的公开信，指名道姓地向党的各个领导人要求在同苏联会谈时采取坚定的立场。公开信用下面一段话作为结尾：

> “请为我们写下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命运攸关的一页。请慎重地写！但要鼓起勇气来写！失去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那是我们的不幸、你们的耻辱。我们信赖你们。”

接着，又有一个对全国人民的号召，要求他们支持上述呼吁。这个号召得到响应，立刻在布拉格和其他市镇的街道上，排起了等待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的长队；意味深长的是，他们甚至写下了自己的住址。到这个时候，共产党的领导人才第一次成了人民的领袖。

另一个事态发展是发表了这样的公告：全国举行了地方党代表大会，选出了出席预定在9月9日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一千五百三十九名，并指定九百多人作为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

---

① 指苏联国防部关于这次演习的公告。——译者注

② 捷克的一个有名的剧作家。参阅本书正文第三章。——译者注

自由主义者到处都垄断了负责职务，显然党代表大会一召开，保守派就会遭到清洗。

在欧洲地图上有几个这样的偏僻地点：由于一时的偶然机会，它们有一两天被历史的聚光灯所照射，永远在世界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个鲜明的印象，然后重新又隐退到暗处去了。

这样的地方之一，是1807年拿破仑和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为谈判而偶然选择的涅曼河中游的一个地点——提尔西特。① 另外一个是：1968年7月29日克里姆林宫的亚历山大一世的继承人们，为了同在某种意义上更加软弱的对手解决争端而来到的、位于斯洛伐克东部、仅有两千人口的小城——蒂萨河畔的切尔纳。

切尔纳是在捷克境内，离苏联国境只有两哩。这个小城还是两国主要铁路的连接点。这是它中选的决定性原因。苏联方面不愿意让他们的东道主供应膳宿——最不愿意用他们的通讯设施——决定每天乘专车来，当天工作结束后，晚间又乘同一列专车越过边界返回本国。

捷克方面因为他们在本国领土上会晤的主张已被接受，所以作了妥协，千里迢迢地来到了这个虽然离布拉格最远，但还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境内的城镇。同苏联方

---

① 涅曼河边的提尔西特现在名为苏维埃斯克，在苏联的立陶宛加盟共和国内。本文作者在这里说是“偶然选择”的，与历史事实不符。1807年6月14日，拿破仑军队于孚利德兰一役击溃俄军，19日直奔涅曼河，俄军残余部队渡过了河，拿破仑停留在俄罗斯帝国的边境，驻在提尔西特。6月25日，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第一次在涅曼河中一座木筏上见面，以后则在提尔西特会谈。7月7日法俄两国在提尔西特签订了和约，并结成同盟。——译者注

面一样，他们也是乘专车来的。

切尔纳会谈的奇怪情况之一是，苏联坚持要两国最高领导机构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苏联政治局的十一名委员除了两名以外都出席了，缺席的政治局委员由两名党中央书记作为“代表”出了场。① 捷克方面由党中央主席团成员十一人和总统斯沃博达出席。②

关于苏方这个要求的理由，有过许多揣测。有人解释说，苏共政治局本身内部分裂了，“鹰派”不能信任“鸽派”并委托他们去进行谈判。似乎更有道理的说法是：苏方认为，要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全体领导人都参加的话，也许会多少发生分化作用。

在这一点上，苏联方面估计错了。甚至象捷共中央主席团中的“保守派”的科尔德、什维斯特卡、比拉克那样的人物，当时处于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也不可能有公开反对杜布切克的勇气。

双方聚会了三天，在世界瞩目的那座朴素的切尔纳文化馆里，有过什么情况呢？就当时人们所知道的事情来说，那么只有下面这几点：苏联方面责难捷克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目标，在军事和政治的双重意义上使

① 据当时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公布，苏联代表团由下列人员组成：党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政治局委员沃罗诺夫、柯西金、马祖罗夫、佩尔谢、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谢列平、谢列斯特，候补委员杰米契夫、马谢罗夫，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图谢夫和波诺马廖夫。——译者注

② 据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宣布，捷克斯洛伐克的十四人代表团的成员是：切尔尼克、巴尔比雷克、比拉克、杜布切克、科尔德、克里格尔、皮勒尔、里戈、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什维斯特卡、卡佩克、列纳尔特、西蒙和斯沃博达。——译者注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陷于危险境地；杜布切克不同意上述谴责，抗辩说在一切方面他们都是忠诚的；然而，据传他终于在苏方最后认为顶紧迫的少数几个内政问题上，答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根据乌布利希的党的机关报《新德意志报》所得到的权威方面透露的消息，那些所谓内政问题是：第一，恢复新闻与无线电、电视广播的管制；第二，重新取消政治结社的自由；第三，就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机关和政府的人事问题作出保证。）

或许全部真相最终也不会为人所知。几乎可以肯定当时确实无法获得书面文件，而人的记忆毕竟不同于真凭实据。

但是，现在隔了两个月，有了可以部分地设想切尔纳会谈经过的材料。至于情报的原始来源，我们不能讲出他们的名字。可是，其中包括了两名整个会谈过程都在场的人物；还有四个，是待在切尔纳现场或布拉格后方、始终同捷克代表团取得联系以应络绎不绝的咨询的人物。而且，还包含了来自西方以及各中立国家外交官员的许多情报；他们说，虽然那些是第二手或第三手的传闻，却都是充分可信的。关于某些枝节问题，那些资料的看法虽各有不同，但除了一个例外，并无重大的分歧。

会谈是由勃列日涅夫把二十五张厚的一捆剪报放在桌子上开始的。那些东西，有的出自捷克的报纸，大部分则是解释捷克斯洛伐克最近发生的事件、或者就其重要性进行考察的西方各主要刊物的剪报资料。

那些剪报资料包括了从思想自由到西德的“军事威

胁”、从未来捷克的领导机构到将来捷克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同南斯拉夫和以色列的关系）的一切主题，或者是被利用来充数的。

苏联方面一张一张地拿起剪报；发言者一个接着一个，详细论述提出来的无数问题，要求改正。这样一来，关于后来被简单叫作“人事调动”的问题，苏联方面提出了“非撤换不可”的捷克党的负责干部、军人、官员、报纸和广播电台工作人员的名单总共将近二百五十名之多。

苏联方面虽然有所保留，没有明确地把那些在即将来临的9月党代表大会上应该选进领导机构的人员名字告诉捷克方面，然而强烈地主张：大会的各项决定必须反映“国民构成因素”之间的适当平衡。——这就是清楚地暗示：必须保留某些属于保守派的旧人员的职务。

西德的“威胁”，反反复复地被作为论据。杜布切克被要求作出保证，绝不做任何一件事情来帮助波恩谋求向东欧“渗透”，或者削弱乌布利希地位及其谈判力量。捷克和波恩之间新的经济谈判，一切应于事前同参加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各国进行协商，仔细研究，加以调整，不得做任何一桩使经互会机构产生混乱的事情。在中东，捷克斯洛伐克必须按照社会主义阵营同以色列断交的决定，继续履行它所承担的向阿拉伯世界供应武器的协定。

“这简直是发疯！”

这一天，而且接连的两天，苏联方面翻来复去提出来

的，就是杜布切克的外交政策和国内的“自由化”问题。照苏联的说法，这是一枚铸币的表里两面。会谈当中的某个时候，勃列日涅夫怒吼了：“你们的政策竟让所谓‘自由作家们’来发号施令，这简直是发疯！他们是帝国主义的爪牙，至少也是干着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事情。”

讲到军事问题，西德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再一次给讨论投下了阴影。照苏联的说法，假如没有苏联的增援，把保卫波希米亚前线那个极端重要的地区交给捷克军队，那是不能令人放心的；不仅如此，那里在保守军事机密方面还发生过令人痛心的情况。苏方发言者之一的苏斯洛夫攻击说：过去几个月捷克屡次辜负了对它的信任，竟将有关华沙条约部队的部署和计划的重要情报泄漏给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在这个特殊问题上，8月末于某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参加国的首都，在有中立国代表参与的会上，至少由一个苏联代表反复进行了责难。）

每当关于军事与外交政策领域的争论中止的时候，苏联方面总是又回过头来，大谈杜布切克已在国内政策上背弃了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依照他们的说法，这是捷克的一切病毒的根源。

最初，承担了大部分发言的杜布切克，耐心地对上述责难逐一加以批驳。在外交领域，他强调了捷克的忠诚；在军事领域，他力陈捷克的坚定立场。至于内政的“行动纲领”，杜布切克把它叫作真正最好的社会主义来加以辩护。他还积极地否认人们指责他在做着有“复辟资本主义”危险的事情。

事实上，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总理，不久拿出统计数字，就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掌握的工业、农业、贸易所占的比重，同波兰、匈牙利、东德作了对比，指出捷克是如何优于上述几个国家。他们宣称，在这几个“可以信赖的”国家的经济中滋蔓着的“私营企业部门”，在捷克斯洛伐克是不存在的。

诸如此类的评论与反驳，自然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都反复地作了详细陈述，可是第一天会议在僵局中宣告结束。杜布切克情绪阴郁。他原来希望花一整天开正式会议，大约再加上一个上午起草会谈公报，会议就可以结束了。一部分是为了这个原因，他没有随带配备齐整的顾问班子，谢绝了布拉格的一个谋士所提的建议，即代表团应编制同首都联络用的密电码。他回答道：“搞这种玩意儿干啥！我们反正是在本国境内嘛！”

电话被窃听

这是一次代价极大的失策。苏联方面就在边境的这一边，已准备了随时可用的一大批专家和一大堆资料。至于通讯设施，切尔纳同布拉格之间有三条电话线。苏联的通讯兵窃听了那三条电话线的全部通话内容，即向苏联代表团提供了捷方所进行的一切咨询及其回电的所有详细内容。

这本来都是预料得到的事情。唯独出人意料的是：杜布切克本人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对此竟没有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事后杜布切克的一个顾问解释说：“这要

怪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真正自由的气氛。也许你们难以相信：我们早已把窃听电话这类事忘得一干二净了。”这简直是无法相信的事情。

切尔纳会谈的第二天，是从一个插曲开始的，如果不是讲得那样一本正经，就会使人觉得有些滑稽了。勃列日涅夫再一次从专车上出现，在会议正式开始以前，他生气似的又举起另外一份报纸朝着杜布切克挥动。那是最近一期的捷克党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在前一天的会议上，该报编辑部的某一个人已被点了名。

然而，现在使苏共总书记愤慨的，既不是它的社论，也不是它报道的消息。不是的，勃列日涅夫翻开那份报纸，指着当中一张报上的一则广告。那是捷克某个共产党支部征聘书记的广告，要求的条件只是大学的学位。勃列日涅夫咆哮道：这就是证明捷克整个危险局势的典型事物！从没有用共产党的适当方法进行过训练的普普通通的人中间选用党的干部，——要是搞这种事情，请问：共产主义会搞成啥样子？

根据一种说法，捷克方面为辩护这个问题花了两个钟头。按照另一个好象更合乎情理的情报，杜布切克抑制着怒气，极力劝慰勃列日涅夫。他认为讨论这种事情徒劳无益，希望尽快开始正经的工作。

苏联方面对杜布切克的最激烈的攻击，是来自乌克兰党的头目、在苏联领导人中以头号鹰派人物正在显露头角的彼得·谢列斯特。谢列斯特一坐下去，杜布切克马上站起来说：“假如您继续使用那种措词的话，即使继续

进行这次会谈也不会有什么益处。”

于是杜布切克和捷克代表团全体成员站起来，走出了会场。最后在松松垮垮的气氛中重新举行会议，那是勃列日涅夫在苏联代表团其他成员陪同下，带着多一点妥协的精神访问了捷方的专车回来以后的事情。

就象所有情报一致认为的那样，会议的第二天，捷克总统斯沃博达将军所作的重要“干预”，是值得注意的。苏联领导人都对这位将军十分尊敬，甚至还怀有共产党的情谊——虽然只有那么一丁点儿。这位老军人——他是由于战时的功绩由苏联授予最高褒奖① 的极少数外国人之一——滔滔不绝地谈了两个多小时。他的发言是坦率的、雄辩的、动人的。

雄辩术的一次成功

斯沃博达总统说，苏联所谓捷克斯洛伐克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见是“不可理解”的。接着，他大讲特讲存在于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两国人民之间多年以来的互相同情、以及以将军自己为象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捷苏两国的共同战斗。随后出现了严峻的戏剧性的时刻。

> “那封攻击我们、说我们在帮助帝国主义者的华沙联名信，它的大多数签字国，在上次大战中采取了什么样的立场呢？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这几个国家，都曾经同希特勒并肩作战。另一方面，捷克却是

① 1965年斯沃博达七十岁生日时，苏联曾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译者注

和苏联一起对希特勒作战的。”

然后捷克总统谈到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边境这一迫切问题，他的这一发言获得了雄辩术的一次成功。斯沃博达谈了初夏时节和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一道巡视那些防御地域的情形；他说，在那次视察旅行后，这位苏联元帅亲口表示：他对部署在那里的捷克军队的士气、装备、临战态势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是这位元帅在那个时候撒了谎呢，还是如今苏联领导者们竟把自己的部队指挥官当作傻瓜来责备呢？

总统就他自己的地位问题补充说道：只要苏联方面不改变态度，他就要辞职。他是一个年迈的老人，并不是自己谋求这个职位的。他本来是一介农夫，任何时候都可以挂冠归田的。

这位克里姆林宫的宠儿独自进行了猛烈反击，这才扭转了捷克方面的形势。他们终于采取攻势，尝试依靠同样大胆的方法来坚持他们的立场。斯沃博达演说之后，有时杜布切克又带头起来反击。他说：当前危机应由苏联负责，因为对诺沃提尼时代的错误负有责任的就是苏联。

杜布切克还追究既往。他拿出了证明诺沃提尼多次从莫斯科接受直接命令然后行动的苏方文件。那些文件中，有几份上面就有此刻坐在桌子对面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签名。

在责难和回敬反复进行的过程中，语气开始越来越

激动。斯沃博达又以辞职来要挟，甚至还说要把苏联的勋章退回。根据某一个情报，总统和勃列日涅夫两人都掉了眼泪（这是非常斯拉夫式的、也是非常共产党式的场面）。

后来，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虽然具体的时间未必准确——勃列日涅夫突然患了有名的“心脏病”（一部分情报来源去掉了这个引号，说勃列日涅夫的病是真的）。不管是真是假，这对于谈判总是一个危机。苏联代表团中有几个人，即以他们的首长缺席为借口，想要停止会谈，即刻返回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理论家苏斯洛夫，是要求继续会谈的那一帮的带头人。

那天出来打圆场的是杜布切克。有人说，起初提出把杜布切克请到自己车厢来的是勃列日涅夫。另外的情报则认为，这两个人的促膝交谈，是出于杜布切克的提议。不管怎样，杜布切克到勃列日涅夫的专车那儿去了。他离开了勃列日涅夫虽然缺席而仍在热烈争论的会议室，步行到苏方专车停靠的月台，在捷方警卫人员惊慌失措之中，独自登上了车厢。

这次交谈所产生的是这样的协议：分别开列双方取得一致的和关于至今意见仍有分歧的各点的清单。这个处理办法后来在第三天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得到了双方代表团全体成员的确认。这就是所谓“切尔纳妥协”的根源，也是切尔纳会谈后鼓噪一时的、苏方硬说捷克“背信弃义”、捷方则否认有“秘密妥协”那种双方互相攻讦的根源。

关于这次“妥协”确切地究竟是怎样的东西，随便拿两个情报来看，它们的意见都不一致（除了这个唯一的主要例外，关于切尔纳会谈的旁证大体上都是一致的）。

有人说，只有三个讲烂了的项目（宣传工具的管制，人事问题的保证，非共产主义政治活动的镇压）写上了意见一致的那张单子。根据另一个讲法，捷克斯洛伐克在人事问题上的保证（人们认为不象会有这种事情）没有取得一致，而捷克的外交政策和捷克西部边境“加强”防御（不是依赖外国军队）这两个方面同盟国协调一致，则达成了协议。

关于所谓“一致”意味着什么，也有种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讲，杜布切克仅仅是“注意”到三四个、或者五个据说他已经接受了的项目。又有人说，他虽然答应了要实行那几点，但没有规定时间的限制。

这种众说纷纭大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真相。双方都是带着截然相反的目标到切尔纳来的。纵然达成了若干一致，那只不过是口头协议而已。双方以后都不能不佯装自己的主张已被接受，虽然事实并不是那样。但是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认为大概是确实的：苏联方面确信杜布切克同意了各种交易，然后回国去等待杜布切克履行那些事情。然而却毫无结果。

很迟才发表的会谈公报，照例一点也没有讲会谈的紧张空气和戏剧性的场面。除了有“以同志式的态度广泛地交换了意见”那种陈词滥调以外，会谈公报仅仅发表了一项具体的协议。那就是：两天后在杜布切克的故乡

——斯洛伐克的首府布拉迪斯拉发，举行捷克领导人和华沙信件五个署名国的全体代表的联席会议。

8月3日的布拉迪斯拉发会谈，是苏联提出的一个方案，从苏联的立场来说，它代表几个忧心忡忡的盟国在切尔纳达成了协议，必须使它们负起“集体的”责任来。这次会谈的任务不单是盖个橡皮图章，而是在于为承认同享光荣或同担罪责盖个证明钤记。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议上，双方阵营都有游移不定的表现。

有充分理由可以这样看：哥穆尔卡(波兰)和乌布利希(东德)两方都认为对杜布切克太“手软了”，在承认这个妥协方案上是有些犹豫的。而且我们知道，乌布利希在布拉迪斯拉发拚命争取在当天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写进特别对“西德帝国主义”更加强硬得多的词句，然而到头来还是白费了力气。苏联压制了乌布利希的主张，这暗示在那一时刻他们还准备试一试切尔纳的“妥协”方案。

捷克方面也有怕再被搞群众性“审判”的顾虑。但是，苏联的意志压倒了双方，会议照它的旨意进行。

六个代表团全都在冗长的声明上签了名。声明中包含着几乎所有共产党文件的陈词滥调，也装进了两三句苦心迎合杜布切克和乌布利希的心意的话。它差不多提到所有的问题，可是差不多什么问题也都没有说明白。而勃列日涅夫、杜布切克、哥穆尔卡、乌布利希、卡达尔、日夫科夫和各个代表团成员在照相机前交替进行的兄弟般的微笑、拥抱、握手和接吻——实在和睦融洽——也同样是没有说明什么问题。

第二章　乌布利希的“黑信”

共产党的领导者们悄悄地散会离去的时候，外面的政治世界理所当然地因为放心而松了一口气，错认为一切都平安无事地过去了而进入8月的假期。几乎所有的西方报纸都作了错误的解释，鼓掌欢呼这个事件是捷克改革派的彻底胜利——后来才晓得这对捷克却是一个不幸。

只有苏联知道，这是他们在让杜布切克头上吃一记大铁棒之前给他最后的一次机会。杜布切克虽然也知道这是短时间的暂缓动手，但他看错了时间表。他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谈后告诉朋友说：“我们赢得了三个月或者六个月的喘息时间。”

苏联给他的只不过是推迟三周的时间。在决定他命运的随后的两周内，杜布切克干了些什么，——还有哪些该做的事情，他却疏忽了？

在切尔纳同苏联进行了费劲的谈判，在布拉迪斯拉发同东方集团搞了一套假友好的表演而回到布拉格以后，现在，杜布切克终于体会到，处在他的地位上该有多少“魔术师的徒弟”的工作要做啊！

杜布切克是对“自由化”的实验倾注了热情的一位勇敢而真诚的人物。然而，他不是伟大的魔术师。不但这

样，他还是一个比较缺少经验的实验者，除了依靠本人动脑筋来处理事情之外就没有办法了。他这个人现在打开了各式各样的瓶子——那些瓶子长期以来一直都用瓶塞盖得严严的，上面贴着"自由"、"主权"、"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等等的标签——而瓶塞一旦被拔掉，那些瓶子就立即把这个徒弟怎么也控制不了的、具有自己生命力的妖精统统放了出来。

就象我们所看到过的，杜布切克和他的同事们在切尔纳并没有采取任何一个关键性的倒退措施。他们拒绝了苏联提出的让苏军留驻捷克境内的要求。但是他们毕竟被迫向歧路走了两三步——缓和捷克报纸的反苏言论，把"保守派代表"留在党的领导机关，对苏联的外交政策给予全面支持，等等。

晓得这个内情的捷克人极少。然而，几百万国民全都感觉到它。他们的不安再也无法抑制下去。这种情绪的典型表现是，8月4日傍晚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布拉格市中心临时举行的那次有名的"阳台上的记者招待会"。长达两个小时，他极力使几万名固执的群众(他们是为了听他讲话、为了向他提问而围聚在阳台下面的)放心，相信在切尔纳一切都很顺利。到了最后，他完全筋疲力尽了，因而大声叫嚷："你们的所有问题我都回答了，你们再要求什么呢？"于是，就象一个人的声音似地响起了回答："说实话！说实话！"

这就是8月初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进退两难的困境。甚至他们答应苏联的一点点一般性措施，也事先就

为本国人民所拒绝。因此，他们决定在国内谨慎行事，对莫斯科则争取时间。不管人们能否理解，这个决定对于捷克成了致命的一着。时间，莫斯科是不准备给他们的。切尔纳会谈在克里姆林宫的钟上，正是行动开始时刻的前一分钟。

铁 托 来 了

从那以后，有过各种各样的外宾。自8月9日到10日，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进行了先前一再延期的访问。作为向莫斯科挑战而得到成功的首倡者和象征性人物，铁托在街上受到人们对待英雄一般的欢呼（尽管杜布切克作了一切努力去节制群众的欢迎）；在秘密会谈中，拿他当作同盟者和英明的保护人予以热情的款待。现在知道，铁托（同五天后继他访问布拉格的另一个“反抗者”——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主席一样）非常关心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两次会谈。据传：同大部分过于乐观的西方领导人相反，铁托实际上把这些会谈看作是杜布切克的重大失败；在即将离开贝尔格莱德时，他说他去布拉格“是为了使捷克恢复一些勇气”。

我们知道，铁托在布拉格的时候，不但对杜布切克讲了祝福的话，而且向他吐露了自己的重大担心并表达了由衷的同情。从铁托的观点看来，杜布切克在切尔纳给了苏联过多的东西。这位南斯拉夫领袖认为“妥协”就是给了苏联一个随时可以借口捷克“背信弃义”而进行干涉的根据。从杜布切克的口中直接听到捷方在履行那次交

易而采取一些措施时所遇到的困难，铁托的担心就愈益加剧。关于所谓铁托给予杜布切克的一切承诺和忠告的详细情报，立刻由一个属于最高领导层而又心怀叵测的人物报告给了莫斯科。毫无疑问，就象下面马上要谈到的那样，这份情报具有真实的因素，而同时又是被歪曲了的东西。

上述情报有这样一段：似乎铁托强烈地劝告捷克领导人，不论国内反应如何立即履行在切尔纳所作的让步，或者不管莫斯科的反应如何尽快地加以拒绝（按照铁托的意见，这较为有利），在这两者之中采取一个办法。铁托认为，杜布切克的"顺从"政策是一场灾难的根源。有理由可以相信，铁托总统怀着比出发时更深的忧虑回到贝尔格莱德，在访问布拉格之后，他感到苏联进行全面武装干涉的危险性大为增长。

夹在铁托和齐奥塞斯库来访之间，一个不受欢迎的闯入者、那个老狐狸靡非斯特匪勒司① ——瓦尔特·乌布利希从潘考夫② 来了。当然，乌布利希是自己提议要来的。传说他起初要求得到"和铁托同等的待遇"，可是立即被婉言拒绝。不过，为他安排了同杜布切克的简短会谈，那是从8月12日到13日在卡罗维发利举行的——这显然是苏联驻布拉格大使契尔沃年科坚持替他要求的

① 德国传说中的恶魔，特别是指歌德著《浮士德》中的恶魔。——译者注

② 潘考夫在柏林的北部，离市中心五哩，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工人住宅区，1945年以后属苏联占领区，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一级的党政机构设在那里。——译者注

结果。

谜

现在已经清楚，这次会谈和它的余波使克里姆林宫对杜布切克的感情更加恶化了。唯一的疑问——莫斯科的闷葫芦常常是这样——只是乌布利希的策动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根据捷克和东德双方情报来源的最新报告(虽然在大部分重要的问题上有出入)，在卡罗维发利发生了下述情况。

乌布利希首先而且最热切地想得到的是，关于杜布切克对波恩的意图及其总政策对西德的立场所发生的影响这两个问题的满意答复。乌布利希曾经想方设法把这个内容写进布拉迪斯拉发联合声明，但落空了，因而这一回——显然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同意——想在双边的基础上再试作一次最后的努力。就“西德的威胁”一再发了许多不得要领的议论之后，乌布利希要求一项无条件的保证。他问道：杜布切克能不能答应，不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除非事先在布拉格同潘考夫之间取得一致，就不同波恩进行任何接洽？乌布利希回去以后能不能告诉所有同事，他得到了这个保证？

杜布切克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不行！”他告诉乌布利希说：布拉迪斯拉发联合声明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致性等问题的全部措词，已经在国内引起了相当困难。他讲，打算同所有各盟国全面“协调”外交政策，这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是重要的，然而答应同特定的一个国家——

东德密切配合可办不到，这样做等于给潘考夫以永久的否决权。

乌布利希事与愿违，怒气冲冲地走了，他决心粉碎那以前似乎存在着的“布拉迪斯拉发精神”。现在获悉，在同一个星期里，他向莫斯科的勃列日涅夫送了一份关于遭到杜布切克拒绝的详细报告。此外我们还知道，乌布利希根据他自己的看法，把铁托同杜布切克在布拉格商谈了什么的“内幕情节”告诉了克里姆林宫。乌布利希断定说，铁托叫杜布切克取消在切尔纳所作的保证，劝他彻底反抗莫斯科。乌布利希说：铁托还劝捷克领袖更加靠拢南斯拉夫在其中起着极为卓越作用的“不结盟国家”集团。乌布利希的黑信继续写道，铁托向杜布切克鼓吹：此时杜布切克在国内外的声望正隆，可以在不结盟国家集团里起很大作用；为什么不邀请几个不结盟国家的领导人到布拉格来举行特别会谈呢？而且，为什么杜布切克不亲自去访问那些不结盟国家的首都，以便获得国外的援助呢？至于华沙条约，已经到了这个组织实行改变的时候，应当和罗马尼亚一起毅然决然地退出。

乌布利希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实行叛变，转向中立，如果同罗马尼亚跟南斯拉夫结合在一起，就会撕碎“社会主义阵营”的心脏——这就是铁托的访问给莫斯科和它的几个盟国所造成的重大危险。乌布利希的这种意见是夸大其词的，可是也许包含着几分真理。更为重要的是，它同别的片断情报相符合，使克里姆林宫的不安情绪愈加增长。

譬如，苏联听说捷克的两个代表团为了取得长期巨额贷款将于 11 月间访问波恩。还听说，为了要求同样的援助，捷克的部长正在作访问华盛顿的初步准备。他们一定也知道，布拉迪斯拉发会谈后十天，即 8 月 14 日，特拉维夫的特使到了布拉格(因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知道这件事)。据说这个特使建议，倘若捷克同以色列恢复邦交，将立即向捷克提供两千万美元的现金贷款。

眼下到了我们把目光转向莫斯科的时候（即 8 月份第二周之末与第三周之初)。那是英美在磋商中作出了“撒手不管杜布切克”的决定的时候。那时起作用的是些什么样的因素，它们又是怎样配合的呢？

这里必须首先指出三个要点。我们只有经常记住谁都不能说他猜得透莫斯科的闷葫芦，然后才能循着正确的途径进行调查研究。第一点，“鹰派”对“鸽派”这种用语因为简便而不得不用，但至少凡有关克里姆林宫的事情就容易发生误解。大概各个苏联人在自己身上同时具有某种程度的“鹰派因素”和“鸽派因素”。问题是，在那个人的身上，究竟是哪一种因素、而且在什么时候占优势。

第二点是，所有苏联领导人从 1968 年春初开始，差不多确实一致认为，当其他一切手段归于失败的时候，必须用武力来打破杜布切克的勇敢而新颖的共产主义世界，这日子也许不久就会到来。不能想象苏联政治局委员中有哪一个人，无论以任何理由，或在任何时候，反对过入侵捷克。争论的焦点倒是“万一不需要动手”和“什么时候动手”。问题在于：一切早已准备就绪的打击，在

下手之前，应当给予杜布切克多少机会。

第三点是，这个打击的确已经在进行。如有必要就用武力打垮杜布切克的那种军事准备，三四个月前开始具体化，7月间刚刚完成。关于这种必要性进行过什么样的讨论，我们无从知道；8月20日下令入侵的政治决策，虽然同上述情况有关，那却是另一问题，可以设想，关于这个决策大概进行过很多讨论。

例如，目前看起来，有根据可以认为，苏共政治局曾经以微弱的多数否决了在切尔纳会谈之前就着手干涉的这一主张，而且东德、波兰、保加利亚三个盟国都希望于7月间给捷以严厉打击，苏联必须同它们"达成谅解"才行。那么，苏联领导机关忽然改变了方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各种一般的因素是极其明显的。构成其核心的，任何时候都是简单的强权政治的因素。因为二十世纪最冷酷的帝国主义大国觉察到它自己受到了威胁。捷克的悲剧，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在一个大国——在这个场合是超级大国——扩张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

其他所有因素虽然也是组成部分之一，但都是非主要的。杜布切克的榜样不仅令人担心会感染东欧的其他地区，而且有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传染给苏联本身的危险（在苏联，主要是对有着强有力的民族主义酵素并拥有四千六百万人口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感到忧虑。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在切尔纳会谈前后一贯地站在苏联"鹰派"的最前列，这决不是偶然的）。

其次，与政治危机密切联系着的经济危机正在迫近。杜布切克关于增加西方借款和西方贸易的计划，令人担心会搞乱东方集团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机构，成为极其危险的先例。

最后，有军事战略的因素。再让捷克军队在对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线的重要地区担当保卫任务，还能放心得下吗？能信得过他们不会把华沙条约组织的机密也交给敌人吗？正如后来苏联的一个高级官员对中立国的一个朋友坦率地说过："我们对于'波希米亚钻石'还能否保持常态——作为我们欧洲防务的基石——已经没有信心了。"

这一切因素，入春以来缠扰不休地萦回在苏联人的脑际。切尔纳会谈之后，又有什么新因素消除了苏联对于入侵的最后踌躇呢？对这个问题唯一似乎有道理的回答就是：从苏联的眼光看来，杜布切克违反了切尔纳协议，已经没有控制局势的力量，因而再不能寄予希望，无从加以挽救了。

可以认为，这个推测于8月危机期间已为苏联报纸的言论所证实。苏联报纸的言论，对了解捷克那场历时甚久的戏剧性事件，经常是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每每具有绝对的可靠性。苏联领导人结束了同杜布切克的会谈回国后的几天内，在莫斯科，人们欢呼布拉迪斯拉发会谈是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和谅解的胜利。那以后的几天，出现了对布拉迪斯拉发会谈的完全沉默。这是正在进行重新评价的不祥的预兆。接着，不久就到了8月14日，苏

联报纸攻击捷克的宣传重新开始，其激烈程度同切尔纳会谈之前一模一样。

报纸的一致攻击

《文学报》① 谴责捷克作家协会的机关报《文学日报》"破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项原则，对苏联进行粗暴攻击"。同一天，苏联军队机关报《红星报》不满意地写道："在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怀有敌意的危险倾向正在扩大"；军方声明"已作好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党与人民的准备"；它主张"东欧防务不可分割"，这与威胁毫无二致。8月16日，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再一次亲自参加了这场喧嚷。② 直到四天后入侵的那一天，报纸的攻击一直未停。

在8月第二周和第三周的关键时刻杜布切克所犯的"罪过"中，有所作为与无所作为两者都有。在他的"罪过"中，例如有这样一桩：8月16日同他的东方集团的叛逆伙伴——罗马尼亚签订了《捷罗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与东方集团各国间所缔结的其他各种条约不同，捷罗条约耐人寻味地省去了历来对波恩的一切攻击。事实上，它根本没有提到西德。同时，捷克政府虽然否认了要求

①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机关报。——译者注

② 8月14日苏联《真理报》就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不要夸大"民族的特点"。当时驻莫斯科的一个外国记者指出："这篇文章没有指名提到捷克斯洛伐克人，但是，在捷改革派领导人同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最近举行会晤之后，这篇文章针对的目标是不会弄错的。"——译者注

世界银行贷款的消息，但承认正在考虑分别向几个西方国家借款。① 这一切，使人觉得是证实了乌布利希的忧心如焚的警告和克里姆林宫本身的忧虑。

然而，甚至比杜布切克做过的事情更严重的是，自布拉迪斯拉发归来后的两个星期内，他对某些该做的事情却漫不经心。捷克报纸的反苏论调虽有所缓和，而要它成为莫斯科所期望的沉默寡言的共产党机关报，还是远远地不够。由于西方报纸（除了例外的一两家）继续交口称誉“杜布切克的胜利”，继续撰写鼓舞人心的文章，谈论在自由捷克斯洛伐克前途上所展开的光辉道路，苏联对于这一方面的神经过敏症就越发厉害了。

至于众所周知的“人事上的保证”——按照苏联方面的理解，这意味着把两三个极端反苏的批评者撤职，至少在捷克斯洛伐克所有的党的机关里保留一定比例的“保守派”——则毫无动静，完全未加实施。任何一个具有真正重要性的人物，杜布切克都没有把他从有权有势的地位上拉下来。关于捷方的未来计划，苏联方面得到情报，说杜布切克打算从捷克军队、国内行政部门、外交部门以及党的领导机关中肃清旧诺沃提尼派分子。据说，已经拟出了一份一千二百名以上将被赶下台的旧保守派干部

① 据美联社 8 月 18 日发自维也纳的电讯，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切尔尼克于前一天接见奥地利电台的记者时说：“他们国家准备从世界银行以及从象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奥地利这样几个西方国家谋求贷款。”19 日捷通社发表声明，否认切尔尼克说过捷准备向世界银行借款，但承认他说过“捷克斯洛伐克有些公司对于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公司得到贷款以便提高生产率的可能性感兴趣。”——译者注

名单，其中包括大约两百五十名高级军官，并决定于10月1日前清洗完毕。斯洛伐克和捷克斯洛伐克两个党代表大会，决定在原定日期(8月26日与9月9日)之前召开，选出新的领导成员，因而不难想象，苏联的急躁是更加厉害了。如果要予以打击，就必须抢先一步在它们选举之前动手，这个打击不能光是对选举作出的反应。

于是，8月中在克里姆林宫进行了最后的讨论。各个出席者的立场是怎样的呢？首先来看一看军人。代表苏联军队的最高将领是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和华沙条约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基于上述战略理由，他们的态度的确与其算是“鸽派”倒不如算是“鹰派”。据说早在4月间于莫斯科举行的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他们就已经向文官同事们强硬地发表了如下令人不快的声明：“大家给了我们保卫祖国的特定任务。除非叫捷克跟着我们一道搞，这个任务我们就再也不能保证很好地完成。”

危　险

然而，正象西方当时所断定的那样，并没有证据表明在这次最后的讨论中，是元帅们对文官发号施令。纵然是在元帅们的声望和势力达到顶点的1945年，苏联的领导机关中也没有那样迹象。恰恰相反，有一些证据表明，苏联军界的所有高级将领虽然都认为使杜布切克就范很有必要，但对于入侵却有某种程度的担忧。传说一部分将军觉得，“这对于苏联军队不是适当的任务”。还有人警告说，把那样一种倔强的“兄弟人民”作为敌人来打，这

种经历也许会使千千万万的苏联军人在思想上受到沾染。——这个警告真是说对了。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元帅们权衡得失之后，终于支持了8月20日的强袭。

关于政治局本身，关于它的各个委员所采取的立场，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在西方听到真正重要的政治上反正人员的交代（不象会有这种事情）、或者在克里姆林宫的档案保管库的门打开（更不象会有这种事情）以前，我们只有满足于极度紊乱的谜一般图画的断片。

关于这个问题，从我们所能指望其足以信赖的方面，得到这样两份情报的片断：第一，苏联领导人从布拉迪斯拉发回到莫斯科以后，正要宣传会谈获得成功的时候，遭到来自党的中层和地方干部的未曾预料到的坚强抵制；第二，先前苏联最高领导机关中摇摆不定的两票转而支持武装干涉，现在它就决定了杜布切克的命运。

“强 硬 派”

在周末的连续讨论之后，8月19日（星期一），孕育着重大危机的四十八小时是以十一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会议开始的。据说，在这个会议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再一次站在稳健派——就是说，他们赞成于进袭前再给杜布切克一些时间——的前列。柯西金主张，为了不妨碍当时在审议中的同约翰逊总统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建议，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以延期为宜。照柯西金的想法，苏联从这个会谈所得到的东西会有很多，利

用美国总统选举前的形势是有好处的(事实上苏联对约翰逊的邀请是 8 月 19 日、即苏联坦克开始冲向杜布切克的日子的前一天发出的)。

集合在柯西金背后的人物中有:沃罗诺夫(他是比较没有势力的)、苏斯洛夫(人们认为他最担心这场入侵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影响)、谢列平(人们认为他对杜布切克的许多有关经济效率的论点具有深刻的感受)。

差不多可以肯定,强硬派之中包括: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他对于由莫斯科培养起来的、今春以前还是可靠的捷克年青领袖如今破门而出进行"反叛"感到愤怒;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他极端害怕故乡基辅会沾染上从共同边界那一边渗透过来的捷克"病毒"(事实上,根据某一情报,谢列斯特警告过他的同事们说,假使不迅速收拾捷克的"自由主义",就不能保证乌克兰的安定)。

有两个人在那时以前态度暧昧,而由于他们的发言打破了双方力量的均势,使会议作出了赞成立即入侵的决定,这俩人是谁,现在还不晓得。然而,根据可靠的情报,柯西金在政治局会议上遭到失败以后,企图在取得"批准"的口实下再度讨论那个决定,要求召开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得到了同意。不过,8 月 20 日由一百九十五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开会时,全会也赞同进行干涉。

无论如何,在中央委员会里,"鹰派"常常比在政治局

里更占优势。据说勃列日涅夫在这重要的最后一次讨论的时候，首先指出杜布切克的政策正在逐渐助长西德的威胁，打算以此来拉拢中央委员们。在这件事情上，瓦尔特·乌布利希、尤其是上一星期他的忠告和策动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他本身并不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但乌布利希把当前苏联的广大人民及其许多领导人物所最敏感的事情，即对波恩“复仇主义者”的恐怖心理，趁机加以利用。

8月20日（星期二）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稳健派”无能为力了。假如同一天杜布切克作出了一些漂亮的亲苏行动或姿态的话，也许在最后一刹那，推迟动手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可是他没有作出那样的姿态。全会结束一两个小时之后，雅库鲍夫斯基元帅获准发出了将一切准备亭当的联合入侵付诸实行的密码命令。

“鹰派”害怕全会的决定被推翻，马上就行动了。他们的急躁作法有助于说明后来在布拉格相继发生的许多政治混乱的情况。

在讲到那个问题以前，我们来看看西方那时候在干些什么。入侵对于所有的西方领袖都是一桩意外的事情，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怎么会产生那样一种局面呢？是西方军事谍报犯了大错误了吗？还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基于错误的政治估计而高枕无忧，以致遭到这个意外的呢？

这一部分情节能够相当完整地原原本本说出来。而且，它提供了许多值得反复思考的材料。就我们所能

知道的，西方的军事谍报观察了那年春天以来苏联军队逐步增强兵力的各个阶段，正确地估量了它们（只有当初过低估量了预定为6月间“演习”而动员的苏联军队的实力这件事除外）。事实上例如某个当局说，苏军在第聂伯地区进行大演习的2月末，已经早就看出了最初的危险预兆。那个人说：“那次演习不知怎么有些值得忧虑的地方。它完全不是针对西方，而是针对着南方。”所谓南方，大概是指捷克斯洛伐克吧！

苏联和几个盟国在准备联合军事行动的情报，在5月和6月的整个期间频频传来；对那些情报的判断，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几个主要国家之间有显著的差别。那时候西德已经预见到重大的危险。美国人也许受了约翰逊为圆满结束其总统任期而全力争取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影响，愈加抱着怀疑的态度。英国人也照例“十分沉着”。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致的军事估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那是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谈以后的事情。苏联跟波兰与东德两个盟国一起，于布拉迪斯拉发会谈之后立即又在捷克斯洛伐克边界进行演习，这对北大西洋公约各国殊出意料之外。“这只不过是为了继续对杜布切克施加压力”，这是布拉格以及大部分西方国家的一厢情愿的反应。

凶 兆

然而西方谍报机关对于8月初这些演习的专家估

计，跟上面讲的有很大不同。那时他们第一次报告说，不论如何浮想联翩，都不能认为那些军队的移动是伪装的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演习。现在连伪装也丢掉了，战线全都伸向南方。而且，从最前线的工兵突击部队到后卫堆集如山的补给站等等，这些实际进行中的军队部署，暗示了初期的行动。东德的铁路错车线上集中了五百多节运输坦克的车皮（坦克在开始执行任务时为了节约燃料和人力，由货车运到行动现场），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整个期间，苏联的将军们极为忙碌，令人觉得异乎寻常。8月9日，格列奇科和雅库鲍夫斯基两元帅，由杜布切克的公开敌手之一——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大将陪同访问了明斯克。① 8月15日，这三个人到东德去出席参谋会议。之后，他们巡视了华沙条约部队的北方方面军；8月16和17日两天，同波兰的将军们开了会。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来说，这些动态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说是吉兆。

最后的警告是入侵前一周的周末传来的。据宣布，苏联、波兰、匈牙利三国即将举行通讯部队的联合演习。② 但西方的观察家们那时很快就发觉：飞抵华沙和布达佩斯的苏联军界各部门的高级将领，几乎或者完全同通讯会议没有关系。

因此，8月第三个星期开始时，很多紧急信号火速发

① 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首府。——译者注

② 匈牙利通讯社于8月15日（星期四）即已宣布“匈牙利和苏联的通讯部队将在匈牙利举行联合演习”。——译者注

到西方国家的各个首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比利时的总部。不过，它们全都是纯粹的军事信号。关于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如何在进行的有价值的情报，在那一周间，连片纸只字也没有发到西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既得不到那种情报就只能靠想象来帮忙，而它的想象跟差不多所有的人一样，也出了差错。

对于8月间苏联的加强战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①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时刻都在研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理事会和各个专门委员会(防务计划、政治、情报交换统筹等委员会)事实上在所有的会议上都作了讨论。它们的最后结论总是几乎相同的。苏联和它的几个盟国正在愈来愈加强它们军队的临战态势，以便随时可以袭击布拉格。然而，显示这种时刻业已来临的征兆却什么也没有。于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跟杜布切克一样，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争取到了几个月延期动手的时间。对于西方算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并不是克里姆林宫的军事准备，而是它的政治决策。

入　侵

究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多大程度上感到突然，我们从下面两件事情也可以推想得出来：华沙条约部队由8月20日到21日入侵的那一晚上，理事会秘书长布罗西奥还在休假之中，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兰尼兹尔甚至到了

① 这是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最大的军事指挥机构，原设巴黎，1967年迁往布鲁塞尔。——译者注

人们料想不到的离行动现场如此遥远的萨洛尼卡[①]去。另一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重要人物，本来打算乘那天早晨的渡船去英国，为了听听天气预报搞清楚海峡是不是有风浪，开了收音机收听比利时广播电台的清晨广播。

天气预报没什么问题，可是接下去的简明新闻却不对头了，它说："布拉格的广播宣布，20日晚上23点，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②]

那位官员慌忙换了衣服，丢下旅行用的行李，驱车赶到布鲁塞尔飞机场公路旁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崭新的司令部。这时，大楼里已经灯火辉煌了。

---

① 地处希腊北部濒临萨洛尼卡湾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② 关于入侵的国家，美联社8月21日发自布拉格的电讯说，"布拉格电台今天宣布：苏联、波兰和东德的军队……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这就是说，当时布拉格电台没有提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但捷通社同日发自布拉格的电讯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8月21日在《红色权利报》号外上发表的声明说，他们国家遭到苏、波、(东)德、匈、保五国军队的侵犯。——译者注

第三章　闪电式的入侵

现在我们也知道，这次入侵是以神出鬼没的欺诈开始的——那一套诡计说明了苏联政治上的寡廉鲜耻以及他们军事准备的完善程度。

8月20日夜才过11点，有一架苏联民用客机（据某一情报说，由一架波兰客机伴随）飞近布拉格的鲁齐内机场。根据捷克航空主管机关事前得到的通知，那架客机的飞行计划只不过是经过捷克首都的上空而已。

苏联飞机经过布拉格几分钟以后，开始向鲁齐内发出信号，由于机器突然发生故障，要求准许紧急降落。机场的交通管制官员用无线电答复同意。他们就是有什么疑问的话，那也难以拒绝的吧。鲁齐内是国际机场，苏联飞机请求帮助，按照国际惯例是不能不答应的。

所以，飞机的降落得到了许可。苏联飞机一安全降落，就直开到机场新房子的玻璃门面前，跳下来的不是手提行李、高高兴兴的乘客，而是几十名挥动自动手枪的苏联突击队员。他们马上占据了空中交通指挥塔，没过几分钟，装载着坦克的苏联第二十四战术空军集团军的巨型安东诺夫式运输机群的头一架就被引导降落了。这个机场还来不及发出一声警报，就落入了“兄弟般的”敌人手里。苏联的类似策略，大概也用来去占领布尔诺、

俄斯特拉发、布拉迪斯拉发和其他主要的地方机场，虽然我们没有掌握象鲁齐内机场事件那样的详细证明。熊是首先象狐狸那样开始行动的。

以后就不再需要搞阴谋了。花了长时间准备的苏联的强袭，用它的全部压力和速度来做剩下来的事情。在布拉格，从半夜以前开始，安东诺夫式运输机以一分钟一架的速度降落下来，吐出坦克、炮、卡车等新的军需品；苏联的军事接管于 8 月 21 日拂晓以前就完成了。

鲁齐内机场距市中心只有六哩，公路一直是下坡的。但是，即使在这里，苏联的军事计划负责人丝毫也不掉以轻心。驻布拉格苏联大使馆的公务汽车，成了进犯部队的向导，把他们带到主要目标——横跨伏尔塔瓦河的桥梁、斯沃博达总统在赫拉德查尼堡的官邸、捷共中央大厦、政府主要各部的大楼、邮政局、布拉格广播电台、特定的捷克军事设施，等等。

布拉格市民是起床很早的。可是 8 月 21 日他们走上街头时，这个城市早已紧紧地掌握在苏联手中了。大部分市民或者收听广播，或者听着隆隆作响的坦克、震耳欲聋的警笛和汽车喇叭的噪音，已经意识到他们正遭受着侵略。没有人打算进行有效的抵抗，这也是不可能的。斯沃博达将军作为阶下囚的总统，通过那天清晨的首次广播，向被俘虏的国民呼吁不要反对侵略者，也不要因激动而采取无益的对抗行动，因为他认识到在军事上形势已经绝望。

斯沃博达的文告在广播的时候，边界的一切门户都

被踢开了，苏联人和他们手下的行政官员，已成了全国各地的军事主人。人们认为苏联在这场闪电战的开头大约使用了二十五万的兵力(连同接着投入的总兵力也许共达五十万，这就达到了每二十六个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有一名侵略军士兵的比例)。

为了封锁捷克斯洛伐克和西德的边界，主要的进军是由北而南，部队在几个星期以前就已集结在东德。这个最重要的战区，交给苏联的四师精锐的机械化装甲部队，他们从卡罗维发利穿过捷克国土，经比尔森向捷克-布迭约维策挺进。跟着，苏联边防军的第一机械化装甲警备军的司令，在距离西德边界正好四十哩的比尔森设立了该军司令部。

另外四个师的苏联机械化装甲部队和一个师的苏联伞兵部队，则由北波希米亚向南进军，包围了布拉格。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全苏陆军总司令伊凡·帕夫洛夫斯基大将被任命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占领军司令，他的参谋部和这一支进犯部队是同时到达的。帕夫洛夫斯基把他的司令部设在布拉格。

上述苏联的主要进犯部队都各自随带东德军队一个师：第一支部队配备了德累斯顿的第十一机械化师，第二支部队配备了也是驻在德累斯顿的第七机械化师。这是明显地违背了战后四国关于德国问题的协定，自 1945 年以来第一次德国军队重新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作战。这是捷克人特别痛恨的侵略的刀光剑影。苏联方面懂得它的行动的非法性质，尽量使德国军队避开捷克人的耳

目。而且，克里姆林宫担心西方会发出强硬的外交反应，不久又急急忙忙地把乌布利希的军队全部撤走了。

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中部的不那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波兰、苏联部队混合编成的四个师，他们继续进兵，占领了赫腊德次-克腊洛佛、阿罗木次、俄斯特拉发。但是，苏联军事计划的制订者们对于斯洛伐克，没有让任何事情听其自然演变。因为他们知道，那里的反苏情绪比捷克更加强烈。苏联的四个师由乌克兰向捷克斯洛伐克的北部和东部前进；同时，另外的苏联四个师的一部分部队和匈牙利军队的两个师，从匈牙利向北进军。在维也纳东面约三十哩的匈牙利-奥地利边境附近，几天前开始集结的强大的机械化装甲部队浩浩荡荡地在公路上迅速前进，目标在于占领斯洛伐克的首府——布拉迪斯拉发。一个目击者的报告说，他们的坦克以三十五哩的最高时速冲进还在沉睡着的布拉迪斯拉发，撞倒了街上的路灯柱子，碾碎了停着的汽车。

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军队所起的作用比较小。匈牙利本国处于苏联的占领之下，主要是提供了辅助部队和渡河装备。保加利亚为着对这场入侵担当一些象征性的任务，派了一团兵从海路到敖德萨，从那里就不得不用火车经由匈牙利运过去。

到了21日傍晚，帕夫洛夫斯基将军就能向上级报告说，惩戒捷克斯洛伐克的任务已经完成。尽管克里姆林宫在政治上有所顾忌，而参谋部花了几个月时间缜密制订的计划却在扎扎实实地进行；苏联军队实践了叶皮谢

夫大将最初所说的随时出动去援助“忠诚的”捷克斯洛伐克同志的诺言。然而，如今问题是那些忠诚的同志究竟是谁，在什么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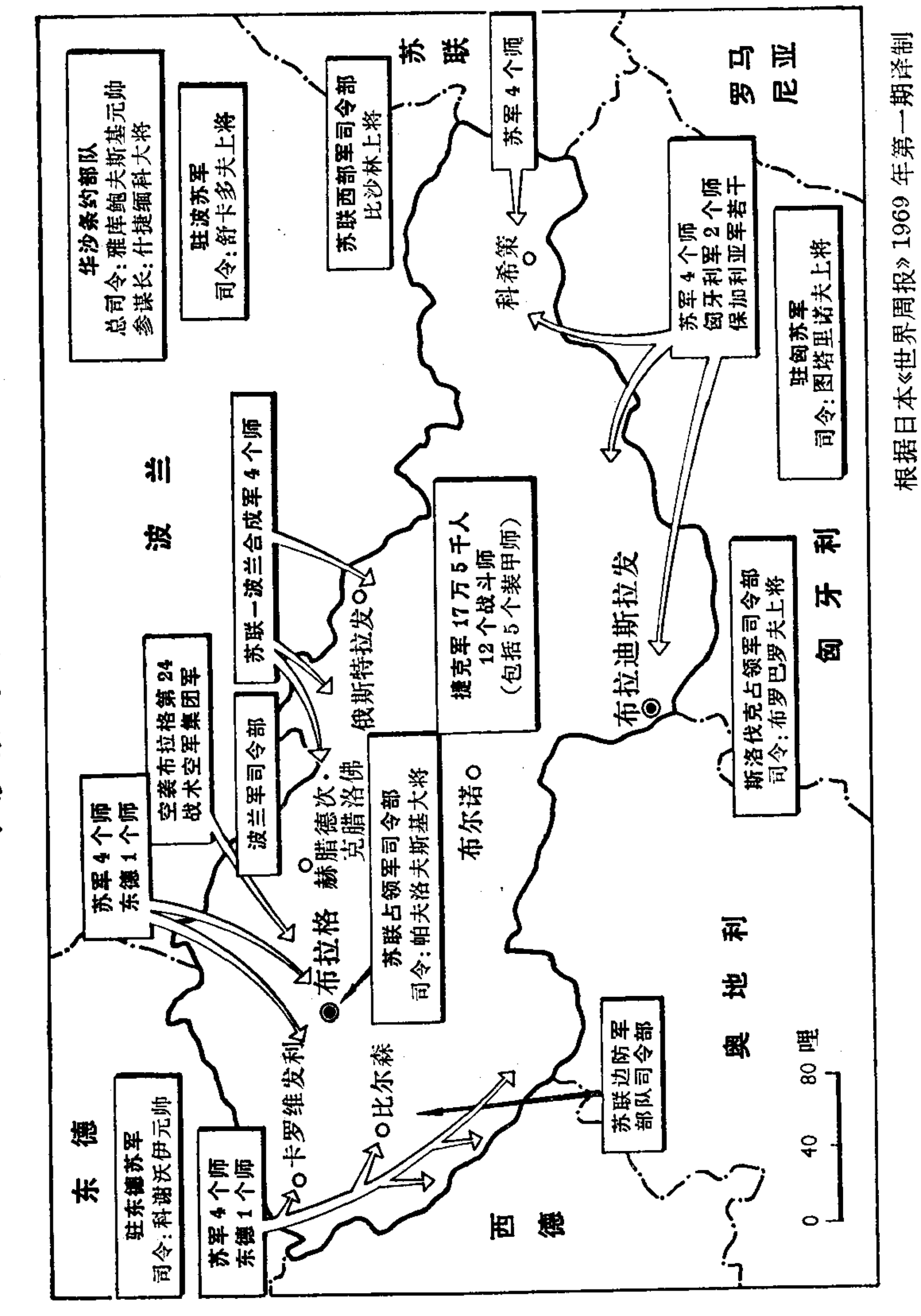
苏联的失败

正如人们所常说的，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闪电式占领，虽然是一种军事胜利，在政治上却是全盘的失败。假如我们在那历史性的8月20—21日的夜晚，暂时把视线从布拉格街头的战争轰鸣，转向唐宁街十号①的值班室的安谧，那么，就能更好地判断这次的失败该是多么地彻底了。

半夜时分，苏联大使馆挂来的电话打破了盛夏夜间首相官邸的平静。据说，苏联大使米哈伊尔·斯米尔诺夫斯基，为了立即递交本国政府给威尔逊先生的紧急私信，准备访晤首相。首相那时正在休假期中，到英格兰西南面的锡利群岛去了，他在那里的别墅里被人喊醒起了床，听取了那个消息。

同其他的西方领袖一样，首相对于业已临近的危机没有丝毫预感。克里姆林宫屡次为了纯粹的宣传目的利用它的驻外使节。“紧急私信”可能是共产党对西德进行新的攻击，或者是关于合作开发宇宙空间的提案，总不外乎是这类问题。不管是什么事情吧，威尔逊在康沃尔郡的海岸边，在睡衣外面披了一件晨衣的情况下，他是没法子亲自接待了。于是，首相告诉值班的官员，去找当时在

① 英国首相的官邸。——译者注



根据日本《世界周报》1969 年第一期译制

伦敦的外交和联邦关系部长之一的查尔方特勋爵，请他代表首相接受那份书面通知。

查尔方特勋爵换了衣服，在坐落切尔锡①的住邸里作好接见苏联大使的准备时，已近凌晨一点半了。斯米尔诺夫斯基先生亲手交给他的信件，一定使这位勋爵回想起1964年以前在报馆担任国防问题记者时的生活。在堆砌了一大堆圆滑的、和缓的字里行间，插进了华沙条约部队刚刚进驻捷克斯洛伐克的粗暴通知。相同的信件同时送达华盛顿、巴黎和其他各国首都。

就这些关于入侵的郑重通知来说，有趣的是为苏联行动辩护而端出来的借口——至于苏联最主要的是企图借此要缓和世界的舆论，这里就不去说它了。这些深更半夜的外交通知说，是"捷克政府"请求华沙条约部队进驻的。

可是，黎明前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改变了"捷克政府"请求的讲法，说是请求苏联和其他盟国"向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提供援助，其中包括武力援助在内"的，是"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那些"领导人"是谁呢，当时和以后从来都没有发表出来。不但如此，苏联为了掩盖这个问题，言词更为暧昧，不久就根本不再提到所谓"请求"问题了。

对于这种荒谬可笑的混乱，只能够从这一点来说明，就是说克里姆林宫实际上期待过在入侵的当晚由布拉格

① 伦敦有切尔锡路、切尔锡桥和切尔锡堤，估计这里指的是通向泰晤士河上切尔锡桥的切尔锡路。——译者注

新成立的傀儡政府提出援助的正式请求。可是，到那时候一看，组织傀儡政府一举却未能付诸实行，他们连这个决心也没有。

苏联军队入侵的那一天，即8月20日下午两点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十一名成员为了举行事先商定的会议到布拉格党中央大厦开会时，可以称为极端可恶的库比斯林事件① 就开场了。下面的记述，主要是根据某个共产党官员后来关于那漫长一天的事态发展所作的报告。那个官员虽然不是整个会议进行过程中都在场(会议中间不休息，连续开了十二个小时以上)，出出进进会议室好几次，但是长时间待在那里，耳闻目睹了所发生的事情的大部分。

午餐后主席团会议一开始，有两项列入议程。第一，由于杜布切克的要求，规定议事日程首先讨论向即将召开的党的临时代表大会作的报告和提交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

第二项是上一次主席团会议遗留下来的议题，它的内容如何就更不清楚。它包括了“各种问题”，都是规定由党中央书记之一的阿洛伊斯·英德拉作为专门“研究委员会”的委员长提出建议案的。(英德拉和科尔德、比拉克、什维斯特卡一起，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内形成了亲苏、“反自由主义”的少数派。现已获悉前两人最近长时间访问了莫斯科，得到了鼓励和指示。)

杜布切克一开始发言，科尔德马上提议改变议程的

① 未查到出处，意思不明。——译者注

次序，先审议第二个议题。这个动议被否决了，结果主席团会议到了傍晚很迟的时候“英德拉报告”的讨论还没有开始（这打乱了苏联政治阴谋的时间表，是对它的计划的最初打击）。

过了不久英德拉提出来的东西，并不是该委员会的一份合理的报告（事实上他甚至没召集委员会开过会），而是他和科尔德共同写成的长达十五页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虽然不过名曰“意见书”，却由两个执笔人提出来作为主席团应予采纳的党的路线的基础。它几乎是露骨的向莫斯科屈膝投降，等于是全部放弃杜布切克在切尔纳所赢得的东西。譬如，其中有一段声称：在攻击杜布切克政权的著名华沙信件上签名的、怀有敌意的五国政府，提请捷克斯洛伐克注意国内存在“反革命”的危险，这是正确的。

上述那位官员（他是这个插曲的主要目击者）又回到会议室时，正好听到切尔尼克总理（杜布切克的忠实支持者）驳斥英德拉、科尔德，说他们的提案是一种“背叛行为”。然后开始了热烈的争论，英德拉一派为着硬要制造一场政治危机，竭尽了全力（例如，比拉克于晚间十点三十分开始讲话，对杜布切克进行了人身攻击，说他“滥用自己的声望”）。

亲莫斯科派明显地试图在苏联军队从外部颠覆杜布切克的那艘船以前，先从内部来动摇它。然而，英德拉的少数派低估了杜布切克地位的力量。首先，他们的失着在于，在这关键时刻，他们着手这回破坏性的尝试已迟了

几个钟头。

关于杜布切克个人威信的讨论还在继续当中，切尔尼克几次离开房间去接电话。晚上十一时四十分，他最后一次回到会议室来。他面色惨白。切尔尼克告诉主席团："那五个国家的军队越过了我们的边界。他们要占领我们的国家。"

叛　　徒

要是有人说需要拿出英德拉、科尔德、比拉克等人同莫斯科合伙行动的证据，那么，这就是一个：他们——据目击者说——对于切尔尼克的报告一点也没有露出震惊或者诧异的迹象。其他大部分人惊惶失措，吓得说不出话来。

杜布切克自己不知不觉地叫喊："我以共产党员的名誉起誓，做梦也没料到有胆敢对我们采取这么卑鄙手段的家伙！"接着他大声念了头天晚上刚刚收到的勃列日涅夫来函。那封信又把先前听惯了的莫斯科的责难完全重写了一遍，可是哪儿也没有苏联打算动武的苗头。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的见证人为了种种事情不得不屡次出出进进那间房间。但是，杜布切克用意外的沉着使混乱的会场镇静下来，叫人起草将在无线电广播和翌晨报纸上发表的声明原稿。英德拉悄悄地从房间走出去，杜布切克立刻把他叫回来。

对于声明的讨论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这给了英德拉集团凭着公开的斗争来攫取权力的最后机会。他们失

败了，但如今这已是无关紧要的了。同一天清早刊登在捷共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号外上的那一个声明，保证忠于杜布切克，号召人民“镇静和谨慎”。主席团成员中有四人——科尔德、比拉克、里戈、什维斯特卡投票反对这个声明。英德拉作为中央委员会书记没有投票权，但他的立场是无可置疑的。

对于杜布切克来说，主席团会议简直是一派紧张形势，而后来晓得，广播那篇声明则更加困难。声明拟好已经到了凌晨一点三刻，离布拉格广播电台关门只有十五分钟。写着声明的那张纸，急急忙忙被送进播音室，一点五十五分开始广播。

发出隆隆巨响、由鲁齐内机场开下来的苏联坦克，还没有到达广播电台大楼，但是，他们在电台里头有自己的同伙。按照报刊和新闻管理局局长[①]卡尔·霍夫曼(诺沃提尼时代曾任部长)的命令，这个广播没等播完就被截断了。

没能够通过“合乎宪法的”手段使杜布切克丧失声望和垮台的苏联，眼前成了捷克首都的有形的主人，这一回它使用的是诡计和威胁，企图赶走杜布切克。入侵的第一天，即8月21日清晨，英德拉登上赫拉德查尼堡面晤斯沃博达总统。英德拉由两个强有力的同伴陪同。陪着他的，一边是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另一边是苏联占领军司令帕夫洛夫斯基大将。英德拉拿出一张纸，说那是切

① 按捷政府建制，设有报刊和新闻管理局，日译文则译为“通信局”。——译者注

尔尼克签了名的总理辞职书。接着说，总统应当接受并委托英德拉组织新内阁。

斯沃博达这个字意味着“自由”，在这次事件中他照自己姓的字义行动，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怀疑那个文件是否伪造(事实上后来了解它是伪造的)的捷克总统表示，总理的辞呈只能从他本人手里收下，今后有关未来捷克政府的事情，他亲自直接同苏联领导人谈判。这样一来，克里姆林宫的政治阴谋就归于失败了。

苏联的失算还不只这一桩事情。8月21日同一天，捷克政府和捷克国民议会追随党中央主席团，直言不讳地指摘苏联军队的入侵。政府声明谈到几个盟国的军队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干的“侵略行为”，从而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其可悲的空前未有的事件。国民议会直截了当地提出抗议，谴责苏联的行为“违背了国际法、华沙条约的规章以及各国间权利平等的原则”。

苏联军队当时正包围着国民议会的大楼和所有政府机关的办公大楼，然而他们却听任捷克方面一份一份地写出声明去发表。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也许对莫斯科有利。

军队在挨饿

苏联军队看见捷克斯洛伐克全体人民抱有如何坚强的决心支持他们的总统和领导人，只会越来越面红耳赤。那时，捷克自由电台已经巧妙地开始了地下广播，而当

苏方好象要逮住它的时候，它马上转移到了另外的秘密地点。全体人民受到这个电台的鼓舞，想方设法向侵略者表示抗议。路标变了方向，村镇改了名称，苏联部队被引入迷途。

正如苏方自己抱怨的那样，没人给占领军“一片面包”。事实上，捷克人按照占领军所管不着的电台的意见，连狗和猫都锁在家里不让它们出去。为的是不能引起空肚子的苏联兵的食欲。过了不久，许多苏联兵陷入这样的苦境——只好生啃田里的马铃薯，从树上采下的蘑菇连煮也不煮就吃了。

在入侵前举行的大讨论会上，有一部分苏联将军所表示的担忧，现在看来是对的。苏联军队的士气急剧地下降，许多被“毒化”的部队或被调走，或被替换。杜布切克将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感到自豪吧——就是说，倘若他身在祖国，能够看到这一切情况的话。

下面所叙述的情节，在整个捷克悲剧中恐怕是最难以忘怀、最不能饶恕的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比侵略本身更令人厌恶的事情。谈到侵略，克里姆林宫最低限度也得是地地道道的霸权政治的典型，但它总还能够提出什么所谓保证国家安全的借口。而下面的报道，却是在坦克扫荡布拉格街道的那天晚上，发生了苏联劫持杜布切克及其同志们的事件。

我们说那个事件之所以确实混帐透顶，同它是否使用了暴力倒没有多大关系（反正几乎没有找到使用暴力的确凿证据），而是在于那种行为具有真正不人道的性

质。老共产党员只不过是克里姆林宫棋盘上进进退退的“卒子”，照它每天的市价，从人变成非人，然后又变回来成为半人。正是这种冷酷无情的对人的尊严的蹂躏，使杜布切克自己在就任最高领导职务时心里准备加以改正，保证实现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化”。

杜布切克和他的四个主要支持者，已于8月21日清晨在布拉格被逮捕，三天后重新出现在克里姆林宫，这使他们自己和全世界都感到非常惊讶。在这三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下面的记述，就是关于那个情况的最早的翔实报道。说这个情报的出处不外乎是那些遭难者自己，未免是一种贸然的论断。有时直接的情报来源是第二手，另有许多场合则不过是第三手。但是，即使是一个一个孤立的情报，假如把它们彼此参照研究，那么就可以把主要的几个情节都搞清楚了。

三辆苏联装甲汽车开到布拉格党中央大厦外面，杜布切克和他的几个朋友一直在那里进行着磋商，这是8月21日破晓前的事情。

把装甲汽车带到那里来的，是苏联大使馆的黑色“伏尔加”牌轿车，即使那不是把侵略军的坦克从机场引入市内的同一辆车子，也是同那类似的。逮捕杜布切克的苏联军官说——如果我们重复他们的原话——他们是“以阿洛伊斯·英德拉的革命政府的名义”这样做的。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头号犹大① 的本性多少有点儿迟疑不决的

① 耶稣基督的十二个弟子之一。他为了三十个银币把耶稣出卖给祭司，因而后世人们把可恶的叛徒叫作“犹大”。——译者注

人，听了这句话，总可以打消他的疑团了吧。

被隔离的捷克领导人

苏联人叫那几个遭难者挨着墙壁站了很久(在那儿站了“三四个钟头”的说法大概是夸张的)，然后推进装甲车，直送到鲁齐内飞机场。他们在那里等了不一会儿，就被赶上运输入侵部队的一架巨型的安东诺夫式运输机。有人说因为囚犯们吵闹，所以苏联兵用枪托打，强行把他们赶进飞机，这也许是真的，但我们未能得到证实的情报。

那架安东诺夫向北方飞了“两个小时左右”以后，降落在似乎是波兰境内的某个军用机场。杜布切克那时已被隔离，跟其他同伴不在一起。还待在一起的那些人——总理切尔尼克、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党的高级干部克里格尔与西蒙——则被禁止互相交谈。

机场“接待委员会”的头头是苏联高级军官，他既没询问什么，也不告诉他们任何消息。他们这一小群人分别被带进一间小木屋禁闭起来。至于食物只有一片面包和意大利腊肠；给了他们水作饮料，却不许洗脸和剃胡子。他们被完全隔离了四十八个小时，根本不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事情。

过了三天，没有听到任何说明和解释，他们就被装上苏联的军用汽车送到和先前不同的飞机场，搭乘另一架军用飞机向东南方向飞去。后来在乌克兰降落。

起初这里的食物和其他条件也同从前一样是原始的

(说他们被投入猪圈里弄得满身污秽，这大概也是夸张的讲法)。然而，第二天早晨食物的配给数量突然增加。准是在哪儿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

正在那几个人的好奇心逐渐增长的时候，他们又一次被带上飞机——这一趟是伊柳辛-18型——飞往莫斯科的谢列梅捷夫飞机场。他们看到前来迎接的不是装甲汽车而是舒适的民用轿车时，好奇心越发强烈，而当他们被带到莫斯科郊外树林中供假日住的舒适别墅时，就更加疑团莫释了。

但是，世界真正又颠倒过来，这在别墅里首次进餐时得到了左证。自从离开布拉格，他们初次吃到热食，那一餐是从一道汤开始的。不仅如此，伺候他们的苏联士兵问道："要哪一种葡萄酒——红的呢，还是白的？"看守忽然变成了侍者。究竟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时候他们才获准在公用卫生间里洗脸、洗澡、刮脸。全部"客人兼囚犯"被带到那儿；杜布切克第一次能够在那里同他们一行人中的其他人碰头。在那以前，他遭到禁闭（在各方面都受到更加侮辱性的待遇），跟同伴们隔离开来。然后又被人为了同样谜似的目的，用另外的飞机带到莫斯科。对于此行的目的，他们只好任凭自己去胡思乱想了。

过一会儿，杜布切克在洗脸盆①前和一个同伴并排站着的时候，愤愤地私下里说："我要是带着手枪的话，那时就当场自杀了。我为了共同目标贡献了一生，现在那

① 那是装在墙边的西式洗脸盆。——译者注

些家伙竟然对我干出这种事情!”接着，杜布切克头一回显然是晕倒在地板上，这时在他的前额上就出现了一块伤痕。

勃列日涅夫破口大骂

谜，逐渐弄清楚了。当捷克领导人把身子搞得相当整洁的时候，就用车子把他们一直送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他们在一个房间里等了一会儿——仍然被禁止交谈。那时门开了，勃列日涅夫走了进来。他没讲一句寒暄的话和一句开场白，刚跨进门就破口大骂那几个人的背叛行为。勃列日涅夫不久又走出房间，捷克人——决不是全体在一道，而是个别地，或者一次两个人——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去给苏联领导人“讯问”。

切尔尼克总理拒绝主动同那种可耻的事情沾上边。传说他独自搞“静坐示威”，甚至坚持说如果要把他带走，那就干脆让人抓住他的手脚拖到法官面前去。

在一次预备性谈判的会见中，勃列日涅夫把一份“不受欢迎的人”——苏联方面希望清洗出捷克政界的那些人——的名单端到杜布切克的鼻子跟前，要他签名。杜布切克只念了两三个人的名字，就把那份名单顶了回去。“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他绝无仅有的一句批评。苏联企图“软化”囚犯们的尝试终于失败，在这以后，才开始了认真的谈判——假如胜利者要失败者全盘接受他所开的条件可以叫做谈判的话。

捷克领导人(只有克里格尔一个人，苏联方面说他是

"加利奇亚[①] 的犹太人"而被排除在外）这一次是一道被领进一间大会议室。差不多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坐在桌旁等着。在他们的对面，坐着比拉克、英德拉之流一些准备充当未来的布拉格傀儡的候补者。但与此同时也见到白发苍苍、风度极其沉着的他自己的总统斯沃博达将军，后者由副总理胡萨克和国防部长楚尔将军伴随着。对杜布切克来说，见到此情此景是值得高兴的。

入侵那天早上，在布拉格对苏联大使讲过的那一番果断的话，总统忠实地坚持过来，他坚决要求同克里姆林宫直接会谈。总统于 8 月 23 日飞到莫斯科，他强硬地宣称，只要在会谈开始前杜布切克和其他被绑架的人们没有获释并同他一起参加会议的话，就同苏联领导人无话可谈。

苏联方面不得不让步了。正是为了这个缘故，那些被称为"叛徒"的人，突然又变成"代表"，这才请他们随意选择葡萄酒了。

然而，就象目前事态发展所显示的那样，他们是坚决地下了决心，使那种姿态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关于这回莫斯科的会谈，所有的报道，在一点上是意见一致的，这就是：苏联方面实际上根本不睬杜布切克和其他被释放的俘虏，始终以斯沃博达为对手。事实上，人们确信，同捷克总统"谈判"的重要部分，在被劫持的捷克领导人获准进入房间之前就已经完成了。

① 加利奇亚(Galicia)面积有七万九千平方公里，原为奥地利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并入波兰，现在它的一部分属于苏联。——译者注

七十二岁的总统，由于战时的贡献而受到重视，已成为“苏联英雄”的人物，他就利用他手上这张牌，勇敢地斗争过来。可是，除了在切尔纳用过的、当时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效的辞职要挟以外，事实上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打出去的王牌了。

8月23日同苏联领导人的对阵，从一开头，斯沃博达总统就代替他的人民坐在被告席上。现在，勃列日涅夫马上拿出布拉迪斯拉发会谈以来杜布切克政权“违约”的详细清单，宣称这是杜布切克从最初就没有“尊重协议”的意愿的证据。所谓违约的某些事实，就是直接从上面叙述过的十天前东德领袖瓦尔特·乌布利希给莫斯科送去的“黑信”中检来的。

勃列日涅夫责备说，杜布切克拒绝事先澄清对波恩和东德政府的全部政策（就象乌布利希在信中所指出的），总统是有责任的。勃列日涅夫咆哮道：“这是一种比什么都更重要的背叛行为！”他说，倘若杜布切克不赞同对西德的政策路线的话，那么，在切尔纳商谈过、而且经其同意的一切事情就会遭到废除，被一笔勾消了。

当会谈一开始，斯沃博达还在为争取释放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及其他的人民“合法代表”而斗争的时候，全体苏联领导人的那种穷凶极恶的粗暴态度，早就公开暴露出来了。下述双方的对话，是在“合法的”这个词提出来以后接着进行的，这是足以置信的情报。

勃列日涅夫：在捷克斯洛伐克，除了苏军司令部和苏联军队以外，已经不存在任何合法的权威。

假如在四十八个小时以内还没有把适当的新政府组织起来的话，我们根据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自己的请求，只要进一步公布它们作为两个共和国参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可以马上接管捷克斯洛伐克。

斯沃博达：你们要是干出那种事儿来，一千几百万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与其投降，宁可选择死亡。

苏斯洛夫（在这之前，他属于克里姆林宫的稳健派）：这对我们可算得了什么！在战争期间，我们有比你们全部人口还要多的人民死在德国人手里！

在以五十万驻捷苏军为后盾的如此高压的空气中，是根本没有讨论的余地的。斯沃博达争取到的几乎是唯一的主要的分数——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辞职要挟又奏效了——是关于杜布切克和他那一伙人的前途。他们终于被允许参加会谈的最后阶段，虽然只不过是作为旁观者；不仅如此，苏联方面还勉强同意他们留任到"另行通知以前"。勃列日涅夫在这个问题上起先采取的办法，是要求斯沃博达确认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全新的"工农政府"。

然而，捷克总统关于"法统"只获得这一点让步，其他一切则不能不全线崩溃。总统不得不为杜布切克作出诺言，其中包括了以下各项：对入侵后两天在布拉格某工厂秘密召开的、确认了杜布切克的领导的"不合法"的捷共非常代表大会应宣布无效；选择新的主席团和中央委员

会，撤换一切“反苏分子”；解散布拉格的所谓“K·A·N”①和“231”②之类的“反苏”政治团体；实行党对新闻、广播，尤其是关于苏联的言论的严格管制；捷克对西德的政策——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与外交的——应同华沙条约各缔约国的统一政策全面配合；关于布拉格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态度也应当如此；立即停止捷克同上述两国加强联合的任何活动；等等。

而且，在这一切当中最重要的是令人不胜感慨的占领条款。斯沃博达不能不同意即便在目前捷克境内的占领部队大部分撤退以后，在西德与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长久留驻人数不确定的苏联军队。关于这件事情的实施办法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占领条件

苏联方面说明了他们所讲的“长久”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它的含意是直到华沙条约各缔约国认为西德已经不再威协到它们的稳定或者安全的时候。它意味着一直到各盟国全体一致同意撤退它们的特遣部队的时候，或者是苏军总司令单方面决定撤退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正如那个正式文件所写明的那样，苏联部队的留驻也许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正如斯沃博达所理解、外界不久所推测的那样，那个

① 关于这个团体的情况未查到。——译者注

② “231俱乐部”是一批所谓五十年代初受过“斯大林分子”审讯的反动分子的新组织。——译者注

意思就是，只要派出军队的那一批苏联领导人还留在克里姆林宫，那么，苏联军队就会在捷克斯洛伐克待下去——说不定比那些领导人还会更久地待下去。总而言之，即使斯大林都办不到的事情，勃列日涅夫一伙人却办到了。俾斯麦曾经说过，谁在军事上掌握波希米亚大高原，谁就“控制欧洲”，如今勃列日涅夫一伙已实现了这种控制。

至于捷克人民，却不关心什么世界舆论，他们简直象被判处了长期的徒刑一般。在会谈的某个时候，斯沃博达向苏联方面提到了这件事情会给苏联和共产党的整个伟大目标带来世界性反应的危险。据说勃列日涅夫纯粹站在霸权政治的立场去理解这一番话，把斯沃博达讲得哑口无言：“少说糊涂话了吧！西方最大的强国充分理解我们的极端重要的安全利益，同意我们这个做法。只有这一点最重要！”

8 月 27 日，斯沃博达总统和其他捷克领导人——总统带来的人员跟被释放的人员——飞回布拉格。在他们快要启程的时候，似乎先前的鸡尾酒苦味还不够，他们还尝到了极不愉快的苦汁。

在莫斯科的飞机场上，捷克“代表们”已经在飞机内就座，即将首途归国，这时有人发觉同行的人中少了一个。那个人就是克里格尔，他在捷克人说来是“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而在苏联人说来是“加利奇亚的犹太人”，没有权利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因而不让他进入会议室。

现在他的同志们全都抗议克里格尔不在，从座位上跳起来，走下飞机，说不能把他留下来就一走了事。经过群情激愤的争辩和长时间的等待之后，才用汽车把克里格尔送到飞机场，跟大家合在一起，然后同机起飞了。

关于这个卑鄙的插曲，直到目前没有作出任何的说明。但是，大概苏联方面是打算把克里格尔扣留下来，有朝一日说他必须对布拉格的“反革命”事件承担责任，拉出来作为“帝国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牺牲品，在莫斯科举行公开审判，拿他当作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反犹太主义历来是苏联宣传活动的令人厌恶的背景。苏联效法三十年前的希特勒，把煽动人种偏见同军事上的横行霸道拴在一起。

党的领袖杜布切克、总理切尔尼克和斯沃博达总统一起又飞抵鲁齐内飞机场——现在他们已成为筋疲力尽、灰心丧气的人了。而杜布切克呢，在这故事进入尾声时，身心都濒于虚脱状态。这个故事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现在还是漆黑一团，但并没有结束。为了不使本国破产而向克里姆林宫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捷克领导人的斗争，现在还是在继续着。

在仅仅六个月的时间内，捷克的胜利就变成了悲剧。杜布切克虽然还坚持不当傀儡，但他是在苏联舞台上气喘吁吁地踉跄走着的演员，越来越被迫顺着克里姆林宫的路线来讲话。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会自发而又无可奈何地开始领导在苏联占领下共产主义国家许可范围内的“反对派”；也说不定如果他感到自己不在其位的话国家

的精神长城势将毁于一旦，冒着成为捷克的哥穆尔卡的危险，坚持到底，甚至牺牲他自己的神话人物般的令誉。无论是哪一种前途，无非都是推测而已。

无情的逻辑

剩下来的事情是，（1968 年）1 月份杜布切克在布拉格开始点燃的自由主义与宽容的灯火，如今一盏一盏地粗暴地被占领的毯子扑灭掉。现在，苏联军队对西方的进攻体系远比斯大林时代部署得更为完善。事实证明，克里姆林宫的群鹰又是同希特勒一样，能够安然闯过军事冒险这一关。但不能认为其结果是他们的侵略胃口已经变小了。

在捷克斯洛伐克本身，现在给我们看到的是历史上最古老的对抗之一——暴政的高压对自由精神的压制。这种压力无论如何是无法摆脱的，而它所压制的也无论如何是压碎不了的。关于从 1 月初到现在的捷克的英雄故事，读者由上面叙述的全部始末中，大概理解到这个对抗具有无情的逻辑了吧。人们认为，在"布拉格之春"以后会有一个漫长的寒冷的冬天，这实际上是无法避免的。与此同时，人们又认为，如果文明有某些意义的话，那个春天早晚会重新到来，这也是无法避免的。